

日本的郁達夫研究

真文堂

①

報告番号 甲 4466 号

日本の郁達夫研究

高 文 軍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序言	6
一、郁達夫和日本	6
二、郁達夫和他的文学	9
第二章 日本的郁達夫研究概況	12
一、關於『郁達夫資料』	12
二、日本郁達夫有關資料概況	14
1, 介紹性文章	15
2, 辭書条目	15
3, 其他類	15
4, 研究類文章	16
5, 傳記作品及專著	16
第三章 日本郁達夫研究的大致分期及其特点	17
第一節 初期—二十年代至戰後	17
一、兩國文化及文学關係①	17
二、初期郁達夫研究	21
第二節 發展期—五十年代	33
一、兩國文化及文学關係②	33
1, 「悔恨の共同体」意識	33
2, 「占領政策」和抗戰文学的共鳴	35
3, 日本文化建設的需要	37
①竹內好學說的背景	37
②竹內好的主要觀點	38
③竹內好的影響	39
④竹內好學說的缺陷	40
4, 情況的變化	43
二、郁達夫研究	44
(一)、總說	44
(二)、分說	47
1, 岡崎俊夫	47

2, 中野美代子.....	5 2
3, 阿部幸夫.....	5 4
4, 松崎治之.....	5 8
(三)、小結.....	6 3
1, 与中国現代文学界的交流.....	6 4
2, 竹内好的影響.....	6 4
3, 「同時代性の共感」及其過渡.....	6 5
第三節 鼎盛期—六、七十年代	6 8
一、兩國文化及文学關係③.....	6 8
1, 民主運動的高漲.....	6 9
2, 思想界的分化.....	7 0
3, 和中国的關係.....	7 1
二、郁達夫研究.....	7 3
1, 伊藤虎丸等.....	7 6
2, 坂井東洋男.....	7 8
3, 加藤誠.....	8 2
4, 「共同研究 佐藤春夫と中国」.....	9 2
三、小結.....	9 9
1, 時代變化的影響.....	9 9
2, 研究者世代的变化.....	1 0 0
3, 資料性工作和集体合作的傾向.....	1 0 1
第四節 近期—八、九十年代	1 0 2
一、兩國文化及文学關係④.....	1 0 2
1, 門戶開放和信息量的豐富.....	1 0 3
2, 「中国像の再構築」.....	1 0 3
3, “基盤沈下”.....	1 0 7
二、郁達夫研究.....	1 0 7
1, 平井博.....	1 0 9
2, 伊藤虎丸的「補說」.....	1 2 1
3, 高橋みつる.....	1 2 6
三、小結.....	1 2 9
1, 歷史的反思.....	1 2 9

2, 理論深化.....	129
3, 研究的多様化.....	130
第四章 日本郁達夫研究代表者及代表作試述.....	131
一、小田巖夫.....	131
(一)、作品目録.....	132
(二)、代表作試述.....	133
1, 漂泊的中国作家.....	133
2, 郁達夫傳.....	137
二、伊藤虎丸.....	146
(一)、論文目録.....	146
(二)、論文試述.....	147
1, 郁達夫の処女作について.....	147
2, 『沈淪』論—日本文学との関係より見たる郁達夫の思想=方法について—	150
三、稲葉昭二.....	178
(一)、作品目録.....	178
(二)、論文簡述.....	179
四、鈴木正夫.....	184
(一)、作品目録.....	185
(二)、論文試述.....	188
1, 晩年の郁達夫.....	188
2, 創造社脱退前後の郁達夫.....	192
第五章 結論.....	195
一、歴史的発展.....	195
二、理論的探索.....	198
附録一 兩部郁達夫研究專著之比較.....	218
附録二 参考文献目録 (補遺)	233

日本的郁達夫研究

前言：一个历史之圈

当整整一个世纪，即将从人类历史之页上被掀过，人们禁不住要对往事频频回首：在将要逝去的这一个世纪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它们对每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对今后的历史具有何等意义？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背负着自己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沉重负荷而又急于奔向人类现代文明新阶段的大国来说，上述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探讨，其意义又显得格外重要。

二十世纪，是中国由近代走向现代的重要历史转折阶段。而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标记，就是那赫赫有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及其象征意义，在本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中国人寻求进步、企盼改革的精神旗帜，而飘扬在人们心头的。客观的说，五四运动之兴起，绝非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随心所欲。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已承受了太多太多失败的耻辱。是“先富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暴行，敲碎了中华“老大帝国”的千年古梦。而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在痛定思痛之后，转而又向现代西方思想之库中寻找武器，认为只有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体系，才能拯救中国。

五四运动距今已经整整八十年。八十年来，对于西方各种思想体系的引进和吸收历尽反复。到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也还难说是最后的定位；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起码在官方，基本上一直没有太大改变。其中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口号，更是把五四“打倒孔家店”，即否定传统文化的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

然而，在对传统文化究竟应如何认识这一问题上，历史老人所圈划的，并非只是简单的直线。当人们反省走过的弯路时，曾不止一次的对自己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文化回眸凝视。这里举几个例子。一是1986年北京曾出版一套《传统与变革》丛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86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初版的五万册几个月之内就售罄，很快又出了增订再版本。作为一种学术著作，能有这么好的销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作者林毓生，在书中提出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一种再认识。此书的畅销，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另一个例子：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一本散文

集《文化苦旅》，以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和情怀，对积淀着传统文化的山山水水、事事物物，一一点评道白。此书出版后也大受欢迎。在海内外获各种奖不去说，从1992年到1997年连续十次印刷，印数达三十三万册（还不包括各种盗版）。这种创记录的畅销，除了文学欣赏的因素，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长期以来被割断的文化传统的关心。

另一位华裔雕刻艺术家熊秉明则说得直截了当：

“过去把文化问题一概放到历史进程的框架中去观察解说，认为中国文化是封建的，中古的，该被淘汰的。经过长期片面的自我否定后，发现问题并不那么单纯，终于开始容纳不同的理论，逐渐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西，并认识到中国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把过去带着强烈偏见加以抹杀的传统重新作估价。

西方人如喜龙仁（Siren）等，在本世纪初看到佛像的时候，仿佛看到一片新天地，跳跃欢喜。我们今天带着新的眼光回头来看佛像，应会有比喜氏更复杂的心情。那是对自己古传统新的正视、新的认同、新的反思，而有久别回归的激动吧。”¹

就是说，到了九十年代，人们对本世纪初的那样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好象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历史似乎画了一个大大的“怪圈”：当国家衰败到极点时，人们穷则思变，毅然摈弃几千年的古老传统，希望从西方现代思想武库中寻求富国强民之路；而当西方文明发展到当代，自己也陷入危机，转而从东方文明中汲取养分时，中国人这才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曾要与之“彻底决裂”的古老传统中，原来还存在着人类文明之精华，最终是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拥抱、去亲近的。美国的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在为前面提到的林著所做的序言中，这样说到：

“然而，十分清楚地，无论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冲动是多么真实而有力，也无论过去的政治秩序与传统文化秩序的实际整合是多么真实，把那个与整体性传统整个决裂的整齐而辩证的图象，当做整个现代史的全面描述，是很不正确的。近几十年来，修正这种全盘与过去决裂的刻板形象的形象的著作不在少数，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极其内部的变奏异调，目前正有成果丰硕的探究。现代中国的各个生活层面与过去文化之间不自觉的或未经明白承认的连续性，也正在被彻底地加以考察。”²

¹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P28。

本杰明此话说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了。

上述这一切，和本论文将要论及的主要人物—郁达夫，以及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有什么关系吗？

首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郁达夫，身上就兼有反传统同时又和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复杂因素。他的成名之作《沉沦》，在当时曾被认为是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的最有力的作品之一而受到封建卫道士阵营的强烈攻击和新文学阵营的赞誉；而如果撇开文学的主题等表面因素而深入到他的文学世界的内部去略做浏览的话，又不难发现，传统文化对他有着比别的作家更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前面提到的“历史的怪圈”中来认识郁达夫的位置，仍然是个有意义的话题。

其次，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没有“历史之圈”的影响？牵涉到他国的事情，可能话题就要更复杂一些。在下面的具体论述中将要提到，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郁达夫研究包括其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受以竹内好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影响。而竹内好的基本思想（或者可以说是方法）之一，就是以建设中的中国新文学为楷模，寻找日本文化（包括文学）建设的新的发展方向。对明治以来日本的“现代化”过程，竹内好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伪现代”的成分。而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则是高度肯定的态度。几十年来，日本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现代化”还是“非现代化”这一敏感问题上，赞成或反对竹内好之说的争执仍然难分高下。如果说当初竹内好的日本=“伪现代化”、中国=“真现代化”的公式，经过这么多年两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检证，很难说还能继续成立的话，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反复思考和多方位验证，结论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东京大学出版会于1993年-1994年间出版的七卷本学术丛书『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溝口雄三等編）（中文译名《在亚洲思考》），就对日本、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现代化、现代化和传统、东方和西方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做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讨和论述。虽然这反映的是日本知识分子今天的认识，而对这一相关问题的关心与执着，在日本思想界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

如果将两国的问题综合起来看一下的话，整个这一个世纪以来（甚至应该推到更长一些），由于两国基本处境截然不同（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主动进攻，一个被动挨打；一个是战争的发起者，一个是战争受害者……），在对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两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很不相同。和中国知识分子激进、绝决、

²《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再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P3。

批判和单向化的总体倾向成为对比的，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冷静、理性、反省和多向化思维。时至今日，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有可能对曾苦恼了鲁迅、郁达夫们整整一代人及以后几代人的问题，从与当初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时，日本知识分子的理论摸索和探寻，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参考与借鉴价值。

具体到文学研究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作家中，能较早并相对持续较久地引发日本研究者兴趣的，还不是太多。而郁达夫就是其中一个。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而且是曾经在五四文坛上引起过很大轰动的作家，中国国内对郁达夫的研究当然数量可观。但因为种种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因素，几十年来，中国的郁达夫研究曾经出现过大起大落，甚至一度陷入冰河时期。而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则不似中国那样直接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与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体一致，它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起伏变化。一方面折射着整体研究的特色，同时又反映出这一领域、每一研究者个人的研究特性，它沿着自己的轨道一步步前进。恰恰就是在中国的冰河时期，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³，从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互为补充，共同构成郁达夫研究整体的巍巍壮观。

在日本，郁达夫之所以能较为长久的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说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从表面上看，既有铃木正夫所说的因素：「郁達夫の作品は、日本では戦前から作家の小田嶽夫などによって翻訳され、その名を知る者は少なくなかったし、根強い愛読者もいる。その作風が日本人になじみやすかったからである。」⁴同时可能还有伊藤虎丸所说的因素。「我々は、彼の残した自伝的な諸作品等を見るとき、同時期の留学生の中でも、彼が最も日本人の生活の内側には入り込んでそれを理解していた中国人の一人だったことを知るだろう。そこに描かれた大正期の日本の姿に、思いがけぬ懐かしさを見出すむきも少なく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⁵其作品较为广泛的为人们所知，和其作品内容与日本人的精神相通之处，这两点大约可以说是郁达夫能引起日本学者的研究兴趣的重要原因。但这些，毕竟还只是比较表层的因素。稍微深入一点的看，郁达夫归根结

³此处指『郁達夫資料』（伊藤虎丸、稲葉昭二、鈴木正夫編、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1969年10月31日）及『郁達夫資料補篇』（上、下）（同上、1973年3月1日与1974年7月15日）等

⁴鈴木正夫：『郁達夫—悲劇の時代作家』（研文出版、1994年6月、p3）

⁵伊藤虎丸：「『沈淪』論（1）」（『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1961年4月1日、p52）

底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位作家。几十年来，和前面提到的“现代化”认识相关，日本研究者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认识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每一发展变化的过程，都包含了哪些决定性的和潜在的因素；而郁达夫又和这些因素有什么关系？这些，可以说是上述问题的更为深层的因素。在本论文中，我希望能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通过对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总体情况的探索，能对隐藏其后那一更大课题有所触摸与探及。

对于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成果，中国国内曾有过一些介绍。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登载的东大『郁達夫資料』附录的译文，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传记两种』（分别是小田嶽夫的『郁達夫傳 その詩と愛と日本』（中央公論社1975年3月25日）和稻葉昭二的『郁達夫 その青春と詩』東方書店1982年4月20日））等。但到目前为止，较为全面地介绍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文章似乎还未见到。且这几年，又有新的成果不断问世。所以在这里，我想不揣冒昧地，利用身在日本、材料搜集上的便利，尽自己的能力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跨度长达几十年，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史”的规模。面对这一“研究史”，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我打算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方面以纵向“史”的概念为主线，同时又兼顾横向“点”与“面”的关系。在对日本郁达夫研究的大概情况做简单介绍之后，先按照时间顺序，分期介绍每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基于两国特定文化关系背景之上的郁达夫研究的情况及具体成果；然后用专章集中探讨日本几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研究情况与研究个性；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上，就是对本论文构成的一个大概设想。

第一章 序言

一、郁达夫和日本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相当大的一批作家，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主要的因素，是随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留学风潮而开始的个人留学日本的经历。比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张资平、成仿吾、田汉、欧阳予倩、郑伯奇等好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当时，已经走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作为“西风东渐”的第一窗口，面对西方空前的开放。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几乎是无遮无拦的涌进日本。不仅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也深深影响着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日本接受了自己人生最初的精神洗礼。一方面，他们以日本为中介，开始接触、认识并逐步接受西方现代思潮。同时，明治末大正初的日本文学，也对他们产生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影响。这双重的影响，作用于他们每个人的性格、气质、爱好等因素，就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比方说，厨川白村、拜伦、尼采等之于鲁迅，歌德、惠特曼等之于郭沫若，等等。他们通过留学日本，在日本所接受的各种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他们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随着他们的归国，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及日后的声望日增，又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而在这些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中，受日本文学影响之大，与日本因缘关系之深，和日本结下最为难解之缘的，恐怕当数郁达夫了。不仅因为他早期的成名作就是以自己留学日本的生活为素材，并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创作而成；也不仅因为他回国后的创作中日本文学的影响依然可见，他本人也与日本文人保持往来；战争迫在眉睫之际，他第二次赴日，与后来郭沫若的归国有直接关系；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在此时与相交多年、心仪已久的佐藤春夫绝交；后来赴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的副刊编辑工作，仍保持积极抗日的姿势；而他的死，居然也是由他相知相亲相交的日本人一手造成。这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死因缘，在别的中国作家那儿是找不到的（周作人也是较为复杂的一个，但与郁却性质不同）。

所以，就郁达夫和日本的关系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郁的角度说，在同时代的中国留学生中，那样强烈的表现出对日本文学的入迷和倾倒态度的，除他之外还没有第二个（《郁达夫传》的作者小田巖夫曾这样指出）。换句话说，正因为他受日本文学之影响最大最深，所以他的文学气质，也可以说与日本

文学最为接近。从日本的角度看，那么一大群留日中国作家，唯有郁达夫对日本情有独钟，也唯有他的死是日本人直接造成的。这生生死死的难解之缘，使他们在特别关注他的命运的同时，对他的文学，也有着特别的理解与诠释。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认识理解郁达夫的眼光也在变化。但把郁达夫当做受日本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这一点，却基本未变。所以，当他们考察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特别是近、现代的两国文学的关系时，常常以郁达夫为焦点，来展开自己的探索⁶。

几十年来，特别是从战后到现在的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此一可为是，彼亦可为非。人们在不同的时点，认识一个问题，评价一个人物，往往会有很大的不同。象郁达夫这样一位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物，更免不了在历史之河中几经沉浮的命运。他活着时，是日本赋予他文学的源泉，让他感受到青春的苦闷和骚动，促使他创作出《沉沦》一举成名；又是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夺去他的亲人，使他遭受毁家之难；最后是日本宪兵残害了他年富力强的生命。他死后，是日本作家写出第一部《郁达夫传》，向日本人，也向中国人，介绍这位几乎被历史之尘湮没的中国作家。当他的长兄郁曼陀的血衣塚被摧毁并在其上盖起了公厕时（这是中国文革期间的事），日本学者正在他最后的葬身之地孜孜不倦的做调查，搜集资料，并发出给他以公正评价的呼吁⁷。当他的家乡的土地上“双烈亭”终于得以巍巍而立之后，他的第二故乡名古屋的名古屋大学（郁曾经留学的第八高校是其前身）校园里，郁达夫文学纪念碑也赫然问世。每一节，每一段的后面，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管如何演变，讲郁达夫就离不开日本。而在日本学者那儿，则存在着一个总也结不开的“郁达夫情结”，它已经吸引了好几代的学子学人。

中国的郁达夫研究，从他的第一部《沉沦》问世，可以说就开始了。多年来，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功过是非，人们好象在说个不停。如果按照一般的说法，将几十年的郁达夫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的话（即20-40年代、50-70年代中期、70年代后期-90年代⁸），除了中间一个阶段比较寂寞，第三个阶段以研究者队伍之雄厚，研究范围之广泛，研究课题及方法之新颖，早已远远超过第一阶段的印

⁶祖父江昭二：「日中両国の文学者の『交流』—郁達夫に焦点を当てたおぼえ書き—」

（『現代中国文学』6『郁達夫・曹禺』河出書房新社1970年12月20日。）

⁷鈴木正夫：「スマトラにおける郁達夫と日本人」『大安』第15卷6・7号（1969年7月）と「晩年の郁達夫」（『野草』第12号、1973年10月）

⁸黄爱华：「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世纪回眸：郁达夫纵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象式和综合性批评的水准。“回顾这段研究历史，无论是对于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郁达夫，还是反省中国新文学批评自身所走过的道路，都是很有意义的。”⁹这段话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即通过对郁研究史的回顾，反省中国新文学批评所走之路，或者说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借用这一命题，本文在这里想要论述的“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更为实质性的目的，如前所述，是企图通过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郁达夫这样一位中国作家的研究的综合评述，来把握几十年来在两国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日本学术界对郁达夫，以及通过郁，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评价及其发展变化，包括制约和影响了这发展变化的一些潜在因素。这才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真正目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说明的。我为什么偏偏选择郁达夫研究，而不是选择名气更大的比方说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等，来考察日本学术界的动态呢？确实，由于后者（特别是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本方面的有关研究也相当之兴盛，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郁达夫研究。由此产生的我的考虑：首先，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不需要我多置赘言；其次，也因为如此，其数目、种类的浩繁不言而喻。以自己的水平，恐怕还不具备对其进行梳理、归纳、概述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是由于对象本身基本气质的不同，导致日本研究者的研究基点（或态度）不同。从这不同中有时可以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具体一点说，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同为赴日留学生，但他们对日本文学的态度却很不一样。比方说曾经影响极大的竹内好的鲁迅论，就认为鲁迅对日本文学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因而当他批判日本近代文学时，就把鲁迅作为一个正面的参照系统，甚至当做中国民族的代表性英雄来看待。对郭沫若，则因为他在学术上（不仅仅是文学）的广有成就，以及一度高及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地位，日本学者也曾经是崇敬有加。所以，对这两人的研究，多少带着一些仰视的成分，或者说是掺杂了文学以外的成分。而对郁达夫则不同了。前面曾说过，郁达夫受日本文学影响最大，气质上和日本人最相近。而且一直到死，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作家。因此对郁的研究，首先不是仰视，而是一种“平视”的态度。看郁达夫，就像看自己一样。说得准确点，是像看自己国家的小说家一样。其次，基于这种“平视”的态度，在对郁达夫的研究中，有时就体现出日本学者通过“自我发现”而达到的“自我批判”的认识。而对鲁迅等，则因为

⁹黄爱华：「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世纪回眸：郁达夫纵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是“自他发现”，所以无从找到基于“自我发现”的“自我批判”。这种多少带有“自我批判”意义的（需要强调的是“多少”，而非“全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认为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更有意义的一部分。同时，还有郁达夫自身比较纯粹的文学家的因素，使得对他的研究，也更多一些文学研究的成分。上述这些，就是 I 选择了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来作为自己考察对象的重要理由。

二、郁达夫和他的文学

关于郁达夫，他的生平，他的文学，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所述所论都已经有很多了。这里，不打算对前人说过的东西做更多的重复，只是将自己认为最主要或重要的特征略做列举。

在中国，其实郁达夫并不是一个很受好评的作家。从他刚开始崭露头角，对他的评价就是毁誉参半。如果根据前面说过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法来看的话，第一第二两个阶段，正面评价虽然有一些，但不是占绝对优势的多。特别是在第二阶段，批评的声音几乎占据主要成分。直到第三阶段，情况才从根本上有所改观。这其中的原因，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这是由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这里所说的文学作品，主要限于小说）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所造成的。他的基本特点，是否可以用坦诚、直白而又率性来加以概括。无论是最初的《沉沦》，中间的《茫茫夜》、《茑萝行》，还是后来的《迟桂花》、《出奔》，作者的（主要是通过小说中主人公自述来表现的）灵魂的包括肉体的各种烦恼、痛苦，赤裸裸的展现于读者面前，几乎不加任何掩饰，不受任何道德标准的束缚。

他的这种坦诚直率的文学，首先将面对的是道德的和文学观念的双重壁障。

从道德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观点是“文以载道”，文学的任务是宣传教化。郁的文学，从内容上说，完全是背道而驰，将人们讳莫如深的性的问题等公然表现于小说中，所以招致“诲淫诲盗”之类的批判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新文学建设之初，郁的文学正因其如此而具有反传统的积极意义，所以得到周作人、郭沫若等对他的支持的话；到了第二阶段，政治、文化的背景都有很大改变。“阶级斗争”一度成为至高的目标。“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等口号占据了文学评论的主要地位。现在看来，这些口号不过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的变相延伸。但在当时，当人们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郁达夫的文学，

当然是相去更远了。而由于这一阶段的特别严峻的政治方面的压力，连为郁达夫辩解的声音都变得由强而弱，甚至渐渐从有到无。

另一层，是文学观念的龃龉。传统的美学，讲究的是含蓄，是文质彬彬。一方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同样是小说，与古典白话小说在表现上很不一样），与诗歌的表现方式、美学功能等都截然不同。当时的人们面对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品种，在审美心理上还有个调整过程；更重要的是，喜怒不形之于色，情发乎内而止乎礼，传统的士大夫的审美观，即使是在新文学运动之后，仍然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读者的审美趣味。郁达夫那种恣意宣泄、毫无掩饰的文学，在青年读者中引起的一时性的狂热过去之后，就难免在传统的审美意识的厚障前碰壁的命运。同样是新文学学生力军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们，如叶圣陶、许地山等，所受到的攻击就少得多。除了文学观的差异之外，传统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主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当然也还有别的因素），使得郁达夫的文学，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一直受到影响，直到七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初才从根本上有所改变。而改变的原因，恰恰也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占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与文学审美观都从根本上被动摇而导致。

那么，如果撇开上述那些外在因素，我们对郁达夫，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基本评价呢？鲁迅曾经说过：“有着四千年吃人历史的自己，开始不知道，现在明白了。难见真的人。”而郁达夫，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真的人”。他心头涌动着太多的人生的失意、苦闷，爱情的悲欢、烦恼；同时也敏锐的感受着时代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撞击和拨弄。他在日本所受的日本的和西方的文学影响，特别是“私小说”和“自然主义”的影响，几乎决定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他的浪漫主义气质，使他无法像茅盾、叶圣陶等作家那样冷静、客观的解剖、窥视他人的灵魂；而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性格，也使他绝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积极的走在时代前列。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将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在探索人生之路、追求爱情、寻找与时代共同发展的方向时，所经历的种种挫折、颓唐、不幸和痛苦，一五一十的诉诸于笔，丝毫不加掩饰的形诸自己的作品，有时甚至带有几分夸张。他不顾忌这样做会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会为自己招来骂名。所以说他正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的人”！在勇于剖析自己一点上，他和鲁迅的“解剖自己，严于解剖他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相似的是，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真诚的逼视甚至是拷问自己灵魂的勇气；不同的是，鲁迅对自己的审视，重点放在思想、精神构造方面；而郁达夫则偏重于将自己置于由经济贫困、性的困扰等由生存本能造成的危

机中，由此展现人类面对着本能的危机时灵魂的困惑与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的自我解剖，面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表现出的是一种更为大胆的勇气。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从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看，郁达夫的文学有其不成熟之处。有些过分依赖直感直觉而缺少艺术提炼之嫌。这甚至也可以说是限制了他的创作未能朝着更为广阔深远的世界发展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也唯其如此，郁达夫才成其为独特的郁达夫，不至于和其他任何一位作家相似或混同。

当我们把郁达夫放在中国文学的背景下来考察时，上述因素是无法忽视的。而如果郁达夫是在日本，文化的（包括道德的和文学审美观的）背景不同，也许他所遭遇的就将是另一种命运了。

第二章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概况

一、关于『郁達夫資料』

提起日本的郁达夫研究，人们自然会想起东京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的『郁達夫資料』。该资料最初是伊藤虎丸和稻葉昭二两位，将手头的资料整理汇编，于1958年12月出了一本名为『郁達夫研究資料』的油印册子。1961年4月，『郁達夫研究資料初稿』正式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上。作者为伊藤虎丸和稻葉昭二。『初稿』主要有四部分：

- I 著作一覽
- II 作品掲載書並ビニ雑誌目録
- III 論文その他関係資料（附 邦訳作品目録）
- IV 年譜稿（1896年～1928年）。

虽然每一部分内容都比较简单，只是后来的『郁達夫資料』的雏形，但却是这方面的最早的开拓性的工作。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又加上当时还是大学院生的铃木正夫的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1969年10月，作为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的第5辑，『郁達夫資料』正式问世。

『郁達夫資料』最初只是一册，副标题为一作品目録・参考資料目録及び年譜一，付録・一 聞き書「郁達夫の流亡と失踪」二 留日時代の作品。作者为伊藤虎丸、稻葉昭二和铃木正夫。正文部分主要是对上述油印资料及初稿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合而为一；附录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聞き書『郁達夫の流亡と失踪』」，是铃木正夫南至九州北至东北，走访了曾去过苏门答腊的近一百个日本人，所做的调查记录，证明了郁达夫确实被日本宪兵所杀害。这是当时日本国内唯一而又确凿的证实郁达夫死亡真相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二部分「留日時代の作品」，是稻葉昭二利用名古屋的地利，发掘搜集的郁达夫留学时所做的诗文的原始资料。这在中国，也是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的一个部分，对于研究郁达夫文学创作的起点，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伊藤虎丸在前言中简要叙述了此书的成书过程。

『郁達夫資料』问世后，所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作者们的想象。不仅仅从日本国内，甚至从世界许多地方，寄来读者来信，谈读后感想，提补充意见。三位作者在此基础上，坚持不懈做了大量补充调查工作，汇集了许多新获得的资料，

于四年后，即1973年3月，由同东洋学文献中心，出版了『郁達夫資料補篇』。

『補篇』分上、下二冊（下冊出版时间为1974年7月）。上冊内容：

- I 著作一覽補遺（付 所収作品名）
- II 作品掲載書並びに雑誌目録補遺（付 没後出版の著作目録補遺）
- III 参考文献その他関係資料目録補遺（附 邦訳作品目録補遺）
- IV 年譜補遺

付 録

- I 郁達夫詩 補遺
- II 郁曼陀略年譜並びにその本邦誌紙に発表せる詩
- III 郁達夫訪日時資料（消息並びに講演筆記等）
- IV 『洪水』『抗戦文芸』『大衆文芸』所載の作品

写 真

下冊内容：

- V シンガポール時代の作品
- VI 聞き書「郁達夫の流亡と失踪」補遺
- VII わが国の文学者等の交友に関する資料
- VIII 「台湾新民報」所載の座談会記事

写 真

从内容上看，显然『補篇』要充实得多。就郁达夫留学时期的资料看，不仅增加了他在八高时的照片、他和同学策划创办同人杂志计划的证言，对于他以名古屋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沉沦』，伊藤虎丸和稻葉昭二在别人帮助下，逐一寻访了其描写地点，基本证实了其真实性。调查时拍摄的实地照片，也收录在此书中。更不寻常的是，『補篇』的附录，还增加了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汉诗及其简略年谱。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得到了补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在新加坡时的作品，主要是他担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时的作品，首次被全部发现并登载于此。当时铃木正夫有一个到新加坡工作的机会。他在公务之余，做了大量的调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星洲日报』的微缩胶卷版。由此复印而得的200多篇作品，大部分是第一次为新地以外的人们所见。不仅如此，铃木正夫还去了苏门答腊、巴爷公务等地，走访有关当事人，获得了一些新的证言，拍摄了许多实景照片。他为郁达夫资料的搜集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補篇』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除此以外，『補篇』

还收进了不少史料性文件，为后人的阅读与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总之，《補篇》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史上一个有突破性意义的进展，特别是它成书于中国国内的文革后期，其意义就更加不同寻常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国的学术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郁达夫研究也有较大进展。中国方面，由陈子善、王自立编辑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两种，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出版。在资料搜集工作得以从对方得到补充的情况下，日本于1989年3月，第三次出版了郁达夫有关资料：《郁達夫資料總目錄附年譜》（上、下）。（下册出版时间为1990年2月）主要是将多年来的郁达夫研究资料按A 專著、B 論文・記事、C 翻譯的分类以及著作一覽、年譜，做了一个总的汇编。和中国的比起来，日本的《郁達夫資料總目錄》对于中国本土以外的资料，包括美国、欧洲、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研究资料，搜集得更全一些，弥补了中国的国外资料有所欠缺的不足。至此，《郁達夫資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总起来看，日本的《郁達夫資料》的从资料搜集到整理出版的工作，前后跨越32年，共计出了五册、大约80万字资料。这里面，既包括了从事这一工作的日本学者对郁达夫的关注热爱，也体现出他们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严格认真，和面对困难时坚韧、执着、不屈不挠的努力。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学习、研究上的便利，亦能受到治学态度上的启发与激励。前后一共五册的《郁達夫資料》，可以说，是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座赫然生辉的巍巍丰碑。

二、日本郁达夫有关资料概况

根据《郁達夫資料總目錄附年譜》的统计，日本最早的有关郁达夫的记事，是1923年11月和1924年11月的《雅聲》杂志的「如是錄」，作者分别是嘯雲山人和富長蝶如。到1987年12月为止，各种报刊、杂志、书目上登载的有关文章，一共有277篇（这个统计数字有所遗漏）（1988年以后的将在下面论及）。这277篇中，以介绍性的文章居多，大约占三分之一强。还有较大一部分是辞书、字典上的有关条目。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郁达夫与日本友人交游情况的记述、郁达夫著作日译本的序跋类文字，以及有关日本郁达夫传记的书评文章等。真正能算得上研究文章的不是很多，可能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

下面，打算按照上述分类，简要论述各种类型文章（或文字）的大致情况。

1、介绍性文章

对于日本人来说，郁达夫首先是个外国人，是个外国作家。他的人生和日本有什么关系？他的创作、活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日本人久久地关心与注目？在数量颇丰的这类文章中，对于郁达夫早期留学日本（1913年6月-1922年7月）的生活，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他以此时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创作，以及他归国后的文学、创作活动，1936年他的战前访日，战争中他的足迹，一直到他的死于非命，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介绍与叙述。其中最早的是他归国后第二年（即1923年）的『雅聲』杂志的「如是錄」，最近的则有1999年1月1日的『中日新聞』的专题报道（这当然不在『郁達夫資料』统计的范围内）。正是通过大量的这一类文章，使不少日本人对郁达夫这个中国作家，由一无所知到有所了解，由陌生、隔膜，到关心、接受。

2、辞书条目

这一类资料，主要是指出现在各种讲座、大系、年鉴、辞典等类书物中的文字。长期以来，日本出版了不少这类书物。在和中国有关的这些书物中，有很多都收进了郁达夫的条目，或者是与郁达夫有关的记载。比如，萬里閣書房1930年8月刊行的『大支那大系』第12卷『文学演劇篇』（下）中的「支那の現代文藝」、新潮社1930年9月刊行的『世界文学講座』13『現代世界文学』（下）的「現代支那文学の鳥瞰図」、中央公論社1935年10月刊行的『世界文藝大辞典』第1卷的「郁達夫」、平凡社1960年9月刊行的『世界名著大辞典』第4卷的「沈淪」等等。这些文字或详或略，记述了郁达夫的生平、文学活动和创作。它们既是当时条件下可能有的较为真实的记录，也为想要了解有关资料的人们提供了方便。

3、其他类

除了上述两类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文字，姑且把它们归为其他类。这里，有关于郁达夫与日本友人交往、过从的记述；如金子光晴的「上海 郁達夫君へ」、佐藤春夫的「西湖紫雲洞の話」等、有一些文献性的资料；如山口慎一的「郁達夫への公開状」、『文藝戦線』所載的「中国文学家の英国知識階級及び一般の民衆に対する宣言」、鈴木正夫的「郁達夫の逸詩2首」等、另外还有日本翻译出版郁达夫作品时的序、跋类文字；如小田嶽夫的「『過去』譯者序」、岡崎俊夫的「譯者後記」等、以及对日本所出的郁达夫传记的书评类文字。如飯倉照平的

「書評：小田嶽夫『郁達夫傳』—振れ幅の大きな作家 最近の研究を取り入れ、ぬくもりある評伝」、倉持貴文的「書評：稲葉昭二『郁達夫—その青春と詩』」等等。上述这些文字，虽然列入研究类有些勉强，但都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

4、研究类文章

这一类文章，从数量上看不是很多，但从了解日本的学术研究状况的角度来说，却是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它们虽然篇幅长短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已超越了介绍的范围，在各自的题目下，展开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与探讨。从时间上看，大内隆雄（即山口慎一）的「中国現代作家評論（2）時代の作家郁達夫」（載（大連）『滿蒙』第12年第6号（1931年6月1日））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篇。此后的几十年，又有不少研究文章陆续问世。在每一不同时期，都有能体现其特征的作品出现，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只有这一部分，才是本论文的真正兴趣之所在。

5、传记作品及专著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传记作品，即小田嶽夫的『郁達夫傳 その詩と愛と日本』和稲葉昭二的『郁達夫—その青春と詩』，进入九十年代，鈴木正夫的两部专著先后出版问世。它们分别是『郁達夫—悲劇の時代作家』（研文出版、1994年6月）和『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方書店、1994年）。这些著书，都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章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大致分期及其特点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不同的时期，又有其相对不同的特点。这里，我想试着对几十年来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做一个粗浅疏陋的阶段划分，并逐一考察其主要特征。

第一节 初期—二十年代至战后

这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阶段。称其比较原始，是因为除少数文章以外，大部分是对郁达夫其人及其作品、译作等做简单的介绍。其中1936年郁达夫来日前后，日本的报刊、杂志等曾出现过较为集中的报道和访问记，但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战争中及战后，以『中国文学』¹⁰为核心，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陆续写出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如近藤春雄的「郁達夫と徒然草」¹¹和「郁達夫のこと」¹²、岡崎俊夫的「郁達夫と名古屋」¹³和「スマトラにおける郁達夫」¹⁴等。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对郁达夫的论述与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外围阶段，尚未进入到深层，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一、两国文化及文学关系①

这一阶段，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和昭和初期。经过明治时期，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已经和以前（比方说江户时期）大不相同了。具体的说，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政治经济地位悬殊

经过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日清战争），日本已经在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上大踏步的朝着西方诸先进国家赶去（或者是他们自认为如此）。而中国尚处在半

¹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始創於1935年3月、原名『中国文学月報』、1940年4月1日第6卷起更名為『中国文学』。

¹¹『中国文学月報』第36号（1938年3月1日）

¹²『桃源』第2号（1947年1月15日）

¹³『中京新聞』第1面（1947年8月3、4日）

¹⁴『中国文学』第99号（1947年9月1日）

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二者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使得日本方面，基本上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中国；

2. 文化距离

与国家政治发展相对应，在文化方面，经过明治维新的亲西疏汉，中国已经显得不那么举足轻重。两国间的交流，顶多限于“友好交流”，甚至在“交流”的内底里潜藏着一些其他因素。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元老之一武田泰淳，于战后的1950年，曾经在题为「中国の小説と日本の小説」的文章中，这样论述当时的日本文学者和文坛风气：

この日本的な異常な、はなはだ無理をはらんだ実験は、ひとり政治経済的な面ではばかりつづけ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を批判し冷眼視した文学者の存在にもかかわらず、西欧風な近代小説を形式だけでも移植しようとした明治以後の日本の文藝運動の中に、やはり何度かこの種の実験が試みられて来たのである。と言うのはつまり、日本人は（文学者をもふくめて）このようなアジアの一角に於ける急速な権力と富の集中とによって、ともかく日本一角だけは一等国として、近代世界に伍して、自己の独立と繁栄を保持できるであろうという夢にとりつか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る。彼等は自己の未来に対して「漠然たる不安」は感じたにしろ、又殊に文学者はもとより独自の近代にまつわる暗さを予感し理解し得ていたにせよ、しかし中国人、特に中国文人の骨身に徹した暗さを予感し理解する点に於いては、許しがたく缺けていた。「將軍」を描いてあれほどまで冷徹な批評家であり得た芥川龍之介が、「支那遊記」に於いては、いたずらにとぎすまされた感覚の断片を走らせたばかりで、ついに大陸国民の苦悩を自己の問題としてとりあげ得なかったのである。¹⁵

武田泰淳这段话于日本战败后的五十年代初。以战败为契机，对本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有所反省的文章才开始出现。上述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真实的揭示了战前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即两国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用说是日本处于优先地位），使得日本的文学家出于一种优越感而对中产生距离与隔膜。文学家如此，评论家也很少例外。特别是当时，与后一个阶

¹⁵『文学』1950年10月、第18卷。

段不同，中国文学评论的队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能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做出评论的人，几乎寥寥无几；

3、战争导致的隔绝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使得两国间文化及文学的交流，处于全面断绝的状态；

4、发展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的新文学自身，此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最初的发展阶段。客观的说，对它的清晰的理解与认识，不仅和评论者的立场、观点有很大关系，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特别是对郁达夫这样一位与日本文学非常接近、创作状态又不太稳定的作家，更是如此。

而关于战前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相互关系问题，时过几十年后，人们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变化。1979年10月伊藤虎丸编的『创造社研究·创造社资料别卷』出版，编者在「解説—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中这样说：

つまり、創造社の文学は、これを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上から見るなら、大正期から昭和初年にかけての両国の文化交流を、いわば代表する位置にある。そしてその「交流」は、日本帝国主義の中国侵略政策の次第に拡大し露骨化していく過程を大きな歴史的背景とするものだった。そうした背景の下で、創造社の文学は、一面では、そうした不幸な（戦争責任意識を抜きにしてこの言葉を使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とを断っ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が）歴史を反映して、日本帝国主義への抵抗と、日本及び日本人に対する批判や反感を内容としながら、他面では、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近代」文学から多くのものを学んでこれを中国文学に持ち込んだ。また私たちは、創造社の人々の作品から日本及び日本文学に対する深い理解や愛情をさえ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つまりそこには、“文学”をめぐって、両国の文学者が知識や概念を共有し、いわば、文学談議が—対話が—成り立ち得た幸福な（？）時代があった（敢えて「幸福な」と言うのは、今日の両国の文学の間の距離は甚だ遠くて、このような「対話」の成立は、ほとんど不可能な状況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からである）。

こうした、いわば矛盾した関係の背景として、私たちは、たとえば、大

正デモクラシーと五・四文化革命との同時代性に見られるような、両国文学がある共通の時代思潮を受け容れることを可能にした共通な政治経済的な基盤乃至背景があったことと、同時に、たとえば、侵略と被侵略、繁栄と貧困といった、いわば全く対極的な歴史的社会的基盤の上に、両国文学の同時代性が成り立っていたこととの、両面とを考え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だろう。

つまり、両者は第1次世界大戦後の、デモクラシーやヒューマニズムからやがて社会主義への傾向を深めていく世界的な思潮の変遷を共有していた。ここでは両者は共に世界規模での「資本主義の矛盾の深化」をその文学の共通の基盤あるいは背景として共有していたと言えよう。同時に、他面では、この「共通の基盤」とは、具体的には日本帝国主義の中国進出を意味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の事態を間に挟んで、日中両国の近代文学はいわば対極的な位置に置かれていた。両者は世界資本主義の「矛盾」の「二つの側面」を、それぞれの基盤として分有していたという風にも言えるかも知れぬ。民族的には加害者側と被害者側、経済的には一方の繁栄が他方の窮乏につながり、一方の前進はそのまま他方の敗退を意味するという関係がそこにはあった。そうした関係を「共有」の基盤として、両者は、デモクラシーやマルクス主義といった普遍的な「思想」を共有したのである。「ロマン派」とか「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かいった文芸上の時代思潮を共有し、「芸術家」「自我」「表現」等々といった文芸上の諸概念を共有し、ゾラやゲーテ等々といった西洋近代文学に関する知識のみならず、たとえば陶淵明や杜甫等々といった伝統的文学についても、両者が今日よりはるかに濃い密度で知識や教養を共有していた時代があった。日中戦争の開始以来、文化上の「国交」は全く断絶したままの、現在の両国文学の間の距離の遠さから考えると、それは一見、両国文学の懐かしき蜜月時代とさえ、私には見える。だがしかし、両者が共有していたかに見える（事実そうでもあった）これらの諸思想や諸概念が、両国の近代文学史の中で具体的に持った機能や役割、あるいはそれら諸思想や諸概念に対する両者の理解の仕方の間には、時に微妙な、時に決定的な、ズレや断絶があった。—こんなことは、上に少し触れたような背景を考えてみても、いわば当然のことでは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れはまだ国民的規模で日

中両国民の間に存在し続けているし、そこにある構造は、まだ必ずしも十分に深くとらえられ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と、私には思われる。

伊藤虎丸站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点上，对日中两国文化交流关系的认识，和五十年代初的武田泰淳又有一些不同。这是因为，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两国文化交流的事实背景不一样。战后到五十年代，虽然两国间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建立，但出于种种因素，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在日本得到较为广泛的介绍，甚至形成一时的中国文学热（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章节里将做具体论述）。而到了七十年代，虽然外交关系已得以恢复，但由长期的文化“断绝”而造成的沟壑，却并未有所填补。所以伊藤虎丸谈到三十年代前后的两国文学家的交流时，多少带着一种欣羡的口气。

伊藤虎丸以创造社为代表，考察了当时两国文学家之间的交流情况。他认为在当时，既存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也存在着追求文学建设的现代化的共同基盘。在这种互为矛盾的状况下，文学家们共有的西洋的和传统的知识与教养，一方面对各自国家的文学发展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理解上的错位和断绝。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是伊藤虎丸在自己的长期研究过程中比较一贯的一个观念。在此姑且借用，以为这一阶段两国文化关系的一个说明。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上面引用伊藤虎丸的说法，主要是就文学家之间的交流而言。和本文侧重的文学研究者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综合上面所述各种因素，在两国文化和文学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全面的不可能出现以后那样的发展和繁荣。所以，不管伊藤虎丸如何以羡慕和遗憾的口气谈论三十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蜜月期”，这里只能姑且笼统地把这一阶段，称为郁达夫研究的最初阶段，或者说是原始阶段。

二、初期郁达夫研究

前面曾经说过，日本出现的最早的与郁达夫有关的文字，就是他回国的第二年，即1923年的『雅聲』杂志的「如是録」。「如是録」是文言体，有关文字只有很少一部分。从1927年起，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章开始出现。如山上正義的「南支那文学者の群」（『新潮』第24年第2号、1927年2月1日）就叙述了

自己1926年12月途经广州时，与郁达夫和其他创造社成员相聚的情形；小牧近江、里村欣三的「青天白日の国へ」（『文藝戦線』第4卷第6号、1927年6月1日）则介绍了四一二事变后作者在上海与郁达夫的相会经过。而在早期的介绍者中，首先值得一书的是山口慎一。

山口慎一当时以记者身分赴上海，在『上海每日新闻』上发表了「郁達夫への公開状」。郁达夫也做了「公開状答日本山口君」。此后，山口慎一在『满蒙』（大连）和『書香』两杂志上连续发表许多文章，介绍中国新文学，特别是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如发表于『满蒙』上的「上海文壇交遊記」、「支那の小説二三」等、『書香』上的「支那新文学書解題」（（一）—（五））（1929年8月至12月号），和后来以大内隆雄的笔名撰写的「郁達夫の『迷羊』に就いて」（『書香』第22号）、「中国文学雜記—郁達夫の作品に就いて」（『書香』第26号）等。上述这些文章都还是几十到几百字不等的典型的介绍性的短文，而登载于『满蒙』第12卷第6号的「時代の作家郁達夫—中国現代作家評論（2）」（1931年6月1日）则是长达八页的一篇大文章，也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一篇研究郁达夫的专题文章。

在「時代の作家郁達夫」一文中，作者以时代性为核心，分析了郁达夫的出身、经历以及他不同时期的创作，认为它们分别真实反映了不同时期自己的境遇和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肯定了其创造价值。虽然这篇文章，主要是借鉴了钱杏邨的『「达夫代表作」后序』¹⁶一文中的看法和观点，但毕竟是日文全面论及郁达夫的最早一篇，可以视为日本郁达夫研究的开山之作。

与山口慎一几乎同时的**大高巖**，则是另一种看法。他颇为赞同华汉（阳翰笙）的“达夫的全部作品，可以说赤裸裸的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达夫是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中国新文艺运动』）¹⁷的观点，认为“没落的士紳階級の代辯者たる郁達夫の十年間の文藝生活は不安の世界を彷徨、流轉、失望しつつ現実の刺激を求め、幻想に破れ果て遂に「時代病の表現者」といはれる性格を作り上げて行った。かくて彼の色濃い憂鬱は没落する階級の頹廢的精神を描いてヨーロッパの世紀末の作家を思はせ

¹⁶『达夫代表作』，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3月15日初版。

¹⁷原载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10日初版『文艺讲座』第1册，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下）p362（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た。”¹⁸正如中国的评论界对郁达夫一直是众说纷纭一样，日本的评论家中出现完全相对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到此为止的日本评论家，基本上是在参考了中国评论家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基本上只限于参考，尚未能有所突破或提出异议。如上面提到的山口慎一的对钱杏邨的『「达夫代表作」后序』的参照，大高巖的以华汉的观点为主要依据，等等。首先开始对这一现象有所突破的，是初期的郁达夫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存在。他就是日后以提出“现代支那论”和研究鲁迅而著称于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竹内好。

竹内好三十年代初，还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的学生。1933年12月，他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的，就是一篇洋洋洒洒152枚的「郁达夫研究」。他的这篇「郁达夫研究」，虽然直到1982年9月由筑摩书房出版『竹内好全集』第17卷时，才首次正式公刊，但它的写成，却确实是三十年代。所以，这里姑且把它作为初期的成果来论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竹内好这篇论文，实际上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正起点。让我们先看文章。

「郁达夫研究」全文由序言、第一部 考证的研究、第二部 郁达夫论和结语四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 考证的研究”中，竹内好分别就三个方面，即“一 略历、二 著作、三 年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证与研究。内容虽然不算复杂与深刻，但在三十年代初，能对郁达夫这样的中国作家的略历、著作、年表等做相对全面的考证研究的，不仅在日本是首次，即使是中国国内，也还未有前者（在竹内好之前，有素雅的『郁达夫传』¹⁹和凌梅的『郁达夫小传』²⁰等，但都较为简单）。而真正显示出竹内好的研究特色的，则是论文的“第二部 郁达夫论”。

“第二部 郁达夫论”的标题后有个括号：（前期郁達夫に於る人及び芸術の發展的考察）。即论者是以创造社时期即前期的郁达夫的创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考察的。第二部分一共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苦悶の詩人

二、人間苦

¹⁸「支那新文学運動の展望・（六）郁達夫」大高巖（大連）『滿蒙』第16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¹⁹『郁达夫评传』，素雅编。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初版，“现代文学讲座”之一。

²⁰『郁达夫论』，贺玉波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6月初版。

三、社会苦

四、时代苦

在“郁达夫论”里，竹内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钱杏邨的『「达夫代表作」后序』。与他人不同的是，竹内好不仅有参考，有借鉴，也有补充，甚至有反对意见。正是与原论者观点不同之处，能最为充分地反映出他作为研究者的独特个性。

比如，在“苦悶の詩人”一章里，竹内好首先认为：

郁達夫をその人、及び芸術に於て考察するに当たり、第一に注目すべきは、彼の殆どすべての作品は散文的形式で書かれながら、彼の文学的成功—従って初期の作品に於る彼の特色はむしろ詩人的情熱にあったという点である。

「沈淪」が中国文壇に画時代的な反響を与えた原因は、それが当時の中国青年一般に共通な、性の問題の封建的禁圧に対する反抗意識を大胆に表現したためであることは明白であるが、それと共に、小説的具象化よりは詩人的絶叫の要素を多く生かしていることが何よりも強く内容の澁刺さを助けている故と思われる。

在一般人看来，郁达夫是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当然首先把他作为小说家来看待。而竹内好却透过体裁的表面因素，直接抓住了其诗人气质这一内在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敏锐之处。

接着，在引用了钱杏邨的论述郁达夫时所引用的厨川白村的对诺尔度的分析之后，竹内好补充说道：

ノルダウの所説が一或いは白村の苦悶の規定が—そのまま郁達夫に適應され得るか否かの点は充分な検討を要する問題である。然しながら郁達夫の特色が現象的には近代世紀末に共通な色彩を帯び、過渡期の苦悶を表象する沈鬱さに充されている点にあることは之で明かである。のみならず、錢杏邨が好意的に彼の前期の特徴であるとした「頹廢」は、事實は彼の全生活を貫く懷疑と逡巡の精神の一個の表現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郁達夫—彼は苦悶の詩人であった。而して彼の苦悶が封建文化に対する

反抗と個人主義的自由思想への渴求の産物であったことが彼をして成功せしめる歴史的基礎をなしたのである。

这里，竹内好不仅把郁达夫概况为“苦闷的诗人”，而且进一步解释了“苦闷”的内涵和其特有的意义。翻读当时中国评论家们意见各不相同的各种文章，注意到郁达夫作品的“苦闷”特征的不少，而用“苦闷的诗人”一个概念，来概括他艺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的特征的，则还几乎没有。

在对郁达夫的“苦闷”的根源的分析中，竹内好与原论者的不同之处又一次显示出来。原论者钱杏邨是这样概括的：

家庭不能使他满意，社会又加以欺凌，而他的性格又非常高傲，感受性又特强，于是，在种种的冲突与失望的现象之中，遂把他训练成一个最不幸最孤独的人了！²¹

竹内好则在承认上述因素之后，进一步发掘其他因素：

彼は主として文学を通じて欧米の新思潮を盛に摂取した。然しながら、他方に於て、彼は古い型の文人氣質を多分に有していた。彼は漢詩が巧みだといわれている。彼は多くの作品の中に中国文学に対する造詣の片鱗を覗せている。のみならず、かかる文人的生活への激しい憧憬を示した作さえある。彼は封建的遺制の桎梏を憎みながら、氣質としては滅ぶべきものへ愛着を抱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

頭腦の明晰と、感受性の鋭敏と、旧文学の遺産を充分継承しながら之に飽き足らずに貪欲的に先進文化を追求しようとする彼の好学心とは、当時の中国社会の苦悶を一身に担うものとして選ばれるに十分な素質である。実際、彼は当時の智識階級の焦燥と、懷疑と、苦悶と、情熱とを自ら先頭に立って表現した唯一の作家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出来よう。彼が青年の同情を得たのは決して偶然の事情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仅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说竹内好所论，比钱杏邨更深刻一些。因为他不仅

²¹引自『郁达夫论』，贺玉波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6月初版。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7月版p37。

仅停留在作家经历等客观因素上，而且进一步挖掘到作家主观精神世界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客观经历固然是影响并决定其创作的重要因素，而其主观精神世界的矛盾、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如与郁达夫同时代的鲁迅就是如此。因此，竹内好这种注重作家精神世界的做法，无形中增强了他的文章的说服力。并且，他在这里认为，郁达夫是率先将当时知识分子的急躁、怀疑、苦闷和热情表现于文学作品的唯一作家，所以他受到青年们的欢迎绝非偶然。评价相当高了。

接着，就评论家们所说的郁达夫的“颓废”的问题，竹内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郁達夫の批判者は、錢杏邨をも含めて、すべて彼の特色を頹廢として、病的な苦悶の詩人として規定している。彼が苦悶の詩人である点は論者の等しく認めるところであるが、その点から彼の作品が歴史的に消極的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結論を導き出すことには賛成出来ない。錢杏邨が彼を西欧の世紀末に比較している点は中国社会の特殊性について認識不足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近世世紀末の思潮は現代文化の爛熟と頹廢の時代の産物である。換言すればそれは現代に於る中間社会層の混乱と動揺を表現するところの意識である。然るに中国於ては何うか。政治的に見ても一九二〇年頃は第一革命の跡を受けた反動期である。文化の領域に於ては、白話運動の成功はあるにしても、現実に新しい文学の建設は緒についたばかりであって、封建時代の文学的遺産が十分に清算されていない時代である。かかる時代に彼が、封建的圧制に対する反抗を「沈淪」を始めとして大胆な形式の中に盛ったことは、単に世紀末的末梢神経の産物でないのみならず、中国文化史上ある時期を画する積極的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る。勿論中国の特殊性は西欧文化の摂取に当ってもすべてのものを一時に消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彼の中に世紀末の影響を認めうるとしても、そのことは達夫の果たした歴史的役割の評価を妨げるものとは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这里，郁达夫被人们所骂倒的“颓废”的恶名，被赋予了积极的历史意义。当初，「沈淪」刚刚问世，遭到“不道德”的谴责之声的围攻。是周作人挺身而出，在『晨报副镌』上写出一篇题为「『沈淪』」的文章，认为「沈淪」是“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褻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沈淪」是

一件艺术的作品，”²²使得一片骂声有所收敛。这里，竹内好从对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具体分析出发，认为郁达夫的“颓废”，不仅仅是世纪末的末梢神经的产物，同时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划时代的积极意义。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因素吧，当时的中国评论家中，对郁做出肯定性评价的有不少，如周作人、沈雁冰、郑伯奇、黎锦明、钱杏邨等，但像竹内好这样对他做出如此高的评价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里，也可以看出两国评论家视点的差异。

对于郁达夫是浪漫主义作家的说法，竹内好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厳密に言つて、彼を浪漫主義作家と單純に規定することは誤りである。むしろ彼は自然主義と浪漫主義の影響を二つながら受け、それを中国社会の特殊な坩堝に融解して、自己流の感傷的形式に盛上げたと見るのが妥当と思われる。

认为除了浪漫主义之外，自然主义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是在接受了两方面的影响的同时，又放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坩堝里融解，形成自己的感伤主义的形式。这一说法，也是别的中国评论家没有提到过的。究其原因，在新文学发端之初，就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对立。他们各自掲出的旗帜，分别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后的评论家们，也就泛泛的根据这一点，将作家作品纳入这一范围简单的分门别类。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代表作家之一，所以一般就认为郁主要是浪漫主义。另外，对于自然主义，中国评论界长期以来心存芥蒂，有的讳莫如深。而竹内好却深知当时日本文坛的情况，且在思维上不受什么制限。只是客观的从郁的书信、日记的片言只语中，就能推断出其实质性内涵，因此得出不同于他人的结论。日后的伊藤虎丸，虽然不见得直接读过竹内好这篇文章，在郁达夫的文学取宗的问题上，倒是和竹内好不谋而合。

在其后的三节里，竹内好按照郁达夫创作的时间顺序，分别考察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色与变化发展。在其具体分析中不乏独到之见。

最后，在“结语”中，竹内好总结道：

郁達夫—彼は苦悶の詩人であつた。彼は自己の苦悶を真摯なる態度を以て追求し、大胆な表現の中に曝露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文壇に異常なる影響を齎した。何故ならば彼の苦悶は同時代の青年の社会的苦悶の集約であつたからである。だが、中国社会の進化の急速さは永久に彼の苦悶を今

²²北京『晨报副镌』1922年3月26日文学批评栏。

日の苦悶として止めることは出来なかった。時代の轉換期に於て彼は新しい苦悶の渦中に飛込むことなく、自己の歩んだ道を固守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苦悶から脱却したのである。

这里，竹内好认为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使他不会永久的停留于今日的苦闷。郁达夫在时代的转换期，没有被卷入新的苦闷的旋涡，而是通过固守自己所走之路，从苦闷中脱出。

总之，在1933年当时，能够对郁达夫做出正面评价的文章，即使在中国，也是寥寥可数。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另外还多一层资料搜集与翻译上的困难。竹内好以其掌握的丰富资料和他的独到见解，在对中国评论家（特别是钱杏邨）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的同时，完成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郁达夫论，在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初期，就标示出一个起点不低的标高点，并且显示了他本人的雄厚的研究实力。

除了个人的研究实力以外，另外，恐怕还存在着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伊藤虎丸是这样说的：

「中国文学研究会」の発足は、丁度ここに言われる「科学主義」から「文学主義」への激しい轉換の「中日和」の時期に当たっている。²³

一九三〇年代に発足した竹内好、武田泰淳、松枝茂夫らの「中国文学研究会」の人たちが、はじめて中国近代文学を“世界文学”の中で“同時代の文学”として見ようとした段階がある。²⁴

就是说，他们在当时由昭和初年的「政治（＝科学）の優位」到「政治（＝文学）の優位」的转换过程中，表现了一种对“文学”的自觉。这种对“同时代的文学”的理解与自觉，在竹内好最初的研究工作中，就由他对郁达夫创作的论述而有所体现。所以前面有过“竹内好此文，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正起点”的话。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后来，在『中国文学月报』第22号（1937年1月1日）上，竹内好发表了「郁達夫覚書」，基本上是上述长文的简略提要。

²³伊藤虎丸：「脱亜論とアジア主義の間」、（『東京女子大学日本文学』82、94年9月）

²⁴『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10月刊、P2）

除了竹内好之外，其他一些与中国文学有关系的学者，如小田嶽夫、一戸務、岡崎俊夫、近藤春雄等，也都从三十一四十年代开始，写出一些与郁达夫及其作品有关的文章。如小田嶽夫的「支那作家覚書」（『新潮』第33卷第2号）、「郭沫若と郁達夫—創造社の二詩人」（『文藝春秋』第17卷第6号）等；一戸務的「作家と作品」（『中国文学月報』第1号）、「万葉集の支那譯」（『文学』第5卷第5期）、「来朝中の郁達夫」（『時事新報』1936年12月8日、9日第5面）等；岡崎俊夫的「楽焼の郁達夫」（『中国文学月報』第4号）、「郁達夫と名古屋」（『中京新聞』1947年8月3日、4日第1面）、「スマトラにおける郁達夫」（『中国文学』第99号）等；近藤春雄的「郁達夫と徒然草」（『中国文学月報』第36号）、「郁達夫のこと」（『桃源』第2号）、「八高出の作家郁達夫の死」（近藤春雄著『現代中国の作家と作品』）等。

这些作者在他们的文章中，也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各自的特色。如小田嶽夫的「郭沫若と郁達夫—創造社の二詩人」，和他日后的文风相似，是用近乎小说的笔调，写出两人之间的一段特殊关系；

近藤春雄则特别注重郁达夫翻译『徒然草』这件事。他根据郁的跋文，认为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郁达夫翻译『徒然草』的意义

即ち彼はこの選譯によって、一面以て支那人の優越感を満足せしめ、他面以て日支間の平和を招来せしめるに益ありとな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してかかる事実を知る事により、始めて両国間の真の親善も期待し得るものであると説いている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自然主義的文学觀を標榜し、一切の束縛を脱せんと志した民国新文学家の一人である郁達夫も外国文学の翻譯に際しては、たゞにそれが日本のものたるが故に、凡そ其の選譯の本意とは縁の遠いかかる辯解を、敢て試みざるを得なかつたのである。否、愛国者よりの誤解を避ける為には、これだけの効能を書きたてて、辯解を敢てしなければ、彼自身枕を高くしては寝られなかつたのである。……彼の徒然草觀より来る心的要求こそは実にこの選譯の根本動機であつた事は疑う迄もない。更に中古以後の日記隨筆の支那譯さえも計画し、意氣ごんでいる彼の文学欲の旺盛さは、之を物語って十分ではあるまいか。だがかかる心的要求さえもままならぬのが支那の現状である。支那に於ける日本文学研究の事績のあがらな

い所以も自ら肯かれると共に、一面本国愛国者よりの不断の監視に身の危険を感じつつも、やっぱり日本文学には無関心で居られないのが支那の人々の偽りなき真の姿である様な気がする。（「郁達夫と徒然草」『中国文学月報』第36号，1938年3月1日）

（在近藤春雄の几篇关于郁达夫的『徒然草』选译的文章中，这是最早、最原始的一篇，同时也是在此问题上意见陈述得最充分的一篇。）论者想要说的，是郁达夫与『徒然草』这样的日本古典文学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共鸣，因此，即使是在两国关系即将恶化的背景下，他还是不能自抑地对它做了一些选译。从表面上看，也许如郁达夫自己所说，一是为了证明日本的古代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中有许多人是酷爱和平、厌恶战争的²⁵。但近藤春雄却道出了其中更为直接的原委：由徒然草引发的内心的要求（共鸣），才是他翻译的根本动机。近藤春雄的这一说法，应该说既有趣，也比较切合郁达夫的精神实际。

在这一阶段，除了类似的有关郁达夫文章之外，郁达夫的作品也开始被翻译、介绍。其中最早的大约当数小田嶽夫译的『過去』（春陽堂1932年11月27日刊）。另外还有『现代支那文学全集』（東成社1940年4月20日刊）中的第二卷『沉沦』，岡崎俊夫译的『わが夢・わが青春』（宝雲社1947年5月1日刊）等。这些译作的序或后记，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译者的认识与评价。

比如，**岡崎俊夫**在『わが夢・わが青春』一书的“译者后记”中，就有这样一些话，是值得玩味的。

在开头部分，就为何要出第三个郁达夫作品的译本（此前已有小田嶽夫的『過去』和『现代支那文学全集』中的第二卷『沉沦』两个译本），岡崎俊夫做了这样的说明：

ここにみなぎる弱小民族の一員としての悲哀と頹廢が、敗戦後の今日堰を切って我々の心に流れ通うからであるが、同時に、この名作家が祖国の勝利が報ぜられてまもなく南海に非命の最期をとげたと聞き、一片哀悼の微意を捧げんがためでもある。

²⁵原载『宇宙風』第10期，1936年2月1日，现转引自近藤春雄此文。

关于郁的作品，他又这样归纳道：

その小説に描かれたものは、概ね病弱と無気力のゆえに恋に敗れ生活苦に虐げられた末、徒らに社会の不正を呪い己れの無力を嘲る青白いインテリケンチャの姿である。「ああ」という詠嘆詞が多い。暗澹たる感傷の氣息が溢れ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世紀末的な頹廢の色さえ浮んでいる。同じ創造社の郭沫若の文学が健康で前進的な生氣に満ちているのと全く対蹠的で、その郭が抗戦から引きつづき勝利後の今日民主中国建設のため政治舞台にも華々しい活躍をしていると聞くにつけても、往年の彼らの作品の中にすでに各々の運命が宿されていたように思われる。我々は郭沫若の作品の中に中国知識人の雄々しい情熱を感じるとともに、郁達夫の作品を通じて、同じ中国知識人の脆く弱い一面を窺い知ったのである。しかし彼の放つあの慟哭の声すら、かつて我々は優者の劣者に対する同情の念をもって聞い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例えば私自身彼の「自伝」について書いた。

「夢を追い夢にやぶれつ轉變期の中国にたどたどしい生の歩みをつづけた少年達夫の姿こそひよわな若き中国の姿であろう。抒情味溢れる美しい文字に綴られた悲しくも懐かしい思出の記は、郁達夫後年の傑作であるとともに、中国が誇る香り高き自伝文学の白眉である。」と。今にして見れば何というよそよそしさ。ここに描かれた少年達夫の姿こそ、やがて我々の、わけても幼く若きものの姿であると、当時誰が予想し得たであろうか。単に郁達夫ばかりでない、中国の現代文学は今日改めて読み直されることを我々に要請している。

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10月。日本战败一年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反映的一些观点或者说是立场。他说道，曾几何时，我们还是带着优胜者对劣者的同情，倾听郁达夫的恸哭之声。直到现在，战败后的今天，心灵的堤堰被冲开，郁达夫的悲哀和颓废才从我们心头流过。我们过去对郁达夫的认识是何等生分和疏远啊。那个自传中被描写的少年达夫，其实不正是我们自己年轻时的声影吗？不止是对郁达夫，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这里，对郁达夫所论其实不是很多。重要的是，从这篇幅极短的文字里，透露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转机。到了战后这个时点，由于日本自身沦为战败国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文学研究者，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或者说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他们曾居高临下的俯视过的中国文学，并开始认同其中与

自己精神上相通之处。这一倾向，到此后一个阶段，就发展得十分鲜明了。岡崎俊夫在这里，虽然语不多言不重，却是红杏出墙第一枝，预示了即将来到的转变的方向。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章之外，还有其他研究者或有关人士写的不少其他有关文章，限于篇幅，在此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总起来说，从篇数上看，这一阶段的文章或文字数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据东京大学『郁達夫資料總目錄附年譜』的至1987年底的统计）。从内容分布上看，涉及的范围面也比较广。从质量和研究深度上看，真正有分量的不是太多。能算得上研究文章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无论如何，在我姑且称之为郁达夫研究的初期阶段的这一时间范围内，作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郁达夫研究还是出现了一些成果，同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节 发展期—五十年代

进入五十年代，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一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并非呈直线上升形式）。因为从总体上看，郁达夫研究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环，因此，这里打算先对日本的中国关系、中国文学研究等的全面状况，做一个大概的巡阅。

一、两国文化及文学关系②

这一阶段，与前一时期比，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中国方面，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不仅抵御和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而且结束了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长期国内战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当时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一国的范围，至少是强烈的震撼了亚洲诸国。而日本方面，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强国。对外侵略扩张的不义之举，不仅给亚洲的被侵略各国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使自己陷入战败国的困境。之后是美国的“占领政策”时期，也为日本的战后重建带来种种影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两国的文学建设及相互关系（本文所论，主要着重于日本方面所受的中国的影响），具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稍微具体一点，大约有这样几方面的因素：

1、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中的「悔恨の共同体」意识；

客观的说，日本战败是一个契机，它促使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对本国本民族的命运及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立的思考与认识，而不象以前那样任由政治寡头们主宰。他们首先表现出的，就是通过对战败这一客观事实的反省而产生的「悔恨の共同体」意识。

这样一种意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较为普遍的存在。多年之后，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将这种存在，明确的概括为：

「配給された自由」を自発的なものに転化するためには、日本国家と同様に、自分たちも、知識人としての新しいスタートをきらねばならない、という彼らの決意の底には、将来の喜びと過去への悔恨とが—つまり解放感と自責感とが、わかち難くブレンドして流れていたのです。私は妙な言葉ですが仮にこれを「悔恨の共同体の形成」と名付けるのです。つまり戦

争直後の知識人に共通していた感情は、それぞれの立場に於ける、またそれぞれの領域に於ける『自己批判』です。

(「近代日本の知識人」、『後衛の位置から』82年9月、未来社)

这里转引自丸山昇的「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7)。丸山昇在引文的后面，就有这样的论述：

丸山さんが言われる「悔恨の共同体」に加えて、中国研究者の場合は、もう一つ、中国の変化についての驚き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は、一方では、中国認識の誤りについての反省、そして、あの中国侵略をくい止め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反対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罪の意識というものが合わさって、中国研究者の場合、より強烈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ったと思うのです。

除了「悔恨の共同体」之外，中国研究者还要加上对中国情势变化的惊异。一方面是对过去错误认识中国的反省，一方面是对没有能够阻止、甚至是没有能够反对侵略中国的「罪の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悔恨の共同体」和「罪の意識」，无形中引导人们面对新中国，正视战后的中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对有些研究者来说，这正是将他们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之一。

作为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的一员，伊藤虎丸在三十多年后，这样回顾道：

いったい、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現代文学研究の、いわば第二世代に当たる私たちの、戦後における中国近現代文学研究の出発点は、第一に1945年8月15日の日本敗戦と、第二に1949年10月1日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の成立という二つの歴史上の事実が私たち日本人に与えた衝撃にあったとあってよいだろう。前者は、国民を侵略戦争に導いた軍閥・財閥の政治的責任の追及から始まり、幾多の残虐行為を犯していたことが私たちの眼に初めて明らかになった日本人の道徳的責任への反省へ、さらにはそれらの根底にある明治以来の日本近代の文化的(精神的)体質へのトータルな自己反省に及んだ(『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10月20日刊、P302)

以战争失败为契机，日本才开始对自己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发展过程做全面反省。而反省自己，又是和认识中国有机连接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所谓「悔恨の共同体」意识和由战争罪行而引发的对本民族文化道德的反省，当做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始动力之一呢？

2、「占领政策」和对抗战文学的共鸣；

二次大战结束后，为了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根据波茨坦公告，美国对日本通过占领而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这虽然是日本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第一步，但对日本国民来说，从信奉天皇的“大东亚共荣圈”主义，对亚洲诸国进行侵略、占领，到宣告战争失败，自己反而被他国占领，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特别是“冷战”开始之后，美国出于自己朝鲜战场求胜和建立反共防波堤的需要，任意主宰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方向及过程。包括在建设民主国家的口号下镇压民众的民主运动。这对那些真心向往民主、希望在战后国家重建过程中寻找到正确方向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导致幻灭的打击。从实行“占领”到“全面讲和”，前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已足以使日本人充分感受到被占领的种种滋味。

正是在这种「占领政策」的背景下，日本人开始对法国的「抵抗文学」和中国的抗战文学产生共鸣。

丸山昇是这样说的：

とにかく、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日本人がはじめてアメリカ軍を占領軍として意識するわけです。そこから、フランスのレジスタンス文学や中国の抗戦文学への共感が出てきます。つまり、同じ抗戦中の作品を読むにしても、終戦直後は、あの戦争でどんなひどいことをしたかという角度で受け止めていたのに比べて、今度はむしろ日本軍に対する抗戦を描いた中国文学を、圧迫者、侵略者に対するレジスタンスとして捉えて、共感を込めて読む、という一要素が出てきたと思うのです。例えばフランス文学では、ベルコールの『海の沈黙』とかモルガンの『人間の条件』などが岩波から出て広く読まれましたが、それと同じように、中国文学が読まれるという状況が一頃ありました。（「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15）

这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文学的“受容”的情况。而且是在时隔四十年后

的九十年代所说。而作为创作者的日本文学家，当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又持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呢？前面曾引用过的武田泰淳的文章里，是这样论及的：

しかるに日本文学者のうしろめたさは、第二次大戦後、つまり日本がかつての実験にみごと失敗し、東方土民の一種たるの運命を甘受せんとする今日、ますます複雑な様相を呈さ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ヨーロッパ的芸術完成へのあせりと、東方土民の未来が今や全く自己の運命と化した現状に対する身ぶるい、この二つのうしろめたさに引き裂かれた分裂症状は激しさを加えている。もちろん日本の文学土壌の成分を知悉している日本作家たちが、ただちに中国作家の肯定的態度、進歩に対する樂觀、社会小説への突進をそのままのみにできないのは当然である。戦後文学がこぞって試みた極端な条件の下における人間の異常性の探求は、彼らが自己の生存にまつわる罪悪感、あるいは倦怠から自分流に脱出せんとしたあがきに由来している。すべての日本の戦争文学がたたかうことの本能的歡喜を述べるのを拒絶したのは、連合国の権力がそれを禁止しているためばかりではない。彼等のうしろめたさはそのまま肯定的な人間像、真なるもの美なるものの謳歌を不可能にして、正義のよりどころを混迷におち入らせているからである。²⁶

创作主体的作家方面的因素，要更为复杂一些。一方面因为战败而感觉到与亚洲诸国共同陷入“东方土民”的境遇。对欧洲艺术臻于完成的焦急和与“东方土民”的命运化为一体的震颤，在原来的不安上还要加上被新的两种不安分裂所产生的激烈性；而另一方面，日本的作家们又不可能对中国作家的那一切囫圇吞枣的全盘接受，战后文学所有尝试过的对在极端条件下人性的异常性的探究，都因为他们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恶感，或者是无法从倦怠中挣脱而一筹莫展。这一点（即日本文学自身的困惑），又是和下面即将提到的第三点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丸山昇的文章里，对上面所引的武田原话的前半部分也做了引用。并且紧接着这样说到：

「東方土民」というのは、武田泰淳氏流の一種の露悪的な表現だと思いますが、とにかく、日本はあの敗戦によってアジア諸民族と同じような境遇に落ち、非圧迫民族の心が解るように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という時

²⁶『文学』1950年10月、第18卷。

期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19）

尽管在中国的抗战文学中，日本人、日本军队主要是以侵略者的形象出现，但此时的日本读者，却是要从中读出被占领国国民所感受到的屈辱，和对侵略者、压迫者的强烈反抗的精神。这种一时的共鸣感，也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得以较为广泛被接受的原因之一。

3、日本文化建设的需要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文化（包括了思想与文学等因素的一种总称）自身正处于新旧之交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尚未完全走出战争的迷惘，一方面要探寻新的方向。前面引用到的武田泰淳的文章，在部分程度上说明了日本文学自身的一筹莫展和迷茫。此时，建设新的文学的需求，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眼光投向正在建设中的新中国文学。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曾介绍过的竹内好。

竹内好早在战前就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和同人主办杂志《中国文学》，活跃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战后的1946年7月，他由中国回到日本，开始了自己的对现代中国（包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阶段。

这里，我想稍微花一点篇幅，对有关竹内好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因为他的思想、学说，对整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包括郁达夫的研究者们，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其实作为日本战后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竹内好在整个思想界都颇有影响。这里，只限于与中国文学有关的部分）

竹内好在长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现代中国论』和“鲁迅学”。

①竹内好学说的背景

应该说，竹内好的思想、学说，能够在当时（战后到五十年代）形成并产生影响，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也就是说，是比较典型的“应运而生”。那么，具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再次借用丸山昇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とにかく、日本は上からの近代化に成功したように見えたけれども、その近代は、あの軍国主義を生み出し、太平洋戦争に突っ込んでいく近代であった。いわば日本の近代が失敗と破壊の近代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中国

の近代はそれをくぐり抜けて、新しいものを生み出す近代だったという、ある種の驚きが一般的なものとしてあるわけです。

その有名な例として、竹内好さんの「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これも繰り返すま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つまり、「すべて改良を阻むほど上からの伝統の圧力が強かった。だから、上からの近代化には失敗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を本当の意味で下から覆す、本当の新しい力が生まれた。日本は簡単に上からの改革が失敗してしまったために、社会の本当の意味での近代化はできていない」と言っておられ、（「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8）

也就是说，日本的战败和对战争的全面反省，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个近代化过程的反省，是竹内好学说产生的基本社会背景。一方面是日本的因战争失败而陷入前途渺茫的黯澹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老的中国因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显示着勃勃生机。这种强烈的对比，引发出竹内好的一系列观点、学说以至于整个体系，好象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如果说其中还包含着较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因素，也是不难以理解的。

②竹内好的主要观点

竹内好的基本立论，是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化”过程的批判，学习、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寻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近代化”的正确方向。

前面引用的丸山昇的引文，主要是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而谈。具体的，关于中国文学，他是如何论述的？

1951年，在『文学』杂志上，竹内好有一篇题为「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研究の現状と問題」的文章。开门见山，他就这样说到：

中国の文学、とくに現代文学が、日本人の読書生活に占める比重ということが、真剣にかんがえ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そして、そのことからひるがえって、中国現代文学の研究のありかた、紹介者、翻訳者の仕事のしかたが、きびしく、かえりみ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な傾向を、生み出した要因は、いくつも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が、やはり根本は、新中国の胎動から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誕生—中国革命が新しい建設の段階に入ったこと、この変革の時代に生きている中国人のこころを、彼らの行動を支えている澁刺たる精神を知りたい、自分の問題として現代の中国人の

こころを直接に触れたいという、日本人の切実な願いにある、とい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²⁷

日本文学に影響をあたえるものとして、日本文学の問題として中国文学がうけとられていないことの根底には、もし日本文学が、それ自身の創造と成長のための問題として中国文学に立ち向かうとすれば、日本文学そのものの現状にたいする懐疑、不安なしには不可能だということ、一日本文学そのものの変革を前提としなければ、中国文学を成立させている、国民文学への理想を、それ自身の問題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このことをしめしているものだ。²⁸

在竹内好这儿，中国文学的介绍、中国文学的研究，目的性非常明确。那就是与日本文学自身的改革、建设紧密相联。以中国文学为借鉴，寻找日本文学新的发展方向。

③竹内好的影响

竹内好的学说、体系，并非他个人的忽发奇想，而是如前所述，有其形成的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应运而生”。既然如此，一经问世，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文学研究者当中，产生一定的或者说是相当大的影响，也是毫不足为奇的。

关于这个问题，伊藤虎丸在八十年代进行回顾时，是这样说的：

私たちに最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所謂「竹内好の問題提起」—すなわち、中国近代（といっても特に魯迅）を借りた、それとの比較による日本近代文化へのトータルな批判は、まさに、この両者、つまり日本近代への自己反省と中国革命の思想的勝利がもたらした衝撃とを結びつけたものだったと言えよう。その背後には、そうした明治以来の日本近代のあり方への反省を通して新しい日本を建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一種ナショナルな熱情が、戦後日本を特徴づけていた。そして、その場合、中国革命が思想の勝利、「人間革命」と受けとられたように、戦後は何よりも、思想の力（その意味での文学の力）が信じられた時代だった。思想というこの無

²⁷『文学』1951年12月、第19巻。

²⁸『文学』1951年12月、第19巻。

形のもものが、如何にして新しい歴史を切り拓く力となり得たのか、その秘密を解くこと、その意味で中国革命から学ぶことが、戦後の中国近現代文学研究の出発点だったと言っても、そう甚だしく独断的なことではないだろう。魯迅と毛沢東とに関心が集中したのも、そうした戦後の私たちの問題意識のあり方を示す事柄だったと言えよう。（伊藤虎丸、『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5年10月20日刊。）

伊藤虎丸这段话，不仅明确指出了「竹内好の問題提起」在当时的影响，而且还说明了竹内好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思想力量的重视。因为在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思想的胜利。想要解开思想这种无形的东西，具有怎样的开创新历史的力量之迷，正是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不少研究者就是由此出发，开始自己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的。

④竹内好学说的缺陷

竹内好的思想、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于造成一时学术之风尚。他的理论产生的基础，如前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背景。同时，也还包含着他和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所抱有的一种政治热情。在他那里，新中国是与日本成为鲜明对比的一种存在，甚而至于就是理想的境界。将对象过于理想化之后，就会给自己的学说带来一层潜在的危机：一旦对象本身的固有问题暴露后，他的理论的基础，就会从根本上被动摇。

多年之后，当日本学术界曾有的政治热情被更为冷静的理智所替代后，竹内好学说的缺陷，也有可能被人们所认识。丸山昇在七、八十年代，对竹内好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彼の中国論は、中国論自体であるより日本論であって、日本の近代主義批判が先にあり、その対極にあるものとして中国を想定する。ある場合には、それが現実の中国とのズレがあることは承知の上で「方法」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けれども、時によると、いつの間にかそれが「方法」であることが忘れられて、一人歩きし始めることもなくもない、微妙なところにある。²⁹

²⁹丸山昇：『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5年10月20日刊。

他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其实更是日本论。因为它是以批判日本的现代主义为前提，作为日本的对比而设想出的中国；有时候设想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并不相符合。也就是说，竹内好的中国论，有一种将中国理想化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以后，这种倾向就导致了他的理论陷入根本上的危机。

比方说，竹内好曾在题为「中国人の抗戦意識と日本人の道德意識」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以很高评价。

中国共産党には、高い倫理感に貫かれた主体性がある、したがってそれは、近代的政党としての自律性をもっている。³⁰

后人则对此哭笑不得。

こうした手放しの評価は、一九六〇年代の文化大革命だけでなく、竹内没後の一九八九年六月の天安門事件を目撃した我々にはなじめないところもある。しかし、悪名高い天安門事件を通して、中国はある意味ではきわめて悲劇的な方法で自らの自律性を世界に示したと言えないこともない。そのような見方に立つとき、改めて竹内が建国期の中国とその指導者毛沢東から同時代的に何を学ぼうとしたかに関心を持たざるを得ない。³¹

关于这个问题，简单的概括一下：从战后到五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日本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目光集中于中国。希望通过新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的总结，找出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竹内好。竹内好的理论，曾影响了整整一代研究者。而同时他的理论，也潜藏着固有的缺陷与危机。

因为有上述这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纵横交错的相互影响，在五十年代初前后，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日本一度有过比较大的影响。好象是作为对日本本国精神迷惘期的空白的一种补充，不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有关的评论、研究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前面引用过竹内好的文章里，就有具体的说明：

³⁰後「中国のレジスタンス—中国人の抗戦意識と日本人の道德意識—」と改題、『竹内好全集』第四卷、P 38。

³¹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世織書房1995年1月刊、P 196。

五〇年から五一年にかけて、中国現代文学の翻訳が活発に出、それらがそれぞれ多くの読者を獲得した事実は、その願いが、徐々に、国民的な願望にまで拡大されつつあることをものがたっているものだ。

……

(1) 翻訳の主なものに、つぎの数種がある。

謝冰心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説一ノ上(訳者代表、倉石武四郎。講談社。巻頭についている茅盾のはしがきは、新文学初期の小説史として重要である。)郁達夫『わが夢わが青春』(岡崎俊夫訳。宝雲舎)落花生『巢のなかの蜘蛛』(千田九一訳。同前)巴金『家』(飯塚朗訳。鎌倉文庫)巴金『雪』(寫静子。大雅堂)老舍『駱駝祥子』(竹中伸訳。新潮社)

另外、还有茅盾的「見聞雜記」(竹内好訳)、駱賓基的「北望園の春」(飯塚朗訳)、黄谷柳的『蝦球物語』(虾球传,中文译名为高加,下同)(島田政雄・実藤恵秀訳、三一書房、50年8月)、丁玲的『太陽は桑乾河を照ら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坂井徳三訳、ハト書房、50年8月)、老舍的『四世同堂』(鈴木擇郎・桑島信一・実藤恵秀・魚返善雄訳、月曜書房51年4月)、李广田的『引力』(岡崎俊夫訳、岩波書店)、丁玲的短篇集『霞村にいた時』(我在霞村的时候)(岡崎俊夫訳、四季社、51年10月)、周而复『医師バツーン』(白求恩大夫)(島田政雄訳、青銅社、51年8月)、『八路軍』(燕宿崖)(春日明訳、三一書房、51年9月)、趙樹理的『李家莊の変遷』(島田政雄訳、ハト書房)、孔厥・袁静『抗日自衛隊』(新儿女英雄传)(飯塚朗・大川要訳、彰考書院)、柯藍『バケツさん物語』(隊長呉貴)(宮崎ひろし・宇田礼訳、同前)、周立波『暴风驟雨』(鹿地亘・安島彬訳、ハト書房)、草明『機関車』(三好一訳、同前)、孔厥『生まれかわった女の物語』(女人翻身)(斉藤秋男訳、東和社)等(以上据竹内好「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研究の現状と問題」、『文学』1951、12)。稍后几年,又出版了『現代中国文学全集』(全16卷、河出書房1955年3月)。

而同时的评论文章,则有小野忍的「中国現代文学の発展」(『中国研究』49・9)、実藤恵秀「中国近代文学の創出」(『文学』50・5)、竹内好「現代中国文学の史的概念」(『文学』50・6)、倉石武四郎「中国文学はどこへ行くか」(『世界』51・2)、岡崎俊夫「中国の人民文学」(『思想』51・5)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界，一是如竹内好指出的，整体力量还比较薄弱；另一是如丸山昇指出的那样，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

文革以前の中国文学研究は、やはり中国での見解に大きく影響されてい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事実であり、中国の枠組から、なかなか出ら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です。にもかかわらず、言うべきところは言い、考えるべきことはきちんと考えていた人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は見ておくべきだろうと思うのです。（丸山昇、「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13）

这两种倾向相互交错，彼伏此长，在日本学术界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4、情况的变化

由上述三点构成的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受容的基本状况，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开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经过一场反右斗争，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逐步明显地暴露出来。

50年代後半から文革までの期間になると、中国観も大分変わってきました。一番大きかったのは「反右派闘争」だったと思います。「反右派闘争」になると、丁玲、艾青、馮雪峰などが「右派」にされました。……そういう人が「右派」とされたのは簡単にはのみ込めませんでした。どうも中国は何となくおかし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感じが出てきました。また、50年代半ばぐらいまでのように、日本が被圧迫民族と同じになったなどと、簡単に考えられない状況が出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つまり中国との違いが、もう一度自覚されてくるわけです。（丸山昇、「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21）

这种情况，对原先那种以中国为楷模寻求本国文化建设方向的研究者（竹内好是最典型的代表）来说，无疑是一次强烈的震撼。正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打击中元气大伤一样，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一时茫然。「中国をどう見るかについての全体像は失われたまま、一種の混迷の時期で、とにかく翻訳をしていくという感じだった気がします。」（丸山昇、「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22）能够做出冷静的理解与判断，排除功利的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过是非，虽然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但以此为契

机，与中国官方的正统学说保持一定距离、坚持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态度的学术精神，却在无形中渐渐增强。多年之后，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那场全民族的恶梦中摆脱出来，惊异的发现东邻的学术研究，与他们的经济发展一样，已是硕果累累时，却很难想象，他们曾经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二、郁达夫研究

(一)、总说

这一阶段的郁达夫研究，一方面与整个大的趋势有相一致的地方，同时，由于这一人物自身的复杂性，对他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特殊之处。

前面曾经说过，对本国战争罪行的反省和忏悔意识，是引导一些研究者面向中国文学的动因之一。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史上曾经声振一时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不仅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文学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非命之死，更是一个直接的触发因素。在当时，虽然有些事实真相还不很清楚，但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杀害这一基本事实，已经比较明确。有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对此深感痛心、负疚的同时，开始了自己想要解明他的文学及人生的研究探索。

当然，这还仅仅是一种表面的、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当时那种注重思想的力量，想要从思想方面寻找出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差异这样一种研究者方面的主观因素，同时又把对郁达夫这位位于两国文学的交叉点上的特殊人物及其作品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除了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郁达夫个人气质方面的因素。在当时那一批留学生当中，郁达夫恐怕可以算是在气质上与日本人最为接近的一个了。所以，选择与自己在精神上相通之处较多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因为有上述三方面（主要是前两方面）的因素，在五十年代，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比起前一个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仅仅是战前的一些研究者如岡崎俊夫、小田嶽夫等，继续撰写一系列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有独到见地的；新一代研究者也从此时开始崭露头角。但从总体看来，我们姑且可以把这一阶段称为“蓄势”阶段，或者说是“发展期”。一方面是一时的“中国文学热”，另一方面是竹内好的振臂之呼，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成长于这一时期的研究

者，在下一阶段迎来自己郁达夫研究上的大丰收，已经是势所必然。

这里，我们不妨将这一阶段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和中国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中国在解放初期，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郁达夫选集》，丁易为其撰写序言（序言本身发表于1950年10月《人民文学》第2卷第6号）。这是解放后第一篇论及郁达夫的独立文字，在中国和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但丁易对郁达夫的评价，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很大保留。有些批评比较简单化。在当时出版的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除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郁达夫做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沿袭了丁易的观点，有的甚至是全面否定。1957年，青年学者曾华鹏、范伯群在《人民文学》5、6合刊上发表「郁达夫论」，是五十年代关于郁达夫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那个时代首次全面从正面评价郁达夫的文章。但在不久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从那以后，对郁达夫的正面研究，就一度趋于销声匿迹了。

而在日本，1954年竹内好、岡崎俊夫合编了《現代中国の作家たち》一书（和光社1954年7月30日刊），书中就有“郁达夫”一节，由阿部幸夫撰写。1958年12月，日本最早的郁达夫资料汇编《郁達夫研究資料》油印版问世。1959年，年轻一代学者伊藤虎丸的研究处女作「郁達夫の处女作について」发表，唱出了日本郁达夫研究的雏凤新声（伊藤虎丸的研究，始于1959年，但他的主要成果和研究工作，则集中于六、七十年代及至后来的八、九十年代，所以姑且将他列为下一阶段的代表作家）。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还不是那么很多，但其蕴蓄的那一股内在的爆发力，和中国的万马齐喑，恰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

当然，在那一时期日本的中国文学热当中，同时存在着一些对郁达夫研究来说是负面因素的成分，也是不可否认的。具体的说，前面提到的诸因素中，有一点是日本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方面为了本国新的文化建设的需要而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是集中于那些与日本文化基本异质的、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没有（或者很少）出现过的因素。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英雄的毛泽东、鲁迅比，郁达夫显然无法相提并论。而年轻一些的作家，比如丁玲那样一种表现新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参加革命后的心路历程的作品；以及巴金那种表现徘徊在封建大家庭与革命的主题下的青年的命运的作品等，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从来未曾有过的因素，展示了对日本人来说基本上是完全未知的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还有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成分，因而显得颇具魅力。相对而言，郁达夫则显得不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因为在不少人眼里，郁达夫充其量不过是对日本的“私小说”的模仿。而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私小说”似乎已经是一种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了。从时间上看，郁达夫的纯文学创作，早在1935年就以其《出奔》的问世而告结束。虽然抗日战争期间，他也积极投入抗战活动，写下了不少评论文章。但那既算不上文学作品，更与建设中的新中国文学毫无关系。所以，如果换个角度，说郁达夫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热中受到冷遇，也不为过分。

比如，竹内好在前面引用过的文章里，同时就有这样的话：

今日の日本の文化問題として、中国現代文学が人々の関心をひきつけるようになった状態をつくりだす、さきがけとなったものは、次のような新しい作品の翻訳出版である。黄谷柳『蝦球物語』、丁玲『太陽は桑乾河を照らす』、老舍『四世同堂』。

黄谷柳というジャーナリストの書いた大衆小説『蝦球物語』は、これまでの外国文学愛好者とは別の層、主として勤労者大衆に広範な読者を獲得した。（中略）主人公シアチウ少年の心情・行動が発散する健康さは、今日、大量に生産されている日本の文壇小説一般にないものだ。また、インテリ好みの心理追求の西欧近代小説に食欲を感じない大衆が、この小説に、とびついていったことは、彼らが素朴に、あるいは無意識のうちに、これに広い意味の社会性をみとめていたのだと解釈できないこともない。しかし、それは、現代日本の小説がそれほど衰弱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の反射にすぎないのだ。（中略）日本の私小説氾濫へのひそかな抗議と、新中国への関心とが複合して、『蝦球』がいつのまにか、読者大衆のあいだですばらしい文学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たのであろう。³²

竹内好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价值取向。读者大众对私小说的厌倦和对新中国文学的关心，在一部《虾球传》上得到集中的反映。这里，接受中国的文学，和对私小说的排斥，似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郁达夫受日本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很容易简单的列入被排斥之列。

尽管如此，前面提到的和后面即将提到的那些研究者们，以自己的眼光和爱好，仍然在与大的氛围不十分协调的情况下，选择了郁达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有些研究者，以郁达夫为焦点，来透视中国-日本两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及相互关系，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个别作家研究的范围。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所以才

³²『文学』1951年12月、第19卷。

会有这一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发展。

(二)、分说

前面，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郁达夫研究的总体状况做了一个大概的述说。这里，打算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及其作品，做些稍微具体的分别考察和论述。

1、岡崎俊夫

岡崎俊夫在战前及战后，写过一些简短的有关郁达夫的介绍性文章，特别是在前面提到过的『わが夢・わが青春』的“译者后记”中，提出从新的角度理解郁达夫，以及“重读中国现代文学”（改めて読み直す）的口号，开了战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声。他的这种新视角，应该说，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进入五十年代后，有两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是ナウカ社1950年8月刊『現代文学十二講』中的「第十二講 魯迅と彼をつぐ人々」，其中有一部分为「郁達夫の咏嘆と悲哀」、另一篇是「中国作家と日本」（『文学』第21卷第9号、1953年9月）。

我们先看「郁達夫の咏嘆と悲哀」。全文一共4000字左右，不是太长，对郁达夫的具体论述也不是很多。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断语：

郁達夫はひきつづき創造社の機関誌「創造季刊」等に小説を発表した。それらはほとんど自己の生活に取材したものであるが、その憂鬱をこめた浪漫主義的作風は、五・四退潮期の知識青年の胸をうち、かくて彼は創造社の代表的作家と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大革命後茅盾が現われてリアリズムの大道をひらくまでの間、文壇最高の名作家の地位にあった。彼は、作風においては魯迅の峻烈なリアリズムとは対蹠的な、個人的主観的な、しかもかなり頹廢的な浪漫主義作家であったけれど、魯迅が果さなかった文学革命の新しい面をひらいた点で、魯迅につぐ最初の作家とってよいと思う。

魯迅は深く儒教道德の悪をつきながら、それに抑圧されている性本能については触れていない。冰心その他の作家は母の愛など清純な愛情を描い

てはいるが、男女の愛についてはきわめて上品にしか扱っていない。性のことにふれることを非とする儒教的意識が潜在していたわけで、ここにも世代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るが、郁達夫は青臭いままに青年の中にあるものをすべてさらけ出した。それによって幼いながら文学の近代化を一步すすめたのである。

从文学史的角度，岡崎俊夫给郁达夫以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他不仅是创造社会的代表作家，而且是直到大革命后，茅盾开创现实主义大道为止，文坛上名声最高的作家。虽然在创作风格上，和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对比，他是主观、个人的，而且是相当颓废的浪漫主义，但从完成了文学革命中鲁迅未能完成的课题这一角度看，可以认为他是紧跟鲁迅的最早的一位作家。这主要是从性问题的描写的角度来说的。郁达夫尽管不那么成熟，却把青年们的内心苦恼尽情暴露，由此将文学的现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郁达夫的「咏嘆と悲哀」，他则是这样说的：

そこに（『沈淪』）漂う弱小民族としての悲哀である。むしろこれがあるがゆえにあの青臭さも救われ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の日本および日本人からうける卑屈の感情は、被害妄想的にまでなっている。魯迅の場合もそうであったが、郁達夫はもっとも露わに強くそれを表現したのである。

（「蕩蘿行」など）すべて彼自身の生活をそのままに咏嘆をこめて吐露したもので、日本のいわゆる私小説に近い。しかも日本の私小説と違った印象をうけるのは、その咏嘆が彼一人のものでなく、広く当時の中国インテリゲンチヤ一般に共通するものだからである。

他的悲哀，是由在日本所遭受到的屈辱而产生的弱小民族的悲哀；而他的咏叹，既是自己生活的直接咏叹，同时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广泛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苦恼。

另一篇「中国作家と日本」则比上述文章长一些，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在这里，论者重点考察了郁达夫和日本的关系。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初（1953年）。前面提到的“新视角”，在这里有着稍稍不同的表现。

在文章的前半部，论者用了较多的篇幅，分析了当时的留日生活，对郁达夫

以及与他同时的其他留学生的种种影响。在简述了郁达夫最初的留日经历后，紧接着就分析了他以此时生活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沉沦」，认为：

この小説では、弱小民族意識と女性への思慕—というより性欲—が別々のものでなく、互に触発しあっているのだ。国を遠くはなれて、独りで寂しい。相手がほしい。女がほしい。ところが、自分は日本人一般から軽蔑されている「支那人」だから、女が相手にしてくれないだろう、という意識があって、それがまた日本人への憎しみ、弱小な祖国への哀訴となるのだ。

但是，郁达夫对日本的感情，又绝不仅仅是憎恨。论者从他的自传及稍后的《雪夜》中，找出了许多赞美日本的语句。而且不仅仅是郁达夫。当时较为有名的杂志《宇宙风》，在战前曾出了两次“日本特集”。尽管那时已经称日本为敌国，有过留学日本经历的投稿者们，大部分还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称赞日本的长处。赞美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所取法，但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又使希望没有实现的可能。就只能从心里感到，新兴的中国的存在，是对自己祖国的强大威胁。接着，岡崎俊夫这样论述道：

しかし、それにしても、こうした日本の優勢が「脅威」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ろう。「黄帝の子孫」などという言葉のはしにも見られるように、四千年の歴史と文化をほこる老大中国が、かつてはその弟子であった日本を逆に師と仰がねばならぬ状態、どうせ日本の文化は西洋の模倣で、日本自体からは何ら学ぶべきものはない、学ぶのは日本にある西洋の文化だ、と強がってみても、現実の優劣は掩うべくもない。ここから羨望、嫉妬が生れ、屈辱が生じた。しかし、それだけでは「脅威」とまではならないはずだ。「脅威」はもっと直接身にせまる生理的な危険の予感である。自己の生命や民族の存亡にかかわるような。それはまさに確かな予感であった。決して被害妄想ではなかった。はじめは漠たる予感であったものが、大戦中に早くも現実の脅威となって来た。山東半島の問題、いわゆる二十一ヶ条の要求である。大戦後の平和会議に持ち出されて、これに北京政府が属したことからの五四運動は起った。現実の脅威に対する抵抗がもり上った。そしてついに対決にまで立至ったのである。郭沫若は、われわれは日本に留学したおかげで、日本から国家観念と愛国心を学びとったという意味のことを述べているが、春秋の筆法を用いなくても、中国をして今日あ

らしめ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であるといっても言い過ぎではない。

这样，岡崎俊夫在这里较为具体的分析了日本对中国之构成“威胁”的实际状况。应该说，他的分析是相当客观的。身为日本人，丝毫没有掩饰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构成强大威胁的事实。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即使不用春秋笔法，说使中国成为今日之中国完全是日本造成的，一点也不为过分。言下之意，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轻蔑，激发了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又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直到打出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意思大致相同的话，大约在八十年代末，人们回首中国现代几十年历程时，也曾有人说过。虽然其内涵与岡崎俊夫所说不尽相同。岡崎俊夫在这里设身处地的从中国人的角度，去体会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其背后，自责与反省的精神不难读出。

上述这些还只是泛泛而谈。接下来，就具体到郁达夫了。

しかし、郁達夫の場合、「脅威」はこれだけにとどまらなかった。もっと直接個人の生理にかかわる脅威があった。すなわち満たされぬ性の欲求である。しかも、これこそが、彼の初期の作品の現われている弱小民族意識の根源であるかに見える。『雪の夜』が日本文化論に始まって遊廓の朝の悔恨に終る所以である。

就是说，面对蒸蒸日上强盛的日本，内心感到的弱小民族意识；和只身海外无法得到满足的性的苦恼，二者共同构成对郁达夫的生存的“威胁”，而且生理上性的无法满足，正是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弱小民族意识的根源之所在。岡崎俊夫似乎特别看重性的因素对郁的文学的影响。在文章最后，他这样总结全文：

以上で私は、日本在住によって誘発された郁達夫の心情について語ったが、最後にもう一つ日本が郁達夫に与えたものがあることを附加しておか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このような心理、とくに性の問題をあらわに文学作品として表現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当時の日本の思想界が、中国に残っていた人たちが中国で得たものとはちがったものを彼に与えた。彼の場合も、祖国の五四運動の影響はむろん見逃し得ない。しかし、五四の直接の波の中から生れた魯迅や冰心あるいは葉紹鈞の文学と比べると、異国で出発した郁達夫らの文学はかなり違ったものを持っている。事実魯迅のようなあれほどきびしく儒教道德の悪をついた人でも、その悪に抑圧

されている性本能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取上げていないし、冰心にしても、その描いた愛は母の愛でしかない。性のことには触れるべからずとする儒教の禁忌が潜在していたわけである。これに反して郁達夫が勇敢に性の問題を文学の中に持ち込んであらわに表現し得たのは、一つには鬱積もあったが、同時にそれを吐露させた外的な刺激もあったのである。

那就是当时日本的性解放思潮，同时也是留日生活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一点。这一点，也是促成郁达夫文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这样，一步步分析下来，他其实是把性的问题，作为理解郁达夫文学的一把钥匙来看待的。

总的看起来，岡崎俊夫对郁达夫的把握，一是将其概括为「弱小民族としての悲哀」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咏叹。这与三十年代竹内好的论文中的「人间苦」和「社会苦」的说法，有着异曲同工的相通之处；另一点是对郁小说中性问题表现的认识，认为这既是由留学日本的经验所激发的他的文学的一个原始出发点，又是他的文学所达到的一个成功的高度。

岡崎俊夫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元老之一，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有多数，从他的思维中，可以看出已经具有一种全局的概念。即评价一个作家，不仅仅考察作家自身的因素，更注重从全局的角度，在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同时，考察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他在当时文坛上所起到的特有的历史作用。同时，岡崎俊夫又是比较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研究者之一。不为时代的潮流所左右，应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丸山昇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所赞赏的，实际上就是指岡崎俊夫所代表这样一种精神。这些，对正确判断一个作家的价值，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又常常是为别的评论家所忽视的。

比如，当时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9月开明书店初版，1953年7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对郁达夫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而且评价也颇为中肯。但象岡崎俊夫那样，从和其他作家的比较中找出他特有的积极意义的做法，则几乎没有。而另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7月作家出版社）的作者丁易，虽然也承认郁达夫的作品有积极的方面，

“这些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在『五四』狂飙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正确领导，这种消极的自戕式的反抗，不但对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相反的在客观上对于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

不好的阻碍作用。”

丁易不是从文学建设的角度来把握郁达夫的正面意义，所以基本上持的是否定态度。岡崎俊夫一可以不必顾虑到所谓“共产党的领导”之类的因素，二又能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所以得出的是与丁易完全不同的结论。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的是，从和儒教传统的关系与所受影响这一角度来评价现代文学的作家，认为“性のことによれることを非とする儒教的意識が潜在していたわけ”，这对中国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说，无论是在新文学建设的当初，还是在五十年代，恐怕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一般从表面上看，五四新文学的建设，正是以和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决裂为前提而展开的。而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这也就是美国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八十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震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岡崎俊夫在五十年代就能这样说，除了他本人的学术见识的因素之外，和作为外国学者，与中国文化有一定距离，因而能有较为清楚地有所认识，恐怕也有关系。而他对郁达夫的“大革命後茅盾が現われてレアリズムの大道をひらくまでの間、文壇最高の名作家の地位にあった。”的评价，恐怕要到几十年后，才能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所接受。

岡崎俊夫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元老之一的身分，更主要是他实事求是的文风，较为恰如其分的评价，使他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上述两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本人在四十年代提出的“新视角”的具体体现。冲破心灵的堤坝，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会、去理解研究对象及作品，结论自然与他人不同。是否可以说，岡崎俊夫的文章，在这一阶段，从正面的角度，为郁达夫的评价，定下一个不低的基调。

2、中野美代子

在前面的“总说”里曾经提到，当时日本能够较为广泛地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因之一，是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寻求日本未来文学建设的方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比较容易偏向于丁玲、赵树理、巴金等新世代的作家，而对郁达夫这样的与日本的“私小说”风格相近的作家，则很可能不再感兴趣。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只追随一时的潮流，有人恰恰从潮流中看出了另外的东西。

1954年9月的『北大中国文学』第1号上，有篇题为「まだ整理されない中国文学の古瘡—郁達夫のことについて—」的文章，作者是中野美代子。中野美代

子在这篇文章中，认为

達夫の苦悶は新中国の生誕と一緒に消え去ったのだろうか。達夫的な文学というものが、現代中国文学に発展し得ない素地は、既に頑強に構成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私の疑問は、なかなか消えていかない、それは私の小ブル的な郷愁であろうか。私は、達夫の文学的カチ設定の前に戸惑いするのである。なにか中国現代文学の様々な序列の中に古瘡のようなものを感じてしまうのである。

……

さて、中国の新文学の頂点にたつ大物たちが、例えば丁玲にしろ、巴金にしろ、老舎にしろ、その出発点に於て、西欧的小説の方法に対して、又中国伝来の礼教道德に対して、いろいろな複雑な「うしろめたさ」（武田泰淳の言葉借用）を持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は想像にかたくない。彼らが、そのようなコンプレックスを断絶させて、「世界文学的」系列にまで発展するためには、その断絶の苦悶が、如何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ろう。仮に達夫が生きていて、と仮定してみて、彼が、この断絶の苦悶に耐え得たであろうか。彼が「苦悶の作家」といわれるのは、中国の礼教道德に反抗し、弱々しい自己の裸身を正視する、そのことにあったようである。だが、彼が、文学者として、私小説的な作品にどれだけ自己満足を得られたかということはかなり疑問に思われる。

……

新しい中国の創造は、その性質上、極めて劃一的な人間変革の場に於てなされた。この文学への反映が、趙樹理文学などに代表的にみられる「新しさ」である。だが、趙樹理文学の政治的明確さ単純さが、果して今後そのままの形で持続し得るであろうか。世界文学という新しい考え方に於ても、趙樹理の「新しさ」は、まだ未確定なものである。そして、その明確さ、単純さによって、私などが小説的「面白さ」を感じ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私自身の意識の階級性を抜きにしても、充分にあり得ることである。飛躍した中国現代文学のポジションが、その飛躍と断絶を埋めるべく、私共は何を考えたらよいのだろうか。そして劃一的な階級闘争、抗戦などのモチーフ、構成に、より豊富な、より高次元のフィクションを與えるべく中国文学の進路は、どの様に発展するであろう。それに郁達夫的な要素を、と速断するのではない。達夫が味わおうとして遂に味えなかった、あの

「断絶の苦悶」が、止揚されたあるものを期待するのである。

这篇文章本身并不长（此处引文已占原文近一半左右），作者本人的观点，在这里也并没有充分展开。而由此文所显示的作者的敏锐性却足以另人拭目。因为后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果然如她所预言的那样，不那么单纯和明确，而是走了长长一段弯路。中野美代子在这里不是以鲁迅，不是以郭沫若，而偏偏是以郁达夫来作为问题的焦点，显然是注意到郁达夫的文学在整个新文学建设中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同时，这篇文章的意义，也不在于郁达夫研究本身。它一方面揭示了郁达夫文学的特殊含义，期待着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能有新的进展与突破；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在接受中国文学时不要一边倒，对郁达夫这样虽然已成为过去、其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仍然存在的作家，也不应轻易忽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认识郁达夫和他的文学，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这两点，才是此文的真正意义。遗憾的是，作者此后虽然推出了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少成果，但真正专门论及郁达夫的，却几乎没有。联想到她在这篇文章中如此敏锐、深刻的观点，不能不让人感到若有所缺。

3、阿部幸夫

1954年7月，竹内好、岡崎俊夫合编了『現代中国の作家たち』一书（和光社1954年7月30日刊），书中有“郁达夫”一节，执笔者为阿部幸夫。此书出版于五十年代前半期，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前面提到的中野美代子的文章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就引用过此书的一些说法。

在文章一开头，阿部幸夫就指出，郁达夫是与鲁迅共同开创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但对丁易在「郁达夫选集·序」中，对郁达夫最后的小说「出奔」给以较高评价，认为是其整个创作中难得的好作品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且就以「出奔」为焦点，对郁的全部创作做出自己的诠释。

「出奔」写于1935年。此后两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そうした社会情勢が、郁達夫をして文筆よりももっと積極的な抗敵行動へと走らせたとも考えられる。だが小説の筆を絶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彼にとってもっと本質的作家としての悩み、苦しみが、この『出奔』にあ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原因が『出奔』にあるというよりも、『出奔』を含めて彼のこれまでの殆どの作品にあるという方が正しいかも知れない。私が見るところでは、この『出奔』がこれまでの作品と格別異なったもので

ある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のである。『出奔』を仔細にみるならば、底に流れるものが、（葉丁易がこの作品に与えた高い評価にも拘わらず）現実に対する色濃い敗北の意識であることに気がつく。暗い、抜け道も見出しえない現実に、激しく立ち向か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彼のロマンチズム—創造精神—が、なお一筋、光明への道を求めて彼に『出奔』を書かせたものであったろう。郁達夫の殆ど一人角力にも等しい必死の抵抗も、それをせせらわらう様に現実の社会はめまぐるしく推移して、彼は翻弄し尽く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出奔』には、この彼の憔悴ぶりが窺えるのである。

在对『出奔』的主要内容做了阐述之后，阿部幸夫这样说：

葉丁易がいう如く、「地主階級に対する仇視・憎悪の心情」には「人を震撼させる力量」すら備えており、…（中略）しかし、『出奔』の創意はむしろ後半の件り、銭時英に向けられているとみるのが至当であると考え。…（中略）この二つが交錯してかもし出す当時の中国の複雑な社会情勢に、右に左にゆすぶられる知識層の痛ましい姿でもあったろう。そして最後には「放火、一家焼殺」という誰の目にも前世紀的な蛮行としかうつらぬ報復手段で終るのであるが、こうした極く幼稚な結末しか用意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あってみれば、これはやはり作者自身の社会意識の問題に還元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回想当年，郁创作『沈淪』，

この「現代人の苦悶、つまり霊と肉の相剋」（『自叙』）を弱小民族意識に結びつけて白日の下に曝し出して、似而非道学、士大夫階級的な虚偽に対して「暴風驟雨にも似た閃撃」であり、「発狂せんばかりに震撼」

（郭沫若『論郁達夫』）せしめた郁達夫の最後に辿りついたものが「放火、殺人による報復」であったことは何とも言えない寂しさを感じる。だが同時に、『出奔』を発表するまでの十数年の作家生活における郁達夫の苦悶—中国の現実社会を暗黒と見、その暗黒から遁れ出ようとして遂に路を見出し得なかった彼の苦しみが読み取れるような気がして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说从『沈淪』引起的最初的震动，到『出奔』由杀人放火进行报复的结局，让人感到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寂寞。同时，由作品中也能读出这十多年来作家在

黑暗寻找出路却难以找到的苦恼。

在第二部分，阿部幸夫追根寻源，从留学日本时代讲起：

こうした近代の文学に触れることによって目覚めさせられた彼の自我は、その自我が環境に容れられぬことを知ったとき、この環境をあくまでも憎悪し、真正面から立ち向かう激しいロマンチズムの精神となった。同時にまたこの精神は、自らを敢えて汚濁の中に没し去り、自らを虐げることによってわずかに自己への勝利感に酔わしめ、或いはまた、自らを敗北・締めにも似た感傷・頹廢の世界に沈潜せしめる知識人の痛ましさを持っていた。この創造精神が郁達夫をして、『沈淪』、『春の夜』、『薄奠』、『雪のあした』、『寒風の中に』、『遅咲きの木犀』、『東梓関』等々の作品を書かせたのであろう。

在对这些作品做具体分析时，他特别注重从个别作品中找出共同的东西。如在简介了『沈淪』之后，阿部这样说：

何か一つのことに直面した際に、彼は自分の考えていることを何から何まで全部、むき出しのままぶちまけ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らしい。この激しさは彼のすべての作品の基調となっている。

『春の夜』之后，又是这样说的：

『沈淪』において、なぜ中国が西洋の列強はじめ日本にまで馬鹿にされねばならないかと悲憤し、問題を提起して多くの共感を呼んだが、ついで彼の目は、この『春の夜』では買弁資本下の工場搾取制度に向けられた。可憐な女工二妹の口を籍りての弱々しい仇恨であるが、こうした制度の下には全然といってよいほど無力なインテリを対置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憎悪を一層明確なものとしている。しかしこれは、嫌な工場を呪い、失業の身を嘆いてはみても、それ以上には何も考え及ばない、ただ善良なだけの弱い人間が描かれたにすぎない。郁達夫の作品に登場する人物は常に、底抜けに善良で且つ無気力な人々であり、彼のナイーブな神経は、いつもこの無力な人を限りない愛情で包んでいる。これが、彼をして最後まで苦しめる遠因ともなっているのだが、とにかく郁達夫とはこうした人であった。

郁達夫が現実の社会問題に直面しての意識の曖昧さは、彼の祖国愛の熱情とは無関係に、その後の彼の方向を「苦悶への道」と決定づけてしまった。

在引用了郁達夫『文学上の階級斗争』一文中反对将“人生”与“艺术”分割而論的观点之后，阿部说：

この文章が階級闘争のためのスローガンとしての目的で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ってみれば、これをもって作家郁達夫を割り切ってしまうことは冒険で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彼が文学に対して持った認識の中のある部分を占めていたことの例証にはなると思う。この曖昧さが、激変する社会にあって彼の処すべき態度を明示し得ないようにしたのではなかったろうか。

最后，阿部幸夫这样总结道：

『沈淪』に出発して『出奔』に終るまで、彼が一貫して胸に抱いていたものは、やはり現実の暗黒な中国社会への叛逆の意図であり、それは祖国愛の限りなき熱情を秘めた叛逆だったのである。惜しいことに彼は問題を常に「人」によって、「人間の善意」のみによって解決しようとした。何度も繰り返すのだが、だから郁達夫は、最後までどうしてこの暗い現実を吹き飛ばしたらいいのか見当もつかず、出口を求めて放浪を続け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である。或いは『沈淪』の如く「中国よ富強になれ」と叫び、『春の夜』の如く工場の搾取制度を呪い、また自分を含めて青年の無気力を嘲笑し、『薄奠』の如く上流階級に唾し、或いは『煙影』の如く弱々しく社会悪を責め、『過去』に耽溺し、或いは『雪のあした』で社会主義へ近づこうと努力し、『寒風の中に』の如く悲しみ眺め、更には後退して『遅咲きの木犀』における無気力な現実肯定、『東梓関』の如く「名士」生活へのあこがれ等、およそ人として考えうる限りの方法で壁に立ち向かっていった。しかもなお、郁達夫の唯一の希望は叶えられなかった。最後の『出奔』はこうして失意のうちに書かれたものといえないだろうか。

彼の自虐的傾向は、こうした失意、敗北感の原因を常に主人公一人、即ち自身に帰した。此処『出奔』では、銭時英という弱々しい革命家に帰したわけである。地主階級の本来持つ悪虐ぶり、そしてその呪うべき性格が好むと好まざるとに拘わらず子孫の体質となって持続される。だがそれに

対して自身の曖昧さの故に如何もできない錢時英……。『出奔』にはそれまでのものと些かも変らない郁達夫の姿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る。

阿部幸夫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论及郁达夫的第一篇较为全面的作品。前面介绍过的岡崎俊夫的文章，受篇幅所限，用的是归纳性的写法，对郁整个创作情况的分析不是太多。而阿部幸夫在这里，以『出奔』为焦点，对郁的创作做了一个贯穿性的考察。他认为，从开始的『沈淪』到最后的『出奔』，有些东西是贯穿始终的。比如，与黑暗现实尖锐对立的浪漫主义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的浓厚的失败意识，善良而又软弱的人物，特别是在社会形势激烈动荡的时代，知识分子被时代或外部环境所左右的痛苦的动摇，以及他自己的社会意识的不明确性等等，都是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的。

阿部幸夫的文章，应该说有他自己的特点。论者的根据，比较集中于作家和社会问题的关系。他比较仔细的考察了郁达夫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或冲突时，作为一个作家的处理或解决方法。他也把郁和鲁迅、郭沫若做了简单的比较，结论当然不会令人满意。问题是，阿部幸夫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反映了竹内好学说的潜在影响，即比较偏重于对思想因素的考察，特别是对作为文学家的作者，对人生及社会问题的认识、把握和表现。而对整个艺术风格的发展及变化，却不是十分重视。后来的伊藤虎丸，也是主要考察了郁达夫的创作和思想方法的关系。但无论是对问题的深度还是广度的把握，都在阿部幸夫的基础上，大大向前迈进了许多。

4、松崎治之

1956年3月，在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芸座談会ノート』第7号上，有篇題為「創造社脱離後の郁達夫」的文章，作者为松崎治之。这篇文章共有六部分，主要考察了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以后，一直到战争中死于敌手这一阶段的创作。作者的分析与论述，在方法上和前人有所不同。

关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般的说法，是认为郁在大革命斗争激烈的时代，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落后于时代（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到七十年代才有铃木正夫出来做“翻案”文章）。而松崎治之却对他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的创作做了比较具体的考察。

在“（一）序”中，松崎对郁达夫1928年-1942年的创作，开列了一个主要目录；

在“（二）創造における心境”里，论者先有一个总的评价：

この頃から彼は創造力が次第に衰退し、紀行文を主とした散文の世界に逃避していくのである。—そこで二、三の小説以外は、ほとんど遊記、随筆をものしたのみで、文壇の第一線から退いて行った。

1928年以後、何故彼が紀行文の世界に逃避せ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かに就いて考えると、

（一）処女作「沈淪」（1921年改作）以来のどの作品を見ても、大自然の風景描写が特に勝れていたことを思い出せば、この傾向は特別視する必要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二）それというのも又彼が没落してゆく旧読書人の出であって、内に潜在していた「山水自然への耽美」の傾向が、社会と人間関係に強い失望、懐疑をもち始めたこの時期に至って、濃厚に表面化したものとも思われる。

（三）更に此の時期は、丁度中国革命が表面上挫折していた時期で、特に蒋介石統治下の上海に於いては、時務^{ママ}によって殺戮、鎮圧を厳行する白色テロの世界であった。故に彼の動揺を進展させ、遂に彼をして左連を脱離せしめ、文学者として最も安全な紀行記の世界に逃避せしめたものであるかとも思われる。

认为他出身于旧诗书之家，一种与生俱来的耽溺于自然山水的倾向，随着他对人间关系和社会的失望，而逐渐强化。同时还有外界白色恐怖的因素。不仅仅是认为他逃避于自然山水，对于整个这一阶段的创作，松崎的评价都不是太高。在上述三点概括性论述之后，松崎引用了大段的郁达夫的自序类的文字（如「在寒风里」自序等），然后这样归结道：

あくまでも固い殻で自己を護り、時代の波に応じて、革命をなすこともできず、方向を転換することも出来ずただ自己の意志薄弱な姿と、乞食の様な自己の姿を嘆き悲しむことを吐露し得るのみで、積極的に自己以外の道にすすんで邁進する勇気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但是，论者并没有简单的停留于此，而是对郁的创作风格及变化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考察。

創造社を離れてから作風にも著しい変化が起り、初期の「沈淪」（19

21年改作)及び「日記九種」(1927年執筆)の様な主情的自我表現から客観的な現実描写への方向(「故事」及び「馬蜂的毒刺」等)を辿り、創作手法も完成の域に接近していった。

对于这一时期的「在寒风里」,松崎表现出较多的关注:

そこで、哀愁味の深い文章(「在寒風裏」等)はずっとおちついてうまくなっている。それに又「在寒風裏」は、傑作「過去」(1927年1月執筆)と清純な小説「遅桂花」(1932年10月執筆)「東梓関」(1932年執筆)等とを結ぶスタイル完成の道程を示しているともいえよう。迫力は弱い、閑寂化した心境を吐露した身辺的なものとして成功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うして1932年になると、数年来衰退しつつあった創造力を再び盛り返し完成された作品として「遅桂花」「東梓関」を発表するに至る。「過去」を書いた郁達夫はいくらか自信をもってきた彼の文学をどう成長させるか、又一頓挫をきたした革命に、自己をどう関係づけるか等を、真剣に考えたことと思われる。この時期に「在寒風裏」が生まれたことはその意味から注目さるべきだろう。—彼が永い間書きたがっていた家庭の不和による悲哀—達夫は自己の過去を回顧しその体験を土台にして、生きる道を発見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

说他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以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为基础,一直想要表现的由家庭不和产生的悲哀的主题,和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探索。

在引用了郁达夫1931年的「忏余独白」中找不到出路的一段话之后,松崎这样归纳:

つまり一時は郭沫若等と同様、革命文学の道に邁進していったが、その革命は途中で挫折せざるを得ない運命となり、その上個人の生命の維持が極めて困難になってきた。そのため革命文学の口火を切った創造社は閉鎖をくらい自己を守るために例えば、郭沫若は亡命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然し郁達夫には亡命してまで革命文学への自己の意志を貫き通す気力はなかった。—故に職を失い、朋友肉親を失った達夫には墮落、頹廢、沈湎という心の動きしかあり得なかった。

独りよりのこされた達夫には、常に幻滅のみが付きまとっていた。自殺することもできず、又殺されたくもなかった。ただ何とかして生き抜くこと

のみを考えていたのである。—そのことは既述した「在寒風裏」の自序の言で伺うことができる。結局かような危険な社会に於いて、生命を維持する唯一の方法としては革命に関係のない第三者、即ち革命逃避者になるより仕方がなかったと見えた。

就是说，除了逃避革命以外，在当时的形势下，郁达夫没有别的出路。

第三章，文学史的动向和达夫的位置。这里，论者简述了1927年至1932年革命文学论争及“左联”的情况。并简单的提到，文人趣味的郁达夫，在文坛斗争激烈的时候，参加的是林语堂的『人间世』及其后的『宇宙风』。

在第四章里，松崎对与「在寒风里」属于一种风格的「迟桂花」、「东梓关」等，也予以较多关注。他这样分析道：

此の「遅桂花」で郁達夫が、混沌とした当時（1932年）の社会から自己を隔絶して、山村での気ままな消遊の生活に閉じ籠り、そこに生じる人間相互間の些細な喜憂に半ば羨望し乍ら書いていることが伺える。

阿部幸夫氏がこの小説について「達夫は、人間関係の微妙さを信頼の二字で解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現代中国の作家たち』（1955年、和光社出版））といっている様に、人間相互間においての信頼を強く浮きだした所に、達夫独特の淡いヒューマニズムが伺われると言っていいであろう。とにかくこの「遅桂花」は、達夫が杭州へ引っ込んでから後のもので、初期の溢れんばかりの情熱は見られないが、然し彼独特の官能的な描写はまぬがれない。…初期の作品（「沈淪」「南遷」「蔦蘿行」等）に於いては、自然への憧憬を示しつつも、やはり作者自身は尚人間界で塵勞の身にもだえていたのであるが、ここに至っては最早や完全に、自然の中に身をおいている。それはやがて創作の筆を絶って遊記、隨筆に赴く前兆と見られる。何故ならば小説は、人生に対する飽くなき探求の意欲が基調をなすからである。

人間生活に疲労した後、大自然に逃避するのは「陶潜」をはじめとして中国の文人の常事である。

对于「遅桂花」、「東梓関」，丁易提出了“这种不劳而获的地主剥削农民的行为，作者却丝毫没有触及”和“作者似乎只看到他们的悠游闲适的生活，而致

以向往之忱，但却忘了这悠游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怎样的血泪的经济基础之上。³³的批评。松崎引用了丁易的评价之后，这样说到：

この評価はたしかに当を得ているが、前にも述べたように失職、失友に幻滅し、沈湎して安心立命を専らとしていた彼には反感を暴露して逮捕されるより生来の筆法で人生に於ける普遍的人間味や閑寂な田園山林への羨望心を吐露して自己の文人的なものを明白にさせる方が彼にとってはやはり忠実な道と思われ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丁易の様に社会主義リアリズムの基盤上に立ってこれを非難するのは彼には少し無理なことではなかったろうか。

对于郁达夫的关门小说「出奔」，松崎的看法和阿部不同：

この作品はこれまでの私小説風の作品とは異なった客観的作風を持っている。

对丁易对「出奔」的较高评价，松崎又唱了一点小小的反调：

かような丁易の高い評価に拘わらず達夫独特の現実に対する色濃い敗北の意識描写が目立つ。只ここにはこれまでの達夫の作品に見られなかった視野の広さと客観性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点進歩前進と言う評価も当を得ているであろう。

论者并没有将自己的眼光仅限于郁的小说。

中国と日本が全面的な戦争を開始した。当時のこの緊迫した中日関係であってみれば、その相手が嘗て（「沈淪」執筆時代）、彼（達夫）が復讐を叫んだ国だけに達夫をして文筆よりも、もっと積極的な抗日行動へと走らせたとも考えられる。然し翌三十六年に彼が「徒然草」を訳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合わせると、彼が「出奔」を最後に小説の筆を絶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達夫にとってもっと本質的な彼自身の生き方に於ける矛盾に作家としての苦悩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その原因がただ「出奔」にあるというよりもこれまでの彼の作品全部にあるといった方が正しいだろう。私が見る所によればこの「出奔」がこれまでの作品と格別異なった逸

³³丁易：《郁达夫选集》序

品であるとは、どうしても思われない。ここで「徒然草」を訳したことについて考えて見ると、—

…（作者が）云々と言った効能書も附されているが然し抗日の盛んな時に敢えてなされた彼の華訳の目的が、こんな実利的な所にのみあったとは到底考えられない事で、彼の徒然草作者の逃避的世界を愛好し又その精神に共鳴する姿が見出される様である。

总的看起来，松崎治之的这篇论文，是很有特色的。其特色在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自己论述的对象，并不是持一种简单单一的标准，而是比较能够实事求是的做出分析和评价。一方面他对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以后的行动，特别是政治态度等，评价不是太高；但对其艺术创作的变化、进步，评价与分析还是比较切实、中肯的。他对郁达夫特有的“生き方”非常重视。认为这既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所造成，同时也是决定作家选择自己的创作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丁易的观点时有引用，但也时有反论。反对的根据，主要就是他认为丁易有的说法不太符合郁达夫的实际情况。而他坚持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的“生き方”。当然，他对郁达夫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的评价恰当与否，还可以另作别论，但起码在这里，像中国那样过分强调思想与艺术的统一，往往因思想的因素而对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全面否定的错误，松崎是避免了。而且，在日本的范围内，他也对前人如阿部幸夫的略显单一的结论，有所补充和发展。

除了上述几位，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有关人士写的有关文章。比如文人横光利一、江马修、金子光晴等的回忆性记述，在此时问世；伊藤虎丸第一篇研究之作发表，则预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的展开（有关伊藤虎丸，将留待下一节及其他章节作集中论述）。

（三）、小结

总而言之，基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特定阶段，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本文所论的郁达夫研究，比战前有着很大的发展。这在客观上，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败战后知识分子中的忏悔与反省意识，和寻求新的文化精神建设方向的需求等方面的因素。主观上，有竹内好的以“现代中国论”为中心的“问题提起”等因素的影响。几方面因素的结合，使人们对郁达夫

—这一深受日本文学影响、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中国作家的研究，一方面比前一个阶段，有着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带上这一时代的影响及特点。

具体的说，是否可以认为有这样几点：

1、与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交流；

首先，从两国文学资料流通的角度看，五十年代，既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封锁与闭塞，也不同于中国进入文革后的中断与停滞，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时期。中国的学术动态、研究成果等，比较迅速的就能传到日本来。这些内容，又比较迅速的在日本的研究成果中就有所反映。比方说，前面提到过的丁易的『郁达夫选集』序等。1957年，中国的『人民文学』5、6两期合刊本上，登载了曾华鹏、范伯群的长文「论郁达夫」，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在当时，『人民文学』是日本人了解中国文学最新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非同寻常的登载一篇大部文学评论文章，而且所论又是人们所关心的郁达夫，很自然的会有所反响。比如曾在二、三十年代活跃一时的山口慎一，就以此为契机，写下一些回忆性文章（『大安』第4卷第3、12号）。「论郁达夫」在这一阶段以及以后的几位研究者的论文中都被借鉴、引用，对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换个角度看，中国国内本身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还算正常。在最初出版的一批现代文学史中（以王瑶的为代表），对郁达夫的评价虽然参差不齐，还是基本上比较公允。对郁达夫的文学及其价值，尚未能给予充分的评价，但比起后来的全面批判，已经算好得多了。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此时尚属于正常化阶段；而日本，也正处于对中国的特别“热恋”期。所以，可以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包括了郁达夫研究），在这一阶段，正好位于两条直线的交叉点上，占据了一个时间上的有利空间，使其能够得以较为顺利的向前发展，并为下一阶段的重大突破，蓄集了充分的力量。

2、竹内好的影响

前面说过，竹内好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比较大。这影响不仅在于他的“竹内好鲁迅”和“现代中国论”等具体著作，更重要的是由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思维方法及价值取向。

从总的价值取向上看，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的新文学是高度正面评价的时期。如前所述，客观上日本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形成很大反差，使得日本的“战

后民主派”在反省战争罪责、批判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很自然的将中国作为一个正面参照系（对中国的批判性认识，要到下一个阶段才开始出现）。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现在看来，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归根到底是想借助中国成功的经验，来批判日本现代化的表面成功、实质上的失败。问题意识的重心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就显得对日本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尖锐，而对中国的认识，则有些失之于表面化和理想化（如前面“竹内好学说的缺陷”中所举之例）。另一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中，对鲁迅代表的“主流文化”和郁达夫所表现的“非主流”倾向的差异，如何把握与评价。在岡崎俊夫和阿部幸夫那里，这种“差异意识”还不明显。他们比较共同的认为郁达夫是在当时紧接鲁迅之后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直到八十年代，伊藤虎丸才对这一点做出比较明确的阐述与反思（见本章第四节二-2）。

重视思想的力量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固然是那个时代使然，但竹内好的著作、学说，又特别强化了这一倾向。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的论文中，也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反映。比如前面介绍过的岡崎俊夫对郁达夫的「沈淪」的反封建的积极作用的评价，阿部幸夫认为到「出奔」为止的郁达夫的失败的摸索，等等，都是偏重于从思想的角度，来寻求、归纳郁达夫的文学特征。而且，这样一种学术倾向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一时期。象伊藤虎丸那样较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是在此时就开始接受竹内好的学说的影响的。在下一阶段他的硕果累累的研究业绩中，必然带着这种影响的浓厚色彩。

重视思想的力量，从思想的角度来认识、评价一个作家的价值，并非不可行。只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所谓重视思想的力量，是有特定内涵的，而并不是泛泛的重视所有的思想。这内涵，就是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参照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思想体系。以这一思想体系为准绳，对作家、作品做出自己的判断。在当时，这种思维方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无可厚非。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日本两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它本身的不尽合理之处日趋明显，终于使人们对这样一种方法进行重新认识、重新审视变得势在必行时，同时也就宣告了那一个时代的结束。当然，即使是在这种时代风尚之下，每一位研究者的方法不同，其表现程度与导致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一些，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的。不管怎样，这一时代的特征，在那一时期的郁达夫研究中，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3、“同时代性的共感”及其过渡

在这一时期的郁达夫研究中，还有一个比较潜在的因素，即研究者的“同时代性的共感”。“同时代性的共感”这一说法，出自丸山昇。他主要是指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言。原文是这样说的：

かつて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の動機をささえていたいくつかの精神的基盤は、今日状況が大きく変わったなかで、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ていると言わざるをえないと思います。たとえば、中国文学研究会、これは漢学としての中国研究ではなくて、もっと文学としての、同時代に生きる人間としての文学という、ある種の同時代性からの共感にたつ中国文学研究であったと思うのです。³⁴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34年，解散于1958年（据立间祥介「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譜」（复刻『中国文学』別冊）1971年3月）。主要成员有竹内好、岡崎俊夫、武田泰淳等（小田嶽夫是后来加入的）。从三十年代成立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解散，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为两国文学的相互交流，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研究、介绍，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比如前面提到过的竹内好、岡崎俊夫合编的『現代中国の作家たち』（1954年7月），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编写的『中国新文学事典』（河出文库、1955年11月）等。

由于竹内好在日本思想界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会”也一度具有较大的思想及文学上的影响。研究会早在战前就成立，加上其成员在年龄上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相接近，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一直和中国作家有所接触和交流（如郁达夫1936年访日时对他的接待）。同时，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中，确实可以看出一种“同時代性からの共感”和对于“同時代の文学”的理解。所谓“同時代性からの共感”，我的理解，就是更多基于相同时代性而产生的感性上的共鸣与理解，而较少由于时代的距离而表现出的“局外人”的冷静、理性的抽象概括与判断。这一点其实在前一个时期竹内好的「郁达夫研究」、以及岡崎俊夫的译后记中就有所反映，特别是岡崎俊夫在战败后那一时点，认为是战争失败的因素，冲决了日本人精神上的堤坝，使他们能够从郁达夫的作品中读出相通之处，并提出要重读中国文学的口号，实际上开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新时期的先声。在本时期，则主要表现在岡崎俊夫和小田嶽夫（小田嶽夫文章将在第四章中介绍）等人的文

³⁴丸山昇「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の視角・枠組みを考える」（『野草』第39号、1987年、14）

章中。因为有这种“同時代性からの共感”，所以，他们对郁达夫的评价往往较多正面评价和出自内心的理解。而这“同時代性からの共感”，一方面，是对前一时期的继续，同时，随着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的逐渐减少和该研究会的解散，在以后的时期中，就很少再有表现了。换句话说，所谓“同時代性からの共感”，既是基于“同时代性”而产生的，那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趋于消亡，是否也是势所必然的呢？

以上，是对五十年代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状况的一个大要的认识与叙述。

第三节 鼎盛期—六十年代

一、两国文化及文学关系③

进入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与过去相比非常明显的变化。作为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文学研究，当然也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先简单看看中国的情况。

关于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资料，从各个角度，做了极为详尽的分析与说明。这里，就不再枉加赘言。只是就与文学研究有关，特别是与郁达夫研究有关的情况，做一些简短的回顾。

在前一部分的叙述中曾经讲过，五十年代，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还算“基本正常”，那也只是与这一阶段相比较而言。其实，早在1957年前后，毛泽东一面高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一面以此“引蛇出洞”，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就已经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一击。从那以后，想要在学术上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提出不随大流的一家之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六十年代初前后，由“三面红旗”政策导致的人为灾害，使国家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共产党在对经济政策做出调整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的统治稍稍有所放松。但好景不长。毛泽东终于不能容忍对自己的错误的清算，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国家又一次推进黑暗的深渊。

下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情况。

如果说在前一个阶段，日本和中国曾经有过短暂的相通之处的话，到了这一阶段，则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

首先，对日本来说，经过了战后和美国“占领政策”，终于在安保条约的伞影下，走上自己的重新发展之路。虽然这条路是建立在包括对内接受美军冲绳军事基地长期存在、对外对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不赔偿、朝鲜战争时的大量军火生产等等不合理事实的基础上，但日本的经济，毕竟还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起飞了。起步于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在此阶段得以“高度成长”。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

在这样完全相反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上，两国间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当然也与前一时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1, 民主运动的高涨

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问题伴随发生。这些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对社会的其他方面,自然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种种影响。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从战后结下的那种特殊关系,在日本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乃至今日,都起着很大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影响。1960年,日美双方政府开始改定安保条约的交涉,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反对运动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动员的组织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一次运动中,不仅青年学生们冲锋在前;被称为“市民社会青年型”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们也十分活跃。以丸山真男、竹内好、鹤见俊辅等为代表,一方面结成“安保问题研究会”,发表各种政治见解与言论,反对岸内阁的一意孤行;同时,在运动的不同阶段,相应的采取不同行动(如竹内好在条约强行采决后的第三天,毅然辞去都立大学教授职务以示抗议),在当时的激烈斗争中起到了精神领袖的作用。

六〇年安保における大規模な抗議行動の背景に再び国家により戦争に動員されるのを拒否する日本人の戦争体験に基づく抵抗の姿勢があ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り、また、人々にかつての戦争の記憶を思いださせる政治家として当時において岸信介その人ほど象徴的な人物はいなかった。そして、日本の知識人は戦争中ファシズムに何ら抵抗できなかった苦しい経験の反省のうえに立ち、各々に独自の戦後の思想と行動を築いてきたのであった。

35

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月の一ヶ月の日本人の政治的経験は、それに対する意味付与の点では知識人の間に様々な議論をもたらしつつも、政府の強引な行為に対する多くの国民の政治的な抵抗の物語として、のちのちまで語り継が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すなわち、多数党が構成する政府といえども、権力の行使には限界がある、政府がそれを越えたとみなされたとき、少なくとも六〇年安保の規模で国民の抵抗が起こる、という広く共有された認識の成立である。それは、戦後の日本における民主主義の確立の物語であった。³⁵

³⁵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世織書房1995年1月刊、P 341。

³⁶同上、P 548。

这样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全民动员的大规模民主运动，令人想起中国几十年后的“天安门事件”。虽然斗争内容、政治背景等完全不同，其功过是否也还有待后论，但形式相似的民主运动，却都在各自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可抹灭的重重一笔。

整个六十年代，除了安保条约的斗争，还有早于此时的反对“警职法”改正的斗争；稍后些的“原水禁”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冲绳回归；大学校园的“学园纷争”，等等。

一九六十年代末の激化した社会運動は、一方で旧来の革新勢力にあきたらない青年学生層のエネルギーを吸いあげ、七〇年代安保を前にして大きな運動となった。しかし西ドイツやフランスのように政治的勢力をきたえあげることもなく、アメリカのように少数派の人権尊重という社会の改革をもたらすこともなかった。ただその運動の参加者の中から、その後各地域での市民運動の担い手が生み出されており、「全共闘」世代と呼ばれている。³⁷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风雷激荡的民主运动，对日本的人民，特别是日本的知识分子，是一一次次强烈的冲击与震动。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思想界领袖，在运动中提出了各自的学说和理论，也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与扬弃。六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和明治维新一起，永远的留在了日本现代史上。

2、思想界的分化

六〇年的安保运动之后，日本的思想界，出现了大的分化。造成这一分化的原因，有国际国内、主观客观等许多方面的。

首先，从经济基础看，六十年代前后的高度成长，使得日本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不仅挣脱出战后贫穷困窘的状况，而且一跃进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后，原先对政治一直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的学说，就不太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变得越来越行不大通。

其次，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也冲击和改变着人们原先的认识。五十年代冷战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到了六十年代，由中苏两党对立的公开化而被改变。在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那里，

³⁷『日本現代史』、藤原彰等著、大月書店1995年刊、P206.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性质，被其他的问题所改变。“原水禁”运动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及中国对苏联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攻击等，都加深了人们的幻灭感。而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在共同关心中国的人们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与分歧。

从思想家们的主观因素看，安保运动最后是以岸政府的强行采决而告终。虽然岸信介本人在此之后立刻下台了，但条约在一个月后的自然生效，实际上意味着民主势力的失败。这一失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败感，有的思想家由此开始“转向”。

比如说，在安保斗争紧锣密鼓之际，知识分子、文化人等的几个组织同时都参加了的惟一的一人——清水幾太郎，当时是态度最为坚决的。在安保斗争中他始终表示支持的激进派“ブント”，在后来的“原水禁”斗争中四分五裂，清水十分失望。1963年他的「無思想時代の思想」（『中央公論』七月号）、「新しい歴史観への出発」（同十二月号）等重要论文的发表，标志了他的思想的划时期的转变。他认为，由中苏对立的公开化，转变了人们过去简单的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区别的看法，而代之以对该社会是否实现了产业化来进行评价。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是由经济成长阶段的不同而造成的。由信奉马克思主义，转而到信奉经济学家W·罗斯托夫和他的著名著作『经济成长的诸阶段』，清水的转变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颇有代表性。虽然他在七十年代滑向「天皇论」的歧路，但他在六十年代提出的一些理论，却是不无建树的。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曾在安保斗争中被视为精神领袖的丸山真男，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学纷争”中，居然成为青年学生批判的对象之一。这其中，既有各种思想、主张上的分歧，有世代的差异，有涉及大学管理及对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市民社会青年型”的思想家或者说是“战后民主主义派”时代的结束，和思想多元化或者借用清水幾太郎的话说，“無思想時代”的到来。

3. 和中国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从文化和文学的意义上而言），当然也和前一时期有了很大不同。

五十年代初期，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思想家，曾经将中国革命的成功作为一面镜子，来批判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进程的做法，确实唤起过人们对中国的热

情。现在，不仅中国的“军事的封建的社会主义”³⁸的真相逐步为人们所知，而且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将全民族拖向贫困的深渊。虽然还不能简单断言中国经济建设的失败，就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灭；但人们生活的贫富悬殊，起码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得不以一种怀疑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战前那种“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样的客观基础上大量潜滋暗长。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断绝”，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客观上，这一时期从岸信介到佐藤荣作政府，基本上都是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种种问题的逐渐暴露，使得原来关心中国的日本人，也渐渐失去了关注中国的兴趣。

当然，在这一阶段，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边倒”。在六十年代前半，即“文革”前，五十年代开始的文学上对中国的热情，尚未完全冷却；翻译者们仍在勤恳的耕作于这片田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作品，还是比较及时的就传到东邻。特别是《红岩》，日文译本销售居然超过三万部，这在中国文学的翻译作中是很少见的³⁹。直到“文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斩断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时也关闭了对外部世界包括对日本的交流之门。

前面说过，中苏论战的公开化，改变了人们过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简单认识。有的人如清水幾太郎开始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来评价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而同时，也有一些人对论战双方中中国的观点持支持态度。这主要是被称为“新左翼”的一种势力。他们对所谓“战后民主派”已经不满意，而寻求更为激进的思想武器。因此，中苏论战中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后来据此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新左翼”中颇能引起共鸣。六十年代后期以“全共斗”为中坚力量的“大学纷争”，除了校内校外、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引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有对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模仿的成分。

除此以外，在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文革”开始后，支持派和反对派之争，一时甚嚣尘上。一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人们，对文革的做法表示怀疑；同时也有人衷心拥护。这些不同的思想倾向，在他们各自的研究和学术著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前面曾介绍过的竹内好，安保运动之后，渐呈从学术界隐退的趋势。从1963年3月开始，他新组织了一个「中国の会」，并任其会刊『中国』主编，比较专

³⁸語自丸山昇「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22。

³⁹据丸山昇「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22。

致的从事介绍中国的工作。他从创刊号起到终刊号为止，一直为『中国』撰写题为「中国を知るために」的文章，这成为他六十年代的一项主要工作。以竹内好这样一位长期热情关注中国的思想家，虽然也曾说过「中国の文化大革命を文化の破壊と見る人は、見る主体の文化が、保守化し、老朽化し、形骸化し、空洞化していることを忘れていないかどうか、一考の余地がある」⁴⁰的话，但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国交未回復の現在では、『われわれは正しい判断はできない』という前提に立った方がよい。」⁴¹两国间外交关系的断绝，客观上使得文化交流无法进行。但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在很大程度上，是使一些人们不愿再开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1972年9月，中日外交关系正式得到恢复。从那以后，在关闭多年的门户得以开放的客观基础上，随着经济交流的逐步发展，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渐渐活跃起来。虽然中国要到78年以后才开始进入“拨乱反正”阶段，起码在信息、情况的流通方面，要比原来正常一些。

当然，这样说毕竟还只是比较表面的情况。四十年代岡崎俊夫曾说过的那种因日本战败而一度被冲决的对于弱小民族的“心灵的堤坝”，现在又因为两国间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而重新筑起；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失败，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而被伊藤虎丸视为“幸福的时代”，即三十年代的两国文学者之间那种深层的交流，则在外交关系恢复多年之后，也还远远未能达到。

二、郁达夫研究

虽然如上面所述，两国间的文化关系等，在这一阶段进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低谷”时期。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包括对郁达夫的研究，却并不一定与此划等号。毋宁说是恰恰相反，在这一关系史的“低谷时期”中，迎来了日本郁达夫研究的鼎盛阶段。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大概可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应当看到，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在这里有所反映。具体一点说，在中国，政治的因素，政治“气候”，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在与政治气氛相违悖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独立学术研

⁴⁰『中国』第58号、1968年9月。

⁴¹竹内好「中国の激動をどう見る」、(『朝日新聞』1967年1月15日)。

究。以郁达夫这样一位从一开始就不合大流，在思想倾向上不太革命、不太“进步”的作家，在六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前半）那样一个极“左”的时代氛围中，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因此敢于对郁进行研究的，也就越来越少。五十年代，尚且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曾、范的论文，和其他少数文章。进入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郁达夫研究，则基本处于完全停顿状态，研究成果几乎等于零。⁴²

而日本则不同了。尽管也有不合理政治，也有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浪潮，但“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和日本学者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却可以使这些因素并不对人们的个人研究产生那么直接的制约作用。人们基本上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想要从事的研究，而不受外界的压力干扰。尽管有可能不合潮流，有可能受到不同意见的批评或批判，甚至有可能因此不得不“转向”，但象中国那样由共产党的领导而渗透到每一领域的集中、强烈的政治压力，却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所以，研究、学术的发展，基本上是比较自由的。这就是这一阶段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能比中国取得很大进展的一个客观环境方面的重要因素。

其次，如前所述，前一阶段竹内好的“问题提起”，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所谓“第二代”，他们在成长期（主要是五十年代前半）所接受的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开始喷涌而出。所以虽然此时两国关系处于“低谷”，却并不妨碍热情注视中国的产品在这一阶段大量产生。

具体到郁达夫。首先他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事实，与前面说过的“悔恨的共同体”有关，成为人们重新对他和他的文学世界进行探究的原始出发点；其次，是他的由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作家的思想方法的特殊性，又和那个重视思想的时代有关，引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这里，我们不妨对日本郁达夫研究的重镇、“战后第二代”的代表伊藤虎丸的说法，做一个简单的浏览。

伊藤虎丸在八十年代，对自己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时，是这样说的：

第一に、私が郁達夫を自分の研究テーマとして取り上げようと考えた理由の少なくとも一つは、彼が日本憲兵に殺害された中国作家だったという点にあった。郁達夫を取りあげて調べてみることは、日本人の道徳的責任への反省につながる問題であるように私には思われたのである。⁴³

⁴²据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⁴³伊藤虎丸「郁達夫と大正文学」（『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5年10月20日刊、P303）

第二に、私の研究の主題は、一言で言ってしまえば、郁達夫は1927年以降なぜ革命文学の戦線から脱落して文人的世界に退く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その原因を彼における思想のあり方の問題として考えてみること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この場合、私は、「思想」というものを既成のマルクス主義への接近の早さ遅さや、教義理解の正確と不正確や、共産党との距離の遠近などとしてではなく、彼の文学の方法（それは同時に彼の社会認識の方法でもある）に端的にあらわれるものと捉えるべきだと考えた。（同上）

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所接受的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在当时重视思想、特别是重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的思想的力量的那样一种学术氛围中，特别吸引研究者，将他作为与鲁迅成为对比的存在，从理论的角度，深刻探讨作家的思想方法与文学创作以及与时代（革命）等方面的关系。

今から見ると、こうした私の最初の仕事は、竹内好の強い影響の下に、その問題提起をそのまま受けて、いわばその裏返しの作業を試みたに過ぎなかったとも言える。つまり、竹内は鲁迅を取り上げ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近代文学の主流をなして来た「マルクス主義者を含めた近代主義者」を批判したわけだが、私はその竹内によって批判された日本文学（その影響をストレートに受けたと考えられた郁達夫）を取り上げることによって、いわば、日本文学の「方法」が激動の中国革命の現実の中に持ち込まれた時に辿ら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その「運命」を見、日本近代文学においては主流となった方法が中国においてはそうなり得なかった理由を考えることを通して、私なりに、上に言ったような「日本近代への反省」を試みたのである。（同上）

紧接着上面这段话，他又道出了另一层因素：

その背景には、むしろ私なりの郁達夫への「偏愛」があった。私は当時の先進的な学生運動に共鳴しながらもそれに必ずしも積極的に参加していけなかった自分の軟弱さを、郁達夫の身の上に重ねていたのである。その意味で、私の郁達夫批判は、私の自己批判でもあった。戦後には安藤

彦太郎氏の著書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な「知識人の自己改造」学生の「プチブル意識の克服」といった言葉が私たちの心を揺さぶっていた。それが私の郁達夫研究のもう一つの隠れたモチーフだったのである。（同上）

伊藤虎丸所说的，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有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选择郁达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也就相对来说多了起来。

除了伊藤虎丸这一代，还有其他世代的一些人，也在这一时期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年长于伊藤的小田嶽夫，于七十年代初出版了他的『郁达夫传』。这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可以说是郁传记的第一部。

比伊藤虎丸年轻一些的世代，则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有一部分基本上是沿着竹内好—伊藤虎丸的路子往前走；同时，受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和“新左翼”的影响，也出乎人们意料的蹦出匹把“黑马”。就是说，日本这一阶段思想界的动摇和新的趋向，在郁达夫研究领域也有其反映。

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郁达夫研究，做一个稍微具体一些的考察。

1、伊藤虎丸等

伊藤虎丸是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一位相当活跃的研究者。他的研究经历、研究成果，能够比较典型的反映出日本学术研究的时代特点及其变化。

伊藤虎丸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于东京教育大学『漢文学会会報』第18号上的「郁達夫の処女作について」、时间是1959年6月。而真正显示了他的研究实力的，同时也可以称为他的郁达夫研究代表作的，则是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上的「『沈淪』論—日本文学との関係より見たる郁達夫の思想=方法について」（1961年4月）及下篇（1964年12月）。从那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作品不仅有个人的单篇论文，同时也有于他人合作、共同编辑的资料性著作。除了本论文第一章介绍过的『郁達夫資料』，还有七十年代末的『創造社資料』10卷及別卷『創造社研究』等。伊藤虎丸长期以来从事的研究工作，借用中国著名作家王蒙评价一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时所用的话来说，叫“两把刷子一起刷”。而他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比较能够体现日本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特长。

前面曾经讲到过，当伊藤虎丸在八十年代回顾自己研究生涯最初的起点时，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竹内好的“问题提起”的影响。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在当时，像一面迎风招展的鲜艳的学术之帜，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唤起了他们面向中国、研究中国的学术热情。伊藤虎丸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如此，他在自己的

研究过程中，却能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随大流，不人云亦云，一步一步，终于得出只属于他自己的研究精神的独自の结论。他本来是要循着竹内好以赞美中国来批判日本的思路，将郁达夫作为一个深受日本文化和文学思想（特别是当时私小说理论）的影响，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制约了自己的创作发展，而终于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的失败的典型。但在他具体的考察过程中，却没有简单的在政治上上纲划线，而是特别注意到郁达夫的思想方法及文学观、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既分析出他的思想方法形成的由来、由此产生的对他创作发展的限制，同时又对他重视文学自身规律性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应给郁达夫以文学史地位上的充分评价。他的这一结论，也许不合当时的潮流。但几十年天翻地复，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中国方面，终于能够比较公允的讨论、评价郁达夫的人生和他的文学，已经是二、三十年后的事了（1985年中国召开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大会，算是正式为其恢复名誉）。伊藤虎丸的结论，终于经受住了时间的严峻考验。所以，当他回首往事时，可以问心无愧的不悔少年之作：

それから三十年が過ぎて、今回これら私の最初の仕事を、ほとんどそのままここに収録したのは、何と言っても私の怠惰のせいであって、そのことの言い訳をしようとは思わない。ただ、敢えて三十年前の旧稿をそのまま収録するには私自身がここに書いた限りでは今も見解を修正する必要は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が最低限の条件だとは思っている。⁴⁴

当然，三十年之后，对问题的认识角度与深度都有变化。这一点，将留待以后的部分中再做论述。

伊藤虎丸的论文的具体内容，也打算放到后面的“日本郁达夫研究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的章节里，做专门论述。

除了伊藤虎丸之外，在这一时期，还有小田嶽夫、稻葉昭二和铃木正夫等，也都比较活跃。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思维与方式，将自己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同时，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又互为交错，共同构成了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繁盛时期。稍微具体一点儿说，稻葉昭二从1961年前后与伊藤虎丸共同搞出『郁达夫研究资

⁴⁴伊藤虎丸「郁達夫と大正文学」（『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5年10月20日刊、P303）

料初稿』后，基本上是对郁达夫早期留学生活进行实证性的考察与研究。特别是有些第一手资料，具有史料性价值；小田嶽夫则是日本最早的郁达夫作品的翻译者，对郁达夫生平所知甚详，战前就写过一些有关文章。在这一时期，他不仅继续写作类似文字，而且稍后几年，他将多年的成果汇集成书——『郁達夫傳』，推出了日本第一本郁达夫传记作品；铃木正夫也是比较注重史料的所谓“实证派”研究者。与稻葉昭二不同的是，他比较偏重于对郁达夫晚年生活中史实资料的搜集与调查，特别是深入实地，对郁达夫之死的事实真相的调查与结论，得到了举世公认的评价。对上述四位研究者，本文打算在下面的章节中分别进行具体论述，所以，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2、坂井東洋男

在1972年的『颯風』雜誌第2号上、有一篇題為「郁達夫『沈淪』論」的文章、作者是坂井東洋男。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其发表誌——『颯風』。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所谓“新左翼”的，或者说是具有“新左翼”倾向的一种杂志。所以，发表于这一杂志的文章，大多带有不同于他的个性鲜明的色彩。

我们先来看看坂井東洋男的这篇文章。文章在一开头引用了郁达夫作品「蕪蘿行」中的关于自己人生困境的一段话之后，就直接这样论道：

郁達夫特有の自嘲癖を考慮に含めても、それでもなお歴然として右にうかがえる、目を蔽うばかりな「責任転嫁」の論理が、誤解をおそれずに言えば、〈抒情〉を媒介としつつそのまま彼の出世作「沈淪」に機能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

断っておくまでもないが、「責任転嫁」と言うことでなにも私は、「責任」の所在の一端を「国家社会」や封建的家族倫理に求めることが根拠をもたないいわれなき主張であるなど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ただ、「国家社会」への糾弾が表現的に説得力をもち論理的に正当性をうる根拠が、いつに糾弾者の現実から負った内面の傷みの内実的な深さにかかっているものだとなれば、右に見える「現実への不適應性→汚濁した現実からの脱出願望=自殺へのいざない→自殺の断念→『国家社会』などの無責任性への呪い」と、〈糾弾〉に行き着くまでに辿る論理は、「現代社会」と、それにたいして〈不適應〉である自己の内面との乖離、あるいは〈知識人〉である自己と「無学」な妻や彼らを取巻く封建的家族倫理との関係性で裂けている断層を対自的に深化することなく、むしろ目を外への〈糾弾〉に

向けることで内面の空虚の補填をはかろ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の免責の論理にはたとえば、「生計の困難な問題」と封建的家族倫理に圧迫されて結婚生活が破局をむかえるという「蕙蘿行」と同様のモチーフを扱った魯迅の作品（「傷逝」1925）の言葉を振って言えば、汚濁した生活環境から脱出するには自己逃避としての自殺か、他者圧殺としての離婚のいずれかの途しかなくとも、そのほんとうのことを口に出してしまったあとに残る空虚、口に出さなくとも依然として妻との関係性に口をあいている空虚、そのいずれの空虚の重荷も結局だれが肩代わりできるものでもなく（「国家社会」は無論のことだ）自己が終生荷ないつづけて歩むほかなかった、と言う「個」をささえる厳然たる倫理への痛覚などとはおよそ隔った内面の風景をうかがわせる。

ひとはだれしも魯迅を指標とあおぎその沈痛な歩みを辿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どのみちを択ぶかは〈個〉の恣意性に属する問題であるが、「沈淪」の作者郁達夫が〈抒情〉の作家であったのは、そのような意味で空虚を空虚として耐えてゆく機能構造が彼の内面に欠如していたことと、わかちがたく結びついていたように思われる。

因为理解起来总有些出乎意料的感觉，所以不惜篇幅，把文章开头部分几乎全部摘录。首先，对郁达夫的出世作「沈淪」，坂井東洋男认为是一种「責任轉嫁」的理论，以“抒情”为媒介创作而出。他认为，对国家社会的谴责并无不可，问题是如果说这一谴责的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和谴责者由现实所遭受到伤害的内在深度有关的话，郁达夫所做的，不过是通过对外的谴责来填补自己内面的空虚。与鲁迅类似题材的创作相比，郁达夫作为一个抒情性的作家，对于封建家庭伦理观念造成的无法摆脱的空虚（主要是精神上的空虚），特别缺乏内在的忍耐力，这一因素和他创作「沈淪」密不可分。

接着，坂井又具体分析了郁达夫这种精神危机企图在自然中寻求化解时的状况。

「彼」は自然の「浩然の氣」に触れることで「世間のひと」と相對する自己の狭量を悟った、と語っ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が、ほんとうは器量の狭さ云々という視野拡大に「和解」が成立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彼」の眺めている自然とは〈抒情〉交感にふさわしく「田園画」に擬装された〈自然〉であり、さらにその〈自然〉にふさわしく自己を「数千年前の原始キ

リスト教徒」に擬装することでその〈自然〉との渾然たる同化を「彼」はは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ういう擬装的に仕組みあげられた〈抒情〉交感過程の中に「彼」は、異郷での（同胞をもふくめた）対人関係の軋轢から内部にうっ積されていた怨嗟・不安・絶望を至福感へと解消しているのである。「和解」は、言うならば、「彼」にとって持続するに耐ええない自己の現実する内面の空虚そのものとの〈和解〉であった、と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がその〈和解〉が「厭う」べき「人の世」と自己とのひずみを止揚する現実的な（「人の世」での）根拠をなんら見出さぬままの、自分自身との〈和解〉であるかぎり、「世事を忘れて独居」しうる〈抒情〉空間からふたたび人間関係の垣塙たる現実世界へ帰還したとき、自然との〈抒情〉交感によって感受された「解放された情趣」はもろくも崩壊をとげる。「沈淪」一篇のパターンは、対人的不安・絶望と対自然的至福感の循環であると見なせるが、それはこの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说他企图在自然中寻求“和解”，但这自然并非真实的自然，不过是与他的抒情交感相适宜的虚幻成“田园画”的自然，他并且进一步将自己虚幻成与这自然相适宜的“数千年前的基督教徒”，企图在这自然中被同化。要说“和解”，就是与对他来说无法长期忍耐的内在空虚的“和解”。整个「沈淪」的构架，看起来只是对人的不安、绝望和对自然的至福感的循环，原因就在于当他不断由“遗世独立”的抒情空间重新返回人间关系的现实世界时，他在自然中所感受到的“被解放的情趣”，立刻脆弱的崩坏了。

此外，对小说中性爱描写的部分，坂井是这样认为的：

「彼」は「異性の愛情」への渴望をその日記に書き込むが、それは自然的〈抒情〉空間ではみだされていた内面の至福感が「人の世」では打碎かれざるをえない、その穴のあいた空虚の代償を異性の「心底苦痛を慰安しうる心」でうずめようとするのにほかならない。そこにはだから、もともと異性とのぬきさしならぬ関係性など芽生えようはずはないのである。

而对于人们历来比较重视并给以较高评价的希望祖国富强的呼声，坂井别有一说：

作者郁達夫はおそらく、留学生が異性と接する関係性のうちに露わに集

約されざるをえない祖国とその国との国家的関係性をみる、といった作品の方法論には無自覚でしかなかったと思われるが、「沈淪」の内在性に即してながめたばあい、「悲憤」が導き出される直接の契機は、女子学生・妓女などとのみたされえぬ異性関係以外のところには根を据えていない。先に引いた引用文からもその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葉丁易の評言がうつろにひびくとすれば、それは「頹廢的」な異性関係と民族的社會思想意識とを「彼」の内面で分断することで後者を腑分けしようとするところみそのものにたいして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その関係性が、「異性の愛情」に渴えている「彼」が自身の主体の内部の倫理性に空洞をさらしたまま恣意的にふれあったものであるとき、「ひと目みないわけがない」原因を「支那人」である〈公〉の問題に帰結するような言いぶんは効力を失うだろう。

文章最后，作者这样归结道：

国家が「強大」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は「彼」にとって何であったか。その呼びかけは、〈個〉の問題としてなんの解決も意味しないのである。

他不同意前人的关于作品结尾的呼吁是作家的民族意识的表现的说法，包括叶丁易的结论。他认为，郁达夫的所谓“悲愤”、“屈辱”的直接诱因，不外乎异性关系的未能满足。然而，当“渴求异性爱情”的“他”自己主体内部存在着的伦理性的缺陷任其暴露着而去接触异性关系问题时，仅仅把问题归结为“支那人”这样一种“公”的因素，好象没什么说服力。对祖国强大的呼吁，这一呼吁本身就包含了抒情构造的成分。归根结底，国家的强大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呼吁对“个”的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意义。

对坂井東洋男这篇文章的理解，按照传统的思维，有一定的困难。不仅是在立论上他和以岡崎俊夫为代表的过去的说法唱了反调—岡崎俊夫一个基本的看法是认为郁达夫的弱小民族意识和对女性的思慕是互为触发的；而且，从语言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坂井東洋男有着非常鲜明的叛逆意识。什么「責任転嫁」、「国家社会」への糾弾、「数千年前の原始キリスト教徒」に擬装する、〈公〉の問題、〈個〉の問題等等。如果不是妄加猜测，这是否可以视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所谓“新左翼”倾向的一代，在郁达夫研究领域，对传统的评价、定见、结论等的一种“反拨”？这一“反拨”，当然是从观念（内核）到语言（外形）因素等全方位

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前面曾说到过的在此阶段突然奔出的一匹“黑马”。问题是，这匹“黑马”为何单单选中郁达夫作为自己奔驰的方向呢？我想，从大的方面看，日本国内安保运动的挫折，后来学生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国文革中提出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几重因素综合起来引发的人们对知识分子批判国家社会的再认识，有可能是触发坂井写作此文的基本社会背景；稍微再具体一些，郁达夫这样一个站在两国现代文化交汇点上的复杂人物，虽然曾经遭到非议，但在日本的评论家这里，从三十年代的竹内好，四、五十年代的岡崎俊夫，到六十年代开始的伊藤虎丸，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居多。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郁达夫在发出对周围环境、对国家社会的愤怒的谴责之声的同时，还有没有自身道德完善的问题值得追究呢？所以，有可能是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促使坂井写出这篇文章。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那么，我们依然只能归结为，这是那一时代的影响，在日本的郁达夫研究领域所留下的痕迹。

3. 加藤诚

七十年代初，还有一位郁达夫研究者是值得一提的。1972年8月，当时还是立命馆大学大学院院生的加藤诚，就发表了他的有关郁达夫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郁達夫の小説について」（『野草』第8号）。这篇论文的主要特点，是就革命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一点展开论述。

比如，文章一开始，加藤开门见山的说道：

一般に郁達夫（1896—1945）はロマンチストとしての評価を与えられているが、作品を検討すれば、必ずしもそうとは断定しきれぬ要素があると思われる。特に中国革命を彼がどのように受けとめて、それが作品にどのように表れているかを考える時、もう一つの悲惨な局面が顔を覗かせてくる。

接着，他援引了郁达夫自传中关于童年生活的一部分，说：

彼の革命に対する認識が形成される背景には、ほの暗い過去の世界の底から、閃光のような一条の糸を操る一つの記憶があった。県立小学校に入学してから二年目の春に起こる“皮靴事件”である。……富める者への仇敵視は貧困の屈辱に裏打ちされて、理論によるよりも単純に革命に結合しやすい。この事は間接的にせよ革命と達夫との最初の出会いであったと考

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接着、引用了郁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议论，说道：

これは革命というものが持つ一種の悲壯感への憧憬にすぎなかった。革命を論じた当時の達夫の文章は見る術もなく、自傳に於ても中国革命を論じた箇所は見えない。革命の志士であるためには、その悲壯な涙が中国革命の思想と理論に結晶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達夫はそれをせずに、文章での慷慨悲歌、想像での戦闘を愛していただけ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点にも、文学者ではあっても革命家ではあり得ない素質が覗いているようである。

关于小説「沈淪」

それは従来タブーとされていた「性」の領域に余りにも大胆なメスを入れたからであった。そのために彼は「頹廢作家」の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るが、実はその「頹廢」の中で、中国文学の新たな世界への飛翔を希求してやまなかったのである。中国社会の進路が揺々として定まらない時にあって、知識人達の間には「出口なし」の憂慮と絶望があった。達夫自身もその苦悩を分有する一人として、青年期の憂鬱を解剖し、現代人の歪曲された性欲と理性との葛藤を真向から採り上げた。自己の内面に潜む性欲を赤裸々に暴露し、異郷の地に在って、自分が軽侮される中国人留学生であることを痛烈に認識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改革の決意を抱くのではなく、負の方向に屈折した祖国愛を自分自身に叩きつけたのである。「中国よ中国！……（略）」という彼の愛国精神は、このように初期の作品に於いては絶叫・哀訴としてしか表現されていない。後の作品になると、それが革命への期待を形成するようになる。もちろん「沈淪」に於ても、彼の叫びは中国の衰微不振・政治の腐敗・軍閥の横行・民衆の困苦などに関連はあったろう。しかし、この段階で達夫自身がそれをどの程度認識していたかは疑問である。

達夫は自己の苦悶と寂寥から出発した。それらは当時の青年知識人達が共通して懐中に有していたに相違あるまい。但し、初期の達夫文学は、彼らに表皮的な面に於てのみ影響を与えるという現象を呈することもあった。

加藤一方面认为在人们所批评的“颓废”中，有着中国文学向新的世界飞翔的不停的追求；同时又说，郁达夫在中国社会前途渺茫时，和年轻知识分子共同感受到忧虑和绝望，并通过对青年忧郁症的解剖，正面提出了现代人被歪曲了的性欲与理性的冲突问题。但同时自己并没有抱定改革的决心，而是向负面屈服，不能自拔。他的所谓爱国精神，不过是初期作品中的绝叫和哀诉。「沈淪」中的呼吁之声固然与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有关，但当时郁达夫本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也还很值得怀疑。

しかし、達夫は後に、作品の内容が不道德であるといなどに拘らず、新文学はその道德と内容を改革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するに至る。ここから達夫文学に於ける「頹廢」の本領を遡及的に導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たとえば、「茫々夜」の主人公質夫が性的苦悶に煩わされていたが、ある時、洋品店で女性の使用した針とハンカチを求めて帰るが、その部分の描写は、今日でも道德上許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であるとする人もあろう。しかし、これは封建道德への反抗ではなかったか。三教九流の最も忌諱する所を大胆に暴露した逆説的な叛逆ではなかったか。この部分だけを見れば病的であることは否めないが、作品全体からすれば、質夫の懊惱がよく表現されていて、それが墮落を救っている。これら初期の作品には、確かに暗澹たる灰色のベールの背後に、叛逆の閃光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し、その意味で、当時にあっても理解しうる積極的な一面を読みとることはできる。しかし、それを直ちに彼の愛国心と帝国主義への憎悪に短絡させてしまうことには問題があろう。それは上述したように、彼の愛国心はまだ感傷的絶叫と哀訴にしか過ぎ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絶叫と哀訴は安直な愛国心にはなるが、「帝国主義への怒り」という認識には論理的に繋がらない。

「蕩蘿行」に於ても、達夫はやはり自己の苦悶と寂寥から出発している。だが、それは「沈淪」とは性質が少し異なる。「沈淪」などに於ける苦悶は自己の内部へと向かうものであり、「中国よ中国！」という叫びも自己に向けら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が、「蕩蘿行」ではその苦悶の突発口を外部へ社会へと求める模索が始められている。銭杏邨は「蕩蘿行」を経済的苦悶が性的苦悶になり代わった作品とし、社会による磨耗からくる脆弱さの裏返

しとしての反抗であると解釈する。しかし、これが反抗であるならば、その対象を「社会の構造」という漠然としたものに据えていたのであるか。主人公の「私」は、(略)社会は根本的に改革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言う結論を導くのであるが、どのようにして社会を改革するかという展望は生まれてこない。達夫の視野はここで明らかな拡がりを見せているのであるが、あくまで自己(あるいは自己を含めた家庭)と社会の関係を悩むことに留まっている。従って、反抗と言うよりもむしろ歎情に近いと考えられる。

「春風沈酔的晚上」になると、彼の視野は更にもう一步拡大される。その契機となったのが、「文学上の階級闘争」である。この文学理念に依拠して、彼は労働者階級を観察し描写した。……こうした彼女への憐憫は、「蔦蘿行」に於けると同様に、達夫自身への憐憫ではなかったか。意識的に労働者を題材に採ってはいるものの、達夫は遂にその階級の外に佇立したままであった。だが、それでこの作品の価値が下落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そのヒューマンな詩情は比類なく美しい」ものであり、「春風沈酔」というタイトルがそのまま作品を流れる文学的香気を伝えている。初期の作品に見られる頹廢と構成上の散漫さを脱却し、次第に円熟へと向かっている。その意味で「過去」は一つの絶頂点に到達した好篇と言える。

曾華鵬・范伯群は「過去」を愛情問題に於ける失望ととらえ、読者に何か貴重なものを失ったような感覚を与えているが、そのようなとらえ方よりも、この作品は達夫文学の一つの到達点であると同時に一つの清算であった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であろうか。何故ならば、「過去」を書いた達夫は再び“春風沈酔の夜”を書かないし、“沈淪”を書かない。これを転機に、達夫は中国革命に於ける自己の変革を目指すようになる。その努力の結晶が「彼女は弱い女」である。しかし、彼自身の変革は意識の域を出なかった。……また、この頃、王映霞との恋愛は、達夫にとって新たな活力となったに相違はないが、次第に雑文が増加してきたことは、雑文のスタイルが革命とどう関係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彼の創造力が文学的に容易に結実し得なくなってきたことを説明してはいまいか。したがって「遅咲きの木犀」などは、「過去」の下降線上にあるというより、遊記への逃避行の過程として位置づけたい。創造力が文学的に容易に結実

し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彼の革命理念もその辺に限界が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最後の小説「出奔」にそ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春風沈酔の夜」で萌芽した労働者階級への視点は、更に発展して階級闘争という視点の萌芽となっている。

「出奔」以後、達夫は小説を書かない。文学者としての生命は殆どここに尽きるようである。次に彼を待っていたのは流亡と失踪であった。しかし、スマトラへ渡ってからの趙廉こと郁達夫は、生活力の旺盛な男であった。中国人にとって挫折とは何か。達夫の場合、文学者としては挫折であったろう。彼は自己の苦悶をさらけ出すことから出発し、一作ごとに視野を拡大していった。また、多くの知識人と同様に革命を志向したが、参加への展望を欠き、進むべき道を革命に於いても発見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そうしてみると、達夫の小説群は挫折への道程として映じてくる。しかし、彼の作品の筆致を辿るとき、そこには真摯な文学者の摸索してやまない態度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

就这样，加藤诚在他的论文中，以对革命的认识与反映为参照系，纵向考察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发展。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加藤既指出了郁的小说创作上的独特之处，又参考大的时代背景，指出其特有的局限性。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从暴露自己的苦闷出发，创作视野逐步扩大。同时，他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向往革命，却最终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由此看来，达夫的小说反映的是饱经挫折的过程。但是，从他的作品的笔致所至，可以看出一个文学者不断探索的真挚态度。

和前面的论者比起来，加藤的文章有自己的特色。和五十年代对郁达夫做综合论述的阿部幸夫、松崎治之比，加藤特别注意了郁的文学和革命的关系这一点。除了研究者个人思维的异同因素之外，我们不能不看到那个时代，从安保运动到学生运动，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那一代青年学生研究者的影响。其中，既有对五十年代竹内好式的思维方式的继承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不同。更多的带有这一时代的色彩。和同属一个时代的、同是青年学生研究者的坂井相比，加藤在分寸的把握上还是相对比较适度，不象坂井那样走到那么极端。

但无论是加藤，还是坂井，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他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比较偏重思想的因素，或者说是通过作品所反映的作家的思想、人生态

度等因素，而对作品的文学的因素，包括作家的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因素，未能予以充分注意和论述。惟一在自己的研究中避免了这一弊端的，就是列于本时期第一的伊藤虎丸。从世代上看，伊藤虎丸要早于他们。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是大家共同的；而能不能既受影响、又从影响中走出来，拿出属于他个人所独有的东西来，就体现研究者研究实力的差异了。

加藤诚大学院的学习结束之后，仍然继续着郁达夫研究。在1976年的『野草』第18期上和此后的第20期上，先后登载了他的「郁達夫の旧詩について」的（上）和（下）。对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人们一般比较注意的是他的小说，研究他的古体诗的不是太多。五十年代有少数文章论及，后来稻葉昭二的研究，以郁达夫早期文学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他的旧体诗创作。加藤诚的这篇论文，是继稻葉之后，又一篇全面论及郁诗的文章之一。

加藤在论文的开头部分，就将郁达夫对旧诗的认识以及创作情况，与鲁迅做了一个比较，认为：

旧詩の芸術的到達点や限界をあるがままに認めても、なおかつ感覚的になじめるというのが彼の旧詩に対する態度であった。鄭子瑜の言うように、達夫の旧詩が無病の呻吟ではなく、憂鬱から解放されようとしたささやかな慰安の表現であってみれば、それらを読むことによって、小説という“表の顔”に対する“裏の顔”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魯迅は意識的に旧詩を作ったのではないと言う。「おのずとして発する魯迅の情が、旧詩のなかに語られていった」ればこそ彼の陰の世界を垣間見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達夫も己が情の赴くままそれを発露させた。魯迅と異なるのは、意識的に旧詩にかりて自らの感懐を詠じるのに、殆どあらゆる機会を利用したという点である。

所以，这篇论文就是通过郁达夫的旧诗，对他的一生做一个大致的浏览。与稻葉不同的是，稻葉偏重于早年留学日本期间的诗作，而加藤则是纵览郁达夫整个人生，并特别注重那些实际生活中存在、小说里却未及表现的部分。

比如，对他1917年的『西帰雜詩』十首中的一部分，加藤这样评道：

辛亥革命の挫折の後、革命同盟会の志士たちが次第に革命陣営から脱落していく中で、孫文は1914年7月に東京で中華革命党を結成して再起を企てた。同年東京に在って一高特設予科に入学した達夫がこれを知らな

かった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のであるが、なぜか孫文再起に言及した形跡が見られない。袁世凱が帝政を復活しようとして各界から猛烈な反対を受けた時、中華革命党も反対の狼煙を上げた。さらに張勳が1917年に再び帝政を企てた時、孫文は広州で国会を召集して広東省に軍政府を樹立することを決議し、自ら大元帥に就任した。こうして祖国が風雲急を告げる時、達夫は上海郊外で「干戈地に満ち客家に還る（中略）小車夢を揺るがして龍華を過ぐ」（『西帰雑詩 龍華を過ぎて国乱を聞く』）とさらりと詠いやって富陽へと車を駆るのであった。そこには復辟批判も広東軍政府の評価もなく、それらを単純に一括して「国乱」「干戈」としか表現できぬ認識の甘さが漂う。それは未だ迫り来ぬ内乱の不穩の中を駈け抜けて行くという一片の感傷でしかない。

从这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前一篇文章相似，加藤仍然把与革命的关系，作为他分析、评价作家作品时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论及郁1918年的几首诗时，他这样说：

達夫の“不遇”の意識はいよいよ深刻化される。（『曉発東京』）しかし、この頃から質的な変化を見せてくる。それは、「陶潜慟哭談燕俠、莊烏哀歌邀楚声」（『客舎偶成』）とか、「烽煙故国家何在」（『病後訪服部先生有贈』）にもみられるように、不遇の意識に憂国の情が結合しはじめていくことである。（中略）達夫も軍閥乱立して混迷する中国の危機を救おうとする義侠心を燃やした。しかし、彼に用意されるポストは半席すらなく、悲歌慷慨するしかないという焦燥感を詠うのみであった。

这里，与前一篇文章中讲郁达夫早期“仅仅是喜欢在文章中慷慨悲歌，在想象中战斗而已”的说法十分相似。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旧诗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加藤也有己见：

達夫のこれまでの旧詩は、彼の初期の小説創作活動の源流ではなかった。旧詩に表われなかったのは、デカダンスの要素である。大正時代の日本社会の頹廢的風潮に影響され、彼自身も多少そのような生活を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が、旧詩にはそれがあまり表われず、さらに旧詩が彼にとっては感懐を定着させる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を考えれば、小説に於けるデカダンスが、結局は彼の文学的ポーズ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理解できる。

1921年9月、帰国した達夫は、安徽省の安慶法政学校で英語の教師をするかたわら、創造社の活動準備に携るようになり、以後1927年まで殆ど旧詩をのこしていない。これはなぜか。……創造社が活動を始めから、彼が精力的に小説・散文・評論等を書いたことにその理由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沈淪』によって文壇に華々しくデビューし、天下に名が聞こえた彼には、もはや旧詩に嗟嘆を託す必要はなくなった。

この年（1935）10月に発表された小説『出奔』が失敗作であったことと、それ以後1篇の小説も書かなくなったことに注意したい。小説を書く原動力が整った虚構を築く力にあることを考えると、達夫の小説家としての創造力が限界に達していたといえる。遊記・雑文等が急速に増加し、1934-35年の2年間で60首近い旧詩を詠んだことも、このことと無関係ではあるまい。

中年に達した今、夢のように過ぎ去っていった青春時代を追想するにつけ、厄介者になり果てた自分に失望するというのがこの詩（『中年次陸竹天詩韻』）の大意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慨嘆は40歳の誕生日を迎えた時にも繰り返される。ここから沈滞と自堕落を看取するのはいささか早計であり、彼独特の文学的ポーズに乗せら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厄介者になり果てたというのはウソで、彼はすでに文名高い中国の代表的作家の1人としての地歩を確保していた。40歳は彼にとって1つの区切りである同時に新たな出発でもあった。そうしたおもはゆさが、このようなポーズとなって表れたのである。

彼は沫若に旧詩の形式で可能な限り新しい現象を表現しよう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を語った。沫若に言わせれば、それは黄遵憲の詩界革命の繰り返し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達夫がどのようにして新しい旧詩を開拓しようとしたのかは判然としない。この頃作られた旧詩にもこれといった新しさは見あたらない。

達夫がこのように主張する観点から彼自身の旧詩をみれば、過去に題材

を採って現代の中国の危機を訴えたり、自分の不遇を愁える文字にはなるほど見るべきものはある。さらに、新しい旧詩を作ろうと郭沫若に語った言葉には、『談詩』で述べられた詩観を超克しようとする気概があるように思える。しかし、渡日から帰国して以来1年有余の間、旧詩をほとんど作らなかった。のみならず文章でさえ、1937年は短い遊記を2篇書いただけである。沈黙といってもよい。新しい旧詩への志向は容易に結実しなかった。その努力の跡をうかがうこともできない。

就这样，加藤循着郁达夫的人生轨迹，逐一考察了他的旧诗创作的情况。最后，在结语中，他归结道：

郁達夫の初期の旧詩の特色は、これま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彼が自らの才能を自負することと、そのような逸材が現実の中でいかに不遇であるかを嗟嘆するところにある。ある時は悲壯感を伴った憂国の情が、ある時は零落への自嘲がそれに混淆され、自負と嗟嘆の間を繞繞と漂っていたのであった。しかし、日本に留学して修学の身であって見れば、彼が詠う零落も不遇も実体のないものである。海を隔てた中国がいかに危機に瀕すとも、彼には実際問題として自分の才能を発揮する場のないことは当然であっ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嗟嘆を繰り返すのは、傲岸の裏返しとでもいべき甘え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使命感がいたずらに昂揚したり、挫折感が先行するという情緒の振幅の激しさは、自己の才能への矜持と実体のない不遇への慨嘆が表裏一体となって彼の内面に同居していたことを物語る。

帰国してから福州へ南下するまでの達夫を一言で断ずることは極めて難しい。旺盛な小説創作活動と背中合わせに5年間の旧詩における空白があり、その後王映霞との恋愛があって、日記文学や紀行文という新しいジャンルへ踏み込んでいく中で、次第に創作上の限界に行きあたる。思想的には左傾化の要素もあったが、その方向には進展しなかった。しかし、抗日意識を徐々に明確化しつつ、時には旧詩にもそれが表現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複雑な様相を呈するこの時期の達夫の旧詩は、あえて言えば混沌の中の醸成とでも言えようか。達夫は何事に対しても自分自身の境遇に重点を置いてそれらを見つめ続けてきた。それがやがて明確な抗日意識へと醸成されるのである。

1939年から1945年の死に至るまでの時期の達夫は、福建省参議

という政治家としての活動から出発した。共産党と国民党の離合抗戦に日本帝国主義の侵略がからみ合う中で、政治に携わるようになった達夫は、抗日意識を鮮明に作品化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殊に痛烈な衝撃を受けた母や兄の死と深い寂寞に陥った王映霞との決裂を克服してからは、果敢なまでの抗日宣伝活動を展開するに至った。しかし、日本の猛烈な侵略のために生命の危険にさらされ、流亡の果てには時には虚無感すら抱くようになった。従来から振り幅の大きかった彼の内面世界は、遠い南洋の地で、日本憲兵隊の陰険な監視の中で、彼の生命でさえあった文学を放擲せ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悲痛な諦念に収束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

他把郁达夫的旧诗创作总结为三个阶段。初期的主要特点是对自己才能的自负和怀才不遇的嗟叹。有时是伴随着悲壮感的忧国之情，有时是对零落的自嘲。以他留学日本的身分来看，他所反复吟咏的零落和不遇，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海之隔的中国正面临着何等危机，作为他的实际问题，找不到发挥其才能的场所是当然的。而他只是不断重复自己的嗟叹，说明在他身上还存在着过分的天真。他一会儿使命感高扬，一会儿又被挫折感压倒，只能说明在他的内部，对自己才能的矜持和对实际上不存在的不遇的感慨已经表里互为一体了。

归国后一直到南下福州为止的达夫，很难一言以蔽之。小说创作的旺盛和与此相对的五年旧诗写作的空白。如果能对显得日趋复杂的达夫此时期旧诗说什么的话，那就是混沌中的形成。对任何事情，达夫都以自己的处境为重点加以注视。这一点终于形成他明确的抗日意识。

1936年到1945年，达夫经过种种痛苦的冲击，终于走上勇敢的抗日宣传活动之路。但在日本的残酷侵略下连生命都遭受威胁，流亡的结果常使他感到虚无。历来摇摆不定的他的内心世界，在遥远的南洋，在日本宪兵队阴险的监视中，被他视为生命的文学，也不得不以被放弃这样一种悲惨的结果而告终。

根据文章开头所说的郁达夫与鲁迅不同，是有意识地通过旧体诗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怀的观点，论者以郁的旧体诗为一个切入点，对他的人生做了较为深入的纵向剖视。在剖析过程中，论者将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历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结合，将作家的真实生活和他的艺术创作（旧诗和小说）两者结合，做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概观。特别是对作家在小说中没有表现，在旧诗里却充分暴露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得比较详尽。若说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文章对诗人复杂的精神活动的把握，有时有简单化之嫌。比如，“日本に留学して修学の身で

あつて見れば、彼が詠う零落も不遇も実体のないものである。海を隔てた中国がいかにか危機に瀕すとも、彼には実際問題として自分の才能を發揮する場のないことは当然であつ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嗟嘆を繰り返すのは、傲岸の裏返しとでもいふべき甘えがあつたからである。”的说法，就还有值得推敲之处。即使郁达夫反复吟咏的不遇实际上不存在，年轻诗人“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倾向，也是古已有之。仅以现实中存在与否作为价值标准，对诗人来说，就显得单薄了一些。

加藤的两篇论文，虽然所论内容不尽相同，但论者所持的观点，或者说由文章中所反映出的论者的思维方式，却是比较一致的。无论是论及郁达夫的小说还是旧诗，加藤都尽可能地对所论对象做全面的考察、论述和评价，既不限于单篇作品，也不停留于某一时期，而是综其一生的人生足迹与文学创作的全部，较为全面地做出自己的分析与评论；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与评论过程中，加藤始终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或者说是衡量尺度。这就是在前面曾说过的作家个人创作与时代、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容易走向偏颇。加藤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分寸掌握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在他的理论天平上，显然是时代和革命的因素更重一些，仅仅指出作家在某些方面的缺憾还不够，如果能进一步分析出造成这些缺憾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各种因素，也许更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关于这一点，最后之能归结为前面说过的时代的影响了。

4. 『共同研究 佐藤春夫と中国』

七十年代初，和光大学文学科几位中国文学专业的教员和日本文学专业的教员一起，举办了一个名为「近代日本文学にあらわれた中国像」的共同讲义，持续了五年之久。在此基础上，1974年，以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小野忍教授为中心，组织了题为「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的共同研究，并且邀请其他大学的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研究者参加。后来，得到了文部省的科学研究补助费，「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每月举行例会，搜集各种有关资料，并且以「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为题，召开专题讨论会。『共同研究 佐藤春夫と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讨论会时间为1976年12月23日。讨论会上的发言内容后来整理成文，发表于『和光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2号，出版时间是1978年3月10日。

讨论会上发言的主要有祖父江昭二、伊藤虎丸、丸山昇、佐藤保等，其中关于佐藤春夫和郁达夫的关系的部分，主要是伊藤虎丸的研究报告。这里，打算以

伊藤虎丸的报告为中心，对『共同研究 佐藤春夫と中国』的内容，做一点肤浅的认识与理解。

关于佐藤春夫和郁达夫的关系问题，在“共同研究”的这次讨论会之前，就有文章论及。河出书房新社于七十年代初期，出版了一套大型的『现代中国文学』。其中第6卷是“郁达夫·曹禺”卷。在卷末附录的短文中，有一篇题为「日中両国の文学者の『交流』—郁達夫に焦点を当てたおぼえ書き—」、作者是祖父江昭二。祖父江昭二在文章中，对以「アジアの子」引起的佐藤、郁交恶一事，以及郁达夫的批判文「日本の娼婦と文士」做了简要介绍，然后这样说：

郁達夫がこの短い文章で二度、三度にわたって指摘している事柄は、近代日本の文学者の問題性を実に鋭くついていると思わざるを得ない。

接着，他又说到，佐藤对郁达夫的批判可能有所耳闻。因为他在将「アジアの子」收进小说集『風雨』时，有意将主人公之一的郑改为郁，并且在序言中用些戏谑的语调嘲讽郁达夫的批判。

しかし郁は林房雄のような平時にも変化して予測しにくい文人はかえってわかるとして、「世の俊敏な便乗家」を問題にも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軽いのはからかわれた郁ではなく、佐藤であり、しかもその軽さは恥の上塗りて致命的な軽薄さに陥込んでおり、顔も上げられない。とは言え、それは一佐藤春夫に限られたありようではなかった。あの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者里村欣三でさえもが転向し、...

同时，在日本的文人中，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敢于公开表达对中国文学家的个人友情还是有的，比如说与佐藤同时期的谷崎润一郎。

後代に生きるぼくたちがそこにもたれかか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い。そうぼくは自覚はするが、しかしその姿勢はやはり今日のぼくたちにとって示唆的であり、文人にして国士であった佐藤春夫とよい対照をなすと思われる。むろん非政治的であれば無難なのだなぞとは決して思わぬが、やはり一言ふれ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总而言之，祖父江昭二基本上对佐藤春夫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而在伊藤虎丸那儿，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伊藤虎丸的报告，题为“佐藤春夫と郁达夫”。副标题是“「海上通信」から

「日本の娼婦と文士」へ”。在进入本论之前，伊藤虎丸先从宏观的角度，简述了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并将其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1は、日清戦争直後、梁啓超が日本に亡命して来て、政治小説の紹介をした時期。

第2は、明治30年代の半ばから40年代にかけて、魯迅などが留学して来た時期。（中略）

第3は、ここに取り上げた郁達夫や郭沫若らの「第1期創造社」の人々と大正文学との関係が考えられる。

そして、第4に、大正末というより昭和初年に、「第3期創造社」の人たちが、日本から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理論を持ち帰りまして、これが中国近代文学史に一つの大きな転換点をつくる、その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という時期があります。

接着、伊藤虎丸又借用了上原専禄的論文「知識青年の諸類型」（原文：“上原専禄先生が「知識青年の諸類型」という論文の中でご指摘になっておられる、”，但这里的“上原専禄”恐为“内田義彦”之误，高）中的説法、説：

明治期の「政治青年」から、明治末—大正期の「文学青年」へ、それからさらに大正末—昭和期の「思想青年」へという青年像の変化が、ある点では両者に共通して基本的に認められるようなところがある。同時にそういう共通性はあるが、両国文学の置かれていた状況は基本的に異な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の「青年像」にしてもまた全く異なっている面もある。そういう両面を丁寧に見ていくことよって、中国文学の研究にとっても、また日本文学の研究にとっても、色々な面で大切な問題に光を当てていく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これはこの総合研究の意味みたいなことにも関わって、考えているわけです。

在进入正论后，伊藤虎丸先将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交往分为五个阶段，简要论述了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也就是在他的早期文学创作中所受到的佐藤春夫的影响。然后，这样论说道：

そこで、郁達夫が佐藤春夫という人なりその文学なりを、どのように受け取っていたかという点にしばって申しますと、一つには、いま申し上げましたような意味で、当時の最も新しい傾向を代表する、いわばハイカラな作家と見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ろうかと思われませんが、もう一つ、そう

いう「世紀末の頹廢」なり「現代人の苦悶」なり、あるいはそれを描いた芸術家、具体的には佐藤春夫を、一種の社会的な反抗者という風に見ていた、そういう佐藤春夫理解があったように思われます。

つまり、郁達夫の場合、芸術家であることは、そのまま同時に社会的反抗者であるという意識がある。意識というより現実にそういう時代があったのだと言える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日本にも同じような時代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風俗小説論』で中村光夫氏も言っておられることで、その意味で、達夫の春夫理解も間違っているとは必ずしも言えないと思うのですが、そこで日本と中国ではやはりちがいがあったと思うのです。つまり、ここで達夫が「清潔高傲」という言葉で、世俗と対立する芸術家というイメージで春夫をとらえていることは、それなりに間違っ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けれども、それをもう一歩自分の方の意識にひきつけて、「社会的反抗者」という方向で理解していたとすれば、そこにはやはり微妙なズレというか、誤解というか、そうしたものが生じていた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んです。

この事をもう一つ別の面から言いますと、郁達夫が当時の作家の中で、なぜそんなに佐藤春夫に魅かれたか、ということを見ると、先程申しました、最も「近代的」、最もハイカラな作家という外に、もう一つ、全くの推測に近いのですが、郁は、たとえば「田園の憂鬱」に、東洋に伝統的な隠者文学のかけを見てい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んです。現に、佐藤氏はあの作品を「東洋文学の伝統的なテーマを西洋文学の手法で描いた」という風に言っておられるわけです。また郁達夫の方も、彼が隠者文学に非常な興味と共感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は周知のことですし、また先程申しました世紀末作家のデカダンというものをも、伝統的な「落第文人」の牢騷と非常に近いものとして受け取って共感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も、私の考えでは、明らかなように思われます。その意味では、彼の文学全体が、それこそ古くからある「士不遇」といった中国文学の伝統的なテーマの延長上にあるといってもよい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彼の佐藤春夫理解も、当然そういう文脈の中で考え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わけで、佐藤氏への上に見たような傾倒ぶりというものも、その秘密は案外こうしたハイカラさと古さとの融合とでもいうものを彼に見ていたというところにあるんじゃない

かと思われるわけです。ところで、この隠者文学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兼々、吉川幸次郎先生などが指摘されてきておられるように、日本と中国では理解にズレがある。中国では隠遁もまたあくまで政治的なことからであることから離れていない、と言われるわけです。達夫の春夫理解の微妙なズレというものも、こういうこと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のです。

ともあれ、こうしたズレなり誤解なりというものは、民族を異にし、社会を異にする場合、往々にありがちなことだし、それだけにまたなかなか自分では気付きにくいことだと思ふのです。そして、郁達夫の佐藤春夫理解が、こうした誤解なりズレなりを持ったものであったからこそ、後に佐藤氏の例の「アジアの子」を読んだ時、達夫は「日本の娼婦と文士」で、あんな風に、欺されていた、裏切られた、という書き方をしたのだと思ふのです。

这样，伊藤虎丸认为，实际上，在郁达夫早期对佐藤春夫的崇拜中，就存在着一种理解上的误差。即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同时也是社会的反抗者。这种理解，是对传统的隐士文学的理解的延伸；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日两方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隐士（隐士文学）说到底，和政治还是分不开的。而在日本学者看来，艺术家和社会的反抗者之间，却并非可以简单地划上等号。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两国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差异造成的。郁达夫早期的对佐藤的景仰和崇拜，与后来的愤怒的谴责，实际上同出一源。同样出于这种文学理解上的微妙的差异。

所以，伊藤虎丸在引用了郁达夫的「日本の娼婦と文士」原文中的一段话之后，又这样说道：

ここでも「文人の気節」とか「正義感」とかいう言葉を使っておりますね。郁達夫は、世紀末の頽廢は詩人についても、これと同じような言葉を使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そして、我々は彼らに「欺騙」されていた。だまされていたことを後悔する、と言っていますが、これはこの時の気持ちとして、やはりウソではないような気がするんです。郁という人は日本の文壇の事情などにはそれはもう実によく通じていた人なのですが、日本の文学者あるいは“芸術家”というのは、一般の日本人あるいは軍人などとは違うのだという信頼なり期待なりをやはり本当に持っていた。だから、戦争

が始まってみて、一挙にその本性が暴露された、我々は欺されていた、という言い方になったのだと思うのです。これは、私たち日本人としては、祖父江先生も前に書いておられるように、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とりわけ、あれほどに日本を知り、かつ日本を愛してくれた達夫にかかわることだけに、そう思います。そして、こうした郁達夫の日本の“文学者”への誤解は、あるいは、例の毛沢東の「持久戦論」の中での予測のうちで、日本人民が革命を起こすという項だけが当たらなかったという日本の“人民”への誤解と対応するものかも知れないな、などとも思うのですが、その郁達夫の「誤解」の、いわば文学上での構造は、私としては先ほどから申し上げた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のでないかと考えましたわけでは

以上、伊藤虎丸分析了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误解何以发生。接着，他又换了一个角度，分析了佐藤方面的对郁的误解。

勿論ここではもう一つ「アジアの子」のようなものを書かせた、佐藤春夫の側での郁達夫あるいは中国人への「誤解」という側面から見る視点が必要なわけです。それは日文の担当だと逃げたのですが、お話ししましたこととの関連で思いつきを一つだけいえば、平野謙氏の『昭和文学の可能性』をみていたら、佐藤春夫とも関連して、日本では「人生派」に対置されるものとして意識されるのは「芸術派」であるよりむしろ「社会派」であったといったことが書いてありました。中国の場合、「人生派」の文学研究会と「芸術派」の創造社の対立ということは言われるが、それが「社会派」と対置されることはどうもない。どちらの場合もいわば「社会派」であることは前提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なところがある。

逆にいえば「沈淪」のような小説を日本文学に持ち込んだとしたら「社会派」といわれる可能性はあったとしても「芸術派」とされることはまず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それが中国では芸術派とされる。この辺の所からくるズレや誤解が、佐藤、というより一般に日本人が中国の作家を見る時にありがちな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

紧接着，他举了另一个日本人古谷纲武的回忆文章为例，来说明日本人关于“艺术家”的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古谷纲武认为郁达夫「艺术家という印象が

らは、どうしても遠いものであった。」伊藤虎丸接着説：

「芸術家という印象からは遠い」というのは正直な印象だと思うんです。そして、こういう印象は、「芸術家」としての中国作家への一種の不信感にも転化し得るものじゃないか。……そういうものが、日中開戦と同時に、郁達夫の側からだけでなく、日本人の側からも一挙に出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ここから言える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か。そして、佐藤春夫に「アジアの子」で郁や郭をあんな風に書かせた動機の中には、この古谷氏の場合と似たもの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そしてそれも今日まで残されている問題の一つであるようにも思えるんです。

也就是说，传统的对于艺术家的概念的理解上的差异，加上两国之间战争开始后的一种情绪上的不信任感，是导致佐藤春夫在小说中那样描写郁的动机之一。最后，伊藤虎丸又回到两国关系的话题。

最初に、日中両国の近代文学の交渉史を4期に分けましたが、そのあと、もうこうした交流・対話は断絶してしまう。その断絶をいわば象徴的に語っているのが、この郁達夫と佐藤春夫の場合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その後両国の当代文学は、お互いに知らない所で、いわば全く正反対の方向へ歩む。そして戦後少し対話の回復の可能性が見えたかに思われる時期もありますが、今日ほど両者の距離が遠くなっている時代というのは、2000年の日中交流史の中でもはじめてなくらいじゃないか。それをこれから回復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たら、断絶はいったいどこから始まっていたかを考えてみなくちゃならない。

その点で、日中両国の近代文学は、それぞれの出発の当初から根本的に質なり課題なりを異にしている、本質的な意味での対話なり影響関係なりというものは全く成り立たなかったのだ、という見方もあるようですが、やはりそう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と思うんです。魯迅の場合にせよ、郁達夫の場合にせよ、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にせよ、それぞれの時期ごとに、文学あるいは文学者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かなり共通の理解なりイメージなりがあった。ある意味では、「同時代の作家」というところで括れるような、非常に近い、親しい関係があり、対話も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一面では言えるかと思います。同時に、そういう“近さ”の中にも、すでに断絶というか、誤解やズレがいわば構造的にひそんでいて、それがあの戦争のところ

で一挙にはっきり出て来て、そういうもう一つの面があった。

以上，就是伊藤虎丸所谈的主要内容。就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二人的交往事实和过程，伊藤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不仅仅是两人关系，而且以两人关系为代表的两国文学交流上，在每一不同时期，既有着「同時代の作家」的相近相通之处，同时也潜藏着一些误解和差异。具体地说，这里主要是指对于“艺术家”的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郁达夫这一面，既存在于他早期对佐藤春夫的敬仰和推崇中，也同样存在于他后来对佐藤的愤怒的谴责里；在佐藤春夫那一面，则表现为他在小说中对郁和郭的描写。这种平时潜在的差异，到了战争时期，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伊藤虎丸的分析，从个人交往到文学理解，从文学观到民族、社会的心理差异，一步步深入，逐步分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有比较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在伊藤虎丸这里，尽可能的避免了一种对道义上是非曲直做简单化评价的倾向，而是紧紧扣住文学、文学理解、文化传统的因素进行论证。这一点，是贯穿于伊藤虎丸全部郁达夫研究中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他长于其他研究者的一个根本之所在。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文章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比如今西健夫的「南洋に消えた郁達夫」（星加坡日本人会刊『南十字星』1971年11、12月号等）、「郁達夫終焉の地探訪記—シンガポール通信（その3）」（『野草』第8号）等、以及小田嶽夫的『郁達夫伝』出版后、一些评论文章等等。限于论文的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及，或者将有的留待后论。

三、小结

这里，在对整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郁达夫研究做一回首时，有哪些共同的东西存在，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呢？

1、时代变化的影响

正如前面的每一个时代，都在那个时代的郁达夫研究中留下了其影响的痕迹一样，这一阶段亦不例外。而且由于这一阶段客观情势变化的激烈，其影响也就特别明显。

首先，两国政治、经济的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的发展。日本完成了经济

的高度成长，跻身于世界先进国行列。同时也经历了安保运动、学生运动等政治上的大动荡；中国则沿着五十年代后期的路线（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方针等）继续向前，直至走进“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接近崩溃边缘。五十年代两国间、特别是知识分子间曾经有过的一点“共感”，几乎烟飞灰灭。

所以，在这一时期，象五十年代的竹内好那样热情注视中国的客观基础，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看中国的眼光，也跟以前大不相同。曾经是日本政治革新势力、战后民主主义派的重要精神支柱的“中国像”，好象在刹那间轰然坍塌。原来比较单纯的正面价值取向，不用说变得复杂化了。多方位多角度的包括批判性的认识渐渐抬头。前面说过的清水幾太郎的转变，就是一种典型。在这种单向化认识朝着多向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的问题，自然也在人们重新思考的范围。真正的现代化，固然有竹内好所指摘的那样，不能简单根据一个国家“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加以衡量的因素，但无论如何，经济上的“一穷二白”，是和现代化无法挂钩的。对中国认识的多样化，固然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同时这种变化趋势，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复杂因素。

另外，原来两国间的文学、文学研究的交流，在这一阶段，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中国方面的停滞或者说是中断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而变得完全不可能了。这就促使日本的研究者的研究独立性不得不大大增强。这种不以中国官方的说法为依据，完全立足于自己的研究个性的研究成果，才真正体现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水准。换句话说，研究独立性和个性的增强，标志着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水平的大大提高。

2. 研究者世代的变化

与前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是以竹内好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中坚不同，这一阶段，不仅以丸山昇为代表的“战后派”已日趋成熟，影响日渐增大；伊藤虎丸为代表的“战后第二代”也脱颖而出，并显示了自己雄厚的研究实力。此外，还有铃木正夫、及至坂井东洋男、加藤诚那样各自带着自己所属世代痕迹的青年学生研究者的先后登场。

研究者世代的丰富，当然有助于改变以前的单一所造成的视野上的局限性。取原来“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同时代的共感”而代之的，是理论上的深刻化、认识态度上的理智化，和理解角度的多元化。

所以，和中国的“冰河期”成为鲜明对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最为成熟的鼎盛时期。这不仅表现为此时研究成果数量的丰富，研究

范围的广泛，更在于其中一些研究的理论追求的深刻性。当然，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号。数量的丰富，往往会带来质量上的参差不齐。严格的说，始终在自己的研究中保持了质量水准的，只是伊藤虎丸那样的少数人。

3. 资料性工作和集体合作的倾向

其实，早在此之前，人们就在各自的研究过程中感觉到资料的重要性。而真正开始着手并实际完成的，主要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本论文第二章介绍过的『郁達夫資料』，另外还有与郁达夫有关的七十年代末由伊藤虎丸主编的『創造社資料』10卷及別卷『創造社研究』等。这些资料，不仅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将许多零星分散、湮没在图书馆、故纸堆中的东西，挖掘、整理、集中成书，具有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因为资料搜集工作的作业量很大，费时费劲，仅靠个人的力量非常困难。因此在最初的阶段，就产生了几人合作的趋向。后来，这种集体合作的倾向，又进一步发展到课题研究的范围。比如上面讲到的“共同研究”，就包括了现代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等几个方面的专家，大家共同就一个重大课题进行集体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⁴⁵。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集中优势兵力”攻克重大课题，这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个成功的经验。

⁴⁵後来的『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一書（汲古書院1986年10月）、就是在此研究基礎上綜合而成的。

第四节 近期—八、九十年代

前面一个阶段，主要是指六十年代，同时也包括七十年代。除了因为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各自发展变化，在这两个十年中有其一贯性以外；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体到本文所论的郁达夫研究，也呈现一些共通特点。一个大的基本特征，是在两国文化交流基本“断绝”的前提下，日本方面的研究独立性增强，达到了整个几十年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把剩下的近乎两个十年，合二为一来论述，有什么根据吗？让我们还是由大到小，由笼统到具体，一步步来看一看吧。

一、两国文化及文学关系④

首先，先看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上是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而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则是以1978年邓小平复出，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为标记而开始的。从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虽然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杰出的领导人”的邓小平于1997年初逝去，但由于他生前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符合了中国这一时期的国情民心的，因此，即使在他死后，基本的方向也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建设的急速发展，为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接近、交流，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

日本方面，经济的高度成长完成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前半。俨然一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六十年代初席卷全国的安保运动的政治斗争大波澜已风云不再，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固有危机、社会矛盾，却此起彼伏，从七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总而言之，日本在经济建设完成了其“现代化”的过程的同时，也面临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现代化”发展途径的问题，屡屡被人们重新“想起”。特别是当国内经济不景气、需要对外寻找发展方向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这是两国关系在这一阶段迅速接近的一个重要客观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八十一九十年代也是比较连贯的。

在这种客观基础上，文化及文学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1. 门户开放和信息量的丰富

首先，在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在两国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1978年8月），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两国间曾一度关闭的交流之门，又重新打开。对日本来说，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许多不被了解的事实真相逐步明了化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其实，中国国内的学术界，对本国几十年历史的认识与反思，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严家其的《文革十年》，苏晓康的《乌托邦祭》，以及其他一些作品，分别代表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十七年”、甚至包括对早于建国前的“延安整风运动”等各个不同时期的再认识，或者说是一种批判。这些比较重要的文章、书籍，再加上当时不断出现的有关各种历史冤案平反昭雪的新闻报道，在此阶段，能够比较及时的就翻译、介绍到日本。当大量的数字统计、事实、观点等，不断的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震惊、愤慨和痛定思痛之时，关心中国的日本人，也一遍又一遍的纠正着自己过去的种种看法。

除了书面文字资料的交流以外，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留学生也开始大量来到日本。虽然这时的留学生，和鲁迅、郁达夫时代的留学生们相比，在文化背景、留学目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起码他们带来了活生生的中国“模型”。当留学生们用自己的眼光、经验等重新审视日本，张开了国人认识日本的“第三只眼”的同时，日本人也通过留学生，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2. “中国像の再構築”

在前一时期，竹内好曾经因为信息、资料的不充分，而表现出不愿对中国的事情轻易做出结论（见前节）。现在，信息资料是比以前丰富多了，可问题是否就随之解决了呢？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经过五十年代那样一种一时的热情，又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断绝”和疏远，时至八、九十年代，当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比较清楚的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对其应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是摆在日本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前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像の再構築”这句话，出自伊藤虎丸。伊藤虎丸在前面提到过的『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一书的前言中，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归结。这里，我想通过对伊藤虎丸的主要观点的扼要介绍，来对这个问题做个收缩性的说明。

伊藤虎丸是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点上，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当

时，“少なくともかなりの人々には、中国＝社会主義の失敗、日本＝資本主義の成功という構図として受け取られ”、而他认为“中国像の再構築”，事实上和对“日本像”的再检讨，是分不开的。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十年代（以“中国文学研究会”代表的“同时代的文学”的观点）；战后（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共感”、憧憬和敬意）；六、七十年代（以“革命”、“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理解）。时至八十年代，以竹内好、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战后民主主义的中国像”（前文曾引用过），显然不太适宜了。

そこで言われはじめた「中国像の再構築」が、実は単に“近代化の後れた国”という戦前のそれへの逆行（その“繰返し”）にすぎず、それにさらに（あるいはたまたま）社会主義の失敗、資本主義の優位という、戦後とは逆方向のしかしやはり一種の事大主義的な認識が重なったにすぎないものであるとしたら、それはまさしく、戦後に、侵略戦争とその敗北に帰結した明治以来の日本近代への反省として、竹内好が鋭く指摘したところの、前近代的な身分制意識を残存させたままの（西欧近代を、権威として、いち早く受け入れ得たのもそのためである）擬似近代という日本近代の体質は、今も少しも変わってはいなかった、という証拠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日本の社会の矛盾がいつも外へふくれることで擬似的に解決されてきたように、日本文学は、自分の貧しさを、いつも外へ新しいものを求めることによってまきらしてきた。自分が壁にぶつからないのを、自分の進歩のせいだと思っている。そして相手が壁にぶつかったのをみると、そこに自分の後進性を移入して、相手に後進性を認める。」（「魯迅と日本文学」一九四八）という指摘は、そのまま今日の“新しい（？）中国像”にも当てはまらないだろうか。—もし、こうした疑念がなにがしか当っており、日本人の中国像（それは経済繁栄の上ののって思い上った日本人の日本像と表裏一体のものだ）が戦前に逆もどりしてしまおうとしているとしたら、それは過去の歴史に照らして、日本自身の運命にとって、不吉な予兆をはらむものだろう。

就是说，伊藤虎丸不同意从表面的先进与落后的角度，对过去的（以竹内好为代表）反省和批判做全面否定。因为原来被批判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丝毫未得改善。那么，对竹内好当初的“问题提起”，现在应该如何认识？

首先，应该看到，认为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原文“真の近代”）的观点，是作为日本战后现代批判的“批评装置”，是“方法として”的中国像；

其次，长期以来对竹内好的学说存在着误解。竹内好并不是单纯的认为中国是“思想上的先进国”，而是认为以“先进国—后进国”这种模式来看待日本、中国的关系的思维方式本身，反映了日本现代的一种“身分制的”、“奴隶式的”意识构造，并对这种意识构造进行了批判。所以说竹内好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反现代”思想的见解，只是一种表面的理解。应当说他代表的是“真の近代”对“伪现代”的批判；

第三，与竹内好相反，认为日本正是因其“进步性”而导致了今日的繁荣，日本人应该为此而自豪的看法，固然迎合了大多数人的民族感情。但这种“自豪感”和竹内好主张的“民族的自立”，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竹内好的“问题提起”，是作为“战后反省”的一环，与“战争责任论”，包括日本人“伦理性”回复的主题密不可分的。竹内好赞成“战争责任论”中有四个层次罪责之区分的说法。他对日本人的“进步性”中存在着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共通的“奴隶性”的指责，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的罪责”反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被后来“高度成长”的潮水所吞没，半途而废了。但直到现在，作为“问题提起”的意义也还未失去。

第四，通过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罪责”的反省，竹内好提出的是“文化”的问题。否定竹内好的“虚像”的“实像”，就是说仅仅将“落后的、现代之前的中国”，来当做超越了竹内好的“新的”中国像，好象令人难以信服。换句话说，竹内好所质疑的“近代”，是“文化”即“精神”问题，而不是由此产生的“物质”（包括思想）的问题。他从这个角度出发，甚至断言日本现代“无文化”。日本的变化之快（进步性）中有着“精神”上的欠缺，而中国的“不变”（保守性）中有着“文化”上的“抵抗”（坚持自我）。在中国和欧洲的文化的“对决”中，能看到一种“真的现代化”。并且用“奴隶在意识不到自己是奴隶时是奴性最足的”的话来批判日本人对这一点的无法认知。战后进步思想中对伊藤那一代冲击性最强的，就是被称为“竹内好的问题提起”的这一点，即中国的“落后”中有“真的现代”的说法。

那么，当现在面临重建“战后民主主义的中国像”的问题时，从竹内好那儿，有什么遗产是必须继承的？

1），在我们说中国“落后”的同时，不要忘记反问，日本有没有真的“现代”。当整个亚洲共同在欧洲的冲击下，被迫面临“文化=样式”的全面转换，陷于想要诞生新的文化而未能产生的苦恼和混乱时，竹内好的“文化”反省的立场，不是给了我们认识日、中现代化问题的一种视点吗？所以，“中国像の再構築”的问题，

同时也是“日本像の再構築”的问题。

2), 应该找出将封建与现代, 即历史的普遍性的视点, 和欧洲-中国-日本这种文化的个别的特殊的视点相结合的方法。竹内所说的对固有文化的“自我坚持”的结果, 和“封建残余”有什么不同, 又有什么联系? 竹内的遗产中, 最重要的首先是指出了日本现代的精神贫困和对此缺乏充分的反省。只要与此互为表里的浅薄的先进国意识, 和认为自己甚至已经超越了西欧的现代化的错觉尚未克服, 和亚洲各国人民真正的友好和理解之路, 从方法上就被关闭了。所以, 对今日的日、中相互理解的基轴应该由何处追求的问题苦思冥想的结果, 我(伊藤)和多数人相反, 认为除了竹内好的视点之外, 找不到别的线索。

这十来年, 我们一边冷静的注视日益明了的现实, 一边坦率承认, 对中国像的重新认识已经迫在眉睫。无论如何, 重建的中国像不应该是倒退到战前的东西。所以, 只有在坚持“战后的反省”的同时, 通过对实证研究的积累, 对两国“现代”的比较研究, 向“文化”即“人”的方向做深入的发展。

以上就是伊藤虎丸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所以说, 在以伊藤虎丸为代表的这些中国文学研究者这里, “中国像の再構築”, 绝不是对竹内好简单的加以否定就行了, 而必须从“文化”的角度, 和对日本文化的反省结合起来, 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伊藤虎丸上述这番话, 说于八十年代中期。即使在那之后经历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对日本的冲击相当大, 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 恐怕作为方法论的认识, 不会有太大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 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等, 首次呈现出被从政治战车下解放出来的“松绑感”, 对过去的批判性认识占多数, 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还有欠深入细致。这一点, 当然也直接影响了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的认识。

关于这一点, 丸山昇是这样说的:

文革後、特に中国では反動として、あまりにも非政治、反政治の傾向がありますが、むしろ、そこに問題が生じてき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のです。党・政府の方の政策が、過去のきちんとした批判をすることを禁じているから、逆に過去に対する反発が全部そちらの方に行く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のだと思いますが、とにかく、今まで辿ってきた歴史のどこがどういう風に間違っていたのかという否定面をきちんと振り返り総括し、その中

から何かを汲み出すという仕事が、中国では残念ながらやられていない。そして、日本の研究の中にも同様の問題があるのではなかろ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す。（丸山昇、「戦後50年—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を振り返る」、『野草』第57号、P26）

3. “基盤沉下”

说这话的是丸山昇。他是在八十年代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体情况做概括时说的⁴⁶。原话是这样说的：

まず、現代中国文学研究は最近どうも地盤沈下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

丸山昇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是由中国语教师的多样化造成的。以前的中国语教师来源主要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并且一大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两国间交流重新开始后，对中国语教师的需求一下增加。原来非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的人，半途改行搞中国语。从总体上看中国语教师的数量是增加了，但专业研究水平却下降了。而且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整个中国文学的全体，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

从现象上看，可能确实如丸山昇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下降，与研究者队伍的杂多、水平参差不齐有关。而实际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上述第2点中伊藤虎丸所说的“中国像の再構築”问题，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出明确答案的前提下，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研究，恐怕难以出现大的突破和进展。

二、郁达夫研究

在前面说过的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背景下，郁达夫研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总的来说，虽然这一时期仍处于前一“鼎盛期”的延长线上，但象前一阶段那样大量、重要的突破却不是那么多了。就是说，也呈一种下降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当然有主观、客观等多方面的因素。

⁴⁶丸山昇：「中国現代文学研究の視角・枠組みを考える」、『野草』第39号、1987年。

首先，到了这一阶段，郁达夫距现在的人们，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之遥（郁生于1896年，1996年为其百年诞辰）。除了他的“同时代人”基本上均已作古，曾经有过的“同时代的共感”不知何处可寻的因素之外，时代的发展变化也相当之快。郁达夫留学时是日本的“大正”时代。现在经过一个长长的“昭和”，早已经进入“平成”。如果说在战后，由对中国的“反省”意识而引发的一时的“中国文学热”中，郁达夫曾是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中国作家的话，那么现在，随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被疏远、被冷却，日本人不知郁达夫为何人的事，已经毫不足怪了。更何况在中国本土，也曾有过一段文化的“断层”呢。

所以，从整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来看，郁达夫已经不再是人们重视的目标之一。曾经在前一时期相当活跃的几位研究者，除了小田嶽夫已去世，稻葉昭二八十年代还继续着他的资料考证工作；伊藤虎丸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更致力于宏观的研究；惟一到九十年代还在孜孜不倦于郁达夫的，就是铃木正夫了。年轻一代研究者，则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喜好，将眼光投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根据一些中国文学研究的有关资料目录来看，现在的研究论文中，除了中国语方面的，除了古典文学方面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相对的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中（这里姑且沿用中国的说法，将五四至建国称为“现代”，将建国后称为“当代”）过去不被重视或者存在冤案的，如国民党统治区文学，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另一是当代文学中“后新时期”部分。对前者，澄清历史事实、重新评价与认识的成分居多；对后者，则与了解中国发展的最新趋向不无关联。当然人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只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在这两个方向中，显然都不包含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的元老作家之一，日本的研究者，应该说已经对他给予了比较充分的注意。同时，从他身上，当然也无从找到代表新时代的发展因素。所以，在这一时期，选择郁达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已经大大减少。

除了时代的隔离，人们研究兴趣的转移等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前面曾经说过，伊藤虎丸在他那个时代，在竹内好的“问题提起”的影响下，拿出了自己的郁达夫研究的杰作。客观上，在日本郁达夫研究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当后来的研究者，对自己的实力不具备充分的自信，不敢轻易的向伊藤虎丸挑战时，就轻轻绕开郁达夫，恐怕也是情理之中。

上述这些，是解释这一时期郁达夫研究未能如前一时期那样，继续深入发展并取得重要突破时，不得不注意的一些客观因素。但另一方面，有利因素也还是

存在的。在本论文的开头部分，曾经引用过中国研究者的说法，说中国的郁达夫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见第一章“一”）。那么现在，正是中国的郁达夫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发展最快的阶段。和三十年代的参考对象只有钱杏邨、周作人等；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后半，只有丁易、曾华鹏范伯群等不一样，八十年代初前后开始活跃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郁达夫研究方面的，非常迅速的就进入了日本同行们的眼界。比方说董易、赵园、温儒敏、许子东、张恩和等一大批研究者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日本研究者的文章中，成为他们的参考。就是说，中国郁达夫研究的新发展，对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所以，从总体看起来，这一时期的郁达夫研究，由于时代的隔阂等因素，已经失去了前一时期那样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同时，也有少数后起之秀，以自己的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向郁达夫研究领域中尚未被耕耘的土地，发起了勇敢的进攻。所以，收获也是有的。

在此时期，还有少数中国留学生的郁达夫研究论文，也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杂志上。虽然是用日文所写，但思维基本上还是中国人的。所以，这里暂不列入本文的研讨范围。

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稍微具体一些的“检讨”。

1. 平井博

1983年1月，在名为『無名』的杂志的第3期上，有一篇论及郁达夫的长篇论文，作者是平井博（论文分两次刊登，下部分登载于1985年的第5期）。平井博的论文题为「郁達夫—その文学的模索」。

平井博的论文写于八十年代初，他首先注意到：

最近、中国において、…単に“ロマン主義的”と切って捨てるのではなく、また後期の彼の行動をもとに“愛国作家”としてもちあげるのでもなく、その作品について内在的に彼の文学観と作家的個性を探ろうとする志向が現れつつあることは喜ばしい。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一点。即平井认为对由郁达夫作品反映的作家文学观和文学个性的深入探索，比仅仅根据他的后期行动来宣布他是一位“爱国作家”更为重要。这同时也透露出他自己就是在二者之中更偏重前者的。

とりあえず筆者の関心を述べるとすれば、かなり以前にはじめて「春風

沈酔の夜」「過去」をよんで以来ひきつけられてきた、郁達夫の作品のもつ、奇妙なある種の悲哀を伴った潔癖さがその根底にある。潔癖さとは、この場合、作中人物に配された自尊心だと言い換えてもよい。

処女作品集「沈淪」所収の三篇、(中略)さらには、安慶時代の二部作「茫茫夜」、「秋柳」に著しいように、過剰なまでの自我意識を負わされた主人公がどれほどデカダンスと頹廢に満ちて行動し思考しようとも、そこには決して猥雑さはみられない(むしろ猥雑さを獲得できなかったというべきであろう)し、自尊心という枷が主人公の知識人たちに働いているのは否定できない側面であると思える。

郁達夫の文学が、こうしたインテリの自我意識の空転を描かざるを得ないところから出発したことはかなり象徴的であるし、後にみるように、彼じしんの作家の軌跡にとっても大きな問題と意味をもっている

他认为郁的文学，不得不由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流于形式的描写出发，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同时对研究郁作为一个作家的发展轨迹也很有意义。接着，平井博接着时间的顺序，考察了郁达夫的创作轨迹。

“一、「沈淪」から「春風沈酔的晚上」へ 自我と国家意識”

通常、「沈淪」の性的苦悶の描写は、その自己暴露の大胆さゆえをもって中国二千年来の礼教の批判となったとする見方が中国では定着しているが、伊藤虎丸氏が正確にも指摘するごとく、郁達夫がそのような機能に執着していたかどうかは甚だ疑わしい。

では、一人の青年の告白＝自己暴露という形式を装ったこの小説が、作家郁達夫の出発を告げるものとして、また中国の近代文学の初期の一篇としてどれだけの質を内包していたのだろうか。

接着，论者援引了竹内好的看法，认为郁达夫的「沈淪」和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蒲団」，在小说内容、社会反响以及在各自国家近代文学史上所占地位几个方面，都非常相似。

私には「沈淪」にみられる私小説性、告白的表現と性的苦悶は、佐藤春

夫の「田園の憂鬱」よりもむしろ「蒲団」との関係（影響ではない）を考えさせずにはおかないのだが、それはつまり、郁達夫が明らかに「田園の憂鬱」から示唆を受けて、ヒポコンデリアの青年の自然指向とその心理描写に意を用いながら、結果として、我が国における「蒲団」と同じような様相をもった小説を生みだ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こそが興味深いのである。

しかし、「沈淪」は当時の中国の青年に大反響を巻き起こした。

ちょうど「蒲団」が、自己の隠しておきたいものを告白したように見え、一人の女性の師であると同時に、彼女の恋人として立ち現れる自己の性に悩んだように、「沈淪」の主人公もまた、自己の欲望のはてしない淵で苦しんでいる。その性の苦悶を郁達夫は〈霊肉の衝突〉という言葉で説明しているが、この性の抑圧のありさまは、「蒲団」の竹内時雄のそれとほとんど紙一重である。

どれほどいじらしく小心翼翼であろうと、本人にとってきわめて切実な問題を告白という形式をとって表現すること、郁達夫もまた、花袋と同じように、抑圧された性の表現を自国の文学にはじめて成立させえたのであり、その反響はおそらく彼らじしんも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ものだった。

魯迅の「狂人日記」が突きつけた問いは、封建的礼教が支配する中国で、その礼教制度のまっただなかからそれを食いやぶる存在として覚醒した人間は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

「沈淪」の主人公などはその点でいえば、はしかのような性的苦悶に鬱々としているみじめな存在でしかなかった。

中国近代が生んだこの二つの小説の違いはあまりに大きいが、しかし、それはともに文学の中に現実の自己と通底するもの、あるいは自己へ欲望・心理の分身とも呼べるものを見出してそれに反応しうる文学の登場なのであり、であるからこそ近代文学と呼びうるものなのである。

『沈淪』刊行当初のインパクトはその後の時間とともに薄れていったにせよ、いずれは誰かによって描かれ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モチーフ—自我と性の葛藤—はこの書によってセンセーショナルな表現としてはたされたのであった。

这里，平井博就“性的苦闷”的表现的问题，一方面从其反映问题的代表性及社会影响的广泛性的角度，认为郁达夫的「沈淪」和田山花袋的「蒲団」非常相似；另一方面从文学真实地表现自己的人生（包括个人欲望、心理），从而建立现代文学的角度，认为「沈淪」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应。

接着，他又从「南迁」中带有基督教说教色彩的部分，进一步分析郁达夫的精神构造上的特点。

私は、いわゆるキリスト教の影響云々ということで郁達夫の文学を解こうとするのではない。ただ、いわゆる西欧近代文学の衝撃を存分に浴びた郁達夫が、自ら創作に向かった時、彼じしん考えてもみなかつたであろう事態、抑圧された性のありさまが文学にせりだしてくるという事態が、どのようにして可能になったのかを見究めたいだけである。

郁达夫在「沈淪」的自序中，用了“灵与肉的冲突”一句话来概括。周作人在为「沈淪」辩护时，说它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而平井博则认为，创造社同人成仿吾在「『沈淪』的评论」中，认为其并非表现“灵与肉的冲突”，而是对想要得到却无法得到的爱情的空虚的追求这一说法，比周作人之说更正确一些。

〈靈肉の衝突〉といい〈性の追求〉という言葉の問題は別にして、「沈淪」一書に表れた抑圧された性の苦悶の表現は、芸術的な昇華などとは無縁のところから成立したがゆえに、その赤裸な告白体の形式とあいまって、あれほどの反響をもちえたのである。

いわば「沈淪」にある“目覚めさせられた性”は、皮肉なことに、封建文物への勇ましい対決という形ではなく、自己の心をもてあます一人の青年の心理描写ないしは告白という形によってはじめて見出されるほかなかったのであり、そこに近代文学なるものを含めた西洋的な精神構造の陰が色濃くにじんでき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不管用什么话来概括，「沈淪」是通过对被压抑的性的苦闷的表现，与赤裸的告白体的形式相结合，才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或者说「沈淪」所表现的性的觉醒，并非是对封建文化的勇敢的挑战，而是首次表现了一个无法对付自己心里矛盾的青年的心理描写或告白，正是在这里，包括了现代文学新因素的西洋精神构造的深刻影响清晰可见。

那么，西洋精神的影响究竟起于何时？平井博根据郁达夫自传和自述诗，回溯到他的中学（教会学校）时期。

むしろ信仰よりは外国語（英語）をもとめて入学した郁達夫にとって、このような回想は当然と受け取れるが、青年時代の一時期にこのような形でキリスト教に触れたという経験は決して見逃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郁達夫の場合も、動機じたいからして宗教や信仰といったものは問題にもならなかったことだろうが、彼が西洋近代文学を本格的に読みはじめる頃（1914年）に先立つ胚胎期という意味で見れば、この短いミッション・スクール在学の経験は思いのほか深い刻印を彼の精神形成に残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沈淪」にきわめて端的に表れた性的抑圧とその倒錯的心理の表現は、こうした彼のキリスト教＝西欧との接触を根において理解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

以上、平井博分析了郁达夫的自我表现。归根结底，对于自我的性压抑的赤裸裸的表现与告白，是「沈淪」的主要内涵。而这一点，又源于西洋文化的影响。接着，平井又分析了郁的国家意识。

従来、このことは郁達夫の“愛国性”“民族愛”とされ、またそのことは、彼の文学を日本の近代文学者との対比において語る際に留意すべきこととされてきたわけだが、なるほど、「沈淪」についてその関係を云云される「田園の憂鬱」や「蒲団」のような、近代国家の整備と対抗的に発展してきた日本近代文学がしだいに自己の欲望につき内面を見つめかえずといった反功利主義の姿勢をあらわに見せはじめた時期のこれらの小説とは、基本的に異質な契機が「沈淪」にはある。

しかし、この国家ないし祖国に対する複雑な感情の由来を“愛国心”として単純に概括す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他认为，不能将郁达夫对国家或祖国的复杂感情，简单的用“爱国心”来概括就了事。

从郁达夫归国后的一系列文章及创作中，平井找出了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变化轨迹。

他先列举了郁1923年6月写的「艺术与国家」一文，说

きわめて激しい文脈ながら、現存の国家を否定すると同時に、国家—芸術のハイマートを、今日ふうにいえば人間の自己解放の実現にもとめている幻想的エッセイなのだが、ここで言われている芸術の理想と現にある国家への指弾は、時空的にいうなら、中国へ帰国後の郁達夫を襲った、半植民地中国の現状に対する絶望とも怒りともつかぬ苦悩であろう。それはたしかに、日本近代とは似ても似つかぬ状況であった。

帰国してまもなくの1922年8月に書かれた「血涙」やこの「芸術と国家」の直後に書かれた彼の代表作の一つ「春風沈酔の夜」（1923年7月）は、郁達夫のこうした苦悩をよく表す作品である。

ただ、私が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のは、こうした郁達夫が“国家”（ないしは現状の中国）を問題にする時、それは、留日時代の「沈淪」の“愛国”からの後退でもなければ前進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留日時代の特殊な環境のもとで祖国愛にめざめ、帰国後その現状を目前にするにいたってそれが厳しい批判に変わったというなら話は簡単であろうが、この「芸術と国家」、あるいはその一ヶ月前に書かれた「文芸上の階級闘争」（1923年5月）に見られる特異な論法（芸術上の理想と現実“闘争”との無媒介な順接）は、「沈淪」の祖国への一方的な思い入れから、実は一歩も出ていないのである。

祖国の強大化を望む心（「沈淪」）と、身うごきできぬほど国家を抑圧とを感じる心（「芸術と国家」）。この二つをつなぐものは、跛行的に獲得された近代的自我と半植民地中国の現状とのギャップの露出、いわば、具体的に社会・国家を相手どりえないまま、内面の苦悩のみが錐を揉むように進行するといった悲劇である。これを、文学そして社会に対する両義的な不安と言い換えてもよい。

……

彼の文学観そのものに問題が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その程度の苦悩は、ヨーロッパに遅れて成立した非ヨーロッパ社会の近代文学が必ず一度は問題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ぬ普遍的なもの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って、近代中国の文学者の多くも、明らかにそのことに自覚的であった。

郁達夫が、この文学⇔社会の問題に出くわした時、そして「沈淪」において未分化なままに両立していた自我と国家の関係があらためて彼じしん

に問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時、彼がそれを自覚的に問いつめようとしながらも、文学そのものを疑ってみようとはせずに、すでに彼に親しいものとなっていたはずの西洋的近代文学の枷にとらわれたまま、社会解放と文学とを強引に一体化させるのみに終わったことが悲劇だったのである。

这里，就牵涉到郁达夫的文艺观的问题。平井博认为，郁达夫留日时代身受屈辱面对祖国的呼唤，并不能简单地与爱国心划上等号；回国后面对严酷现实，他又痛感国家对艺术家的压抑。在文学与社会的问题上，对他已经成为亲密朋友的西方现代文学，同时也是使他无法对文学有所怀疑的桎梏，只能是以被强迫着使社会解放和文学合而为一的悲剧而告终。

在“二 北京 1924年”一章中，平井重点考察了郁达夫在北京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

私はこの1923年末から1925年初めにかけての北京滞在は郁達夫にとっての一つの苦渋にみちたエポックだったと思う。魯迅との最初の交際が頻繁に行われるのもこの時期のことだが、たしかに郁達夫は何にかをもとめて北京に赴き、そしてそこで文学者としての危機に襲われつつも、とりあえずそれを脱する方途をさぐりあてようとしていた。

郁達夫はプチブルインテリゲンチヤとしての自己の文学が半植民地下の中国にあってもたざるをえない歪みと解離—彼じしんはそれを“零余者”として表現している—に気づきながら、中国の現状と自己の文学者としての身の処し方との上すべりでない関係をとら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己れの文学を活性化させようとした。1926年の広東行や1927年に顕在化する農民文学、大衆文学への発言、さらに当時の革命文学へのコミットなどはその明らかな模索である。

言葉を変えていえば、それは政治的・社会的関心の触手と文学的深化の実践とを二つながらに練り合わせて伸長させ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であった。

しかし私が残念に思うのは彼がこうした問題のついて発言し行動した時、その言動の中から反照的に自己の文学の中に何にかを取り込んで行くということがついに実を結ばず、郁達夫の主観的に思い入れのみが空虚に現実の壁につきあたって響くというありさまを呈したことである。

对于这一时期郁达夫的种种发言、主张，以前的人们（中国、日本）有过不少说法。如铃木正夫就认为，那些发言表现了郁达夫在退出创造社后并非远离革命，而是具有非常的远见卓识，因而给以很高评价⁴⁷。而平井则认为，郁达夫的这些发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寻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家在中国情势下发展方向的一种尝试。换句话说，是将关心政治、社会的触手和深化文学的实践二者结合的发展。但是很遗憾，他的这些发言，具体到文学行动中却并无结果，只有郁达夫的主观意念在现实前碰壁而发出的空响。

在下面的部分，平井对郁达夫的“艺术=生活”的观点，以及这一观点的形成由来做了细致的考察，认为郁留日期间所接触到的各种文艺观点，对他的创作及文艺观有较大影响，其中又以日本有岛武郎的「生活と芸術」一文中的艺术观对他的影响为最大。

在下一章“三「潔身修行」のゆくえ”中，平井主要分析了1927年前后，郁达夫关于“普罗文学”、农民文艺、革命文学的种种发言和观点，以及他关于“日记文学”的看法。这一部分常常是为其他研究者所忽略的，平井却从中找出郁达夫的文艺思想的根源，它的不足之处，以及对郁文学创作的影响。限于论文篇幅，这里只好略去，不做细述。

同一论文的后半部分，发表于两年后（1985年12月）的同一杂志上。这一部分，主要探讨郁达夫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この小論においてすでに言及したように、〈生活就是芸術、芸術就是人生〉の文学観をもって出発した郁達夫が、1930年代にはその帰結ともいべき作家生活の姿勢—日記、小品文、紀行文の大量執筆—をあらわにしながら、なおかつこうして新たな長編小説への意欲を燃や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一人の作家の内面を窺うという作業に還元してみた場合、それは自然的成熟への過程であると同時にそこから一步を踏み出そうとする姿勢、この二つのせめぎあいという形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郁達夫が『達夫代表作』の自序において、かつての20年代前半の諸作を〈幼稚でいやらしいもの〉と半ば捨てるように言っていたことをヒントに彼の30年代の長編小説群を見てみた場合、彼のこの時期の文学的方途は、身辺雑事を過不足なく表現することによる成熟への道行と、それと

⁴⁷鈴木正夫：「創造社脱退前後の郁達夫」、（『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24-2，1976年3月10日）

意識的に反発しつつ構想される現実に生死する人間像を活写すべき創作への志向という内面の劇（ともに作家にとっては切実な表現の契機としての）にほかならなか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ある。

平井博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了郁达夫的长篇小说创作。说是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以钱杏邨在「達夫代表作後序」中所提到的三部曲、即第一部「迷羊」、第二部「蜃楼」、第三部「春潮」以及人们较少论及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为主要线索，探寻郁思想及创作变化的轨迹。

所谓三部曲，其实除了「迷羊」，另外两部都未完成。平井却认为，从另两部未完成之作的已发表部分，以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中，可以找到郁达夫1928年初前后在构思长篇小说主题时的线索。具体地说，

郁達夫がこの小説（「迷羊」）のモチーフをthe age of innocence，無垢の時代における青年の問題だというとき、それはやはり過去の自分の創作に表れた留学生（「沈淪」）や青年教師（「茫茫夜」「秋柳」、小説家（「春風沈醉的晚上」）の人間像への自己反省—自己の作家としての資質の確認を伴って—とそれへの決済を意識していたと思われる。

三部作の第二部と第三部がそれぞれ1926年6月、1923年2月に一部分発表されながら、『迷羊』完成後の時点（1928年ごろ）であえて『迷羊』をさして第一部とし、それに続く第二部『蜃楼』と第三部『春潮』を執筆中であると再措定したのは、ちがった見方をすれば、三部作などという線的な見通しなどもともと存在しなかったこと、『春潮』や『蜃楼』は過去の折々の郁達夫の創作上の一つの点にしかすぎず、『迷羊』を書いてはじめて、その折々の点を結んで線とする見通しめいたものをつけ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こうして見てくるとき、『迷羊』は、未完成のままおいてあった『蜃楼』『春潮』などの作品に対する意欲をかきたてる里程標であり、彼が初期作品の世界から離れて新たな試行に歩み出ようとするための生みの苦しみであったと言ってよいだろう。

紧接着，平井在下一章就分析了『蜃楼』。先从当时的日记等中，发现郁达夫曾经对『蜃楼』相当执着，但终于未完成；然后进一步从作品的主人公设置，

小説結構、和心理描写等具体方面、指出其已经和以前的作品有较大不同。结论是：

郁達夫が『迷羊』を完成させた頃に考えていた三部作構想の第二部『蜃楼』とは、『迷羊』にいたるまで影を落とす初期郁達夫の世界を離れ、『過去』にその一端を示したような内省的契機を導入することをめざした作品になりうるものだったことは、今見た既発表分の『蜃楼』からも推測的に明らかにしうるのである。

日記に再三にわたって綴られる『蜃楼』執筆の停滞はここに胚胎する。

『蜃楼』が、はじめからthe age of skepticismを描く作品の部分稿として書かれたものではない。彼がすでに一つの萌芽（点）として提出していた作品を三部作構想の中に組み込んでいく過程で、六年あまりにわたる停滞が現出し、序章は序章のまま残されたのである。『蜃楼』はあくまで一つの端緒、第二部『蜃楼』のうちの未定稿として残るほかはなかったけれども、反照的に、書かれざる幾章の位相を我々に推測せしめる余地を与えてくれる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と思う。

考えてみれば、彼の日記に『蜃楼』のことが最後に登場する1932年10月、その執筆停滞に苦しむ一方で後期の傑作として知られる「遅咲きの木犀」が完成されたことは皮肉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

……そこに（「遅咲きの木犀」）見られるのは明らかに時間の浄化という作者の想念である。

そしてこの想念が当時の郁達夫にとっていつわらざる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もまたたしかであろう。

しかし彼は決してそうした境地に自己を安住させることをもって事足りりと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

つまり、もう一方の極にあったのが、対比的に言ってみれば、時間の負債という想念であり、それはいま見てきたように、「過去」以来の郁達夫の中で徐々に発酵しつつ、1928年初頭彼の革命文学への投企からの退却がはっきりとする中で、ようやくその志向を系統的に表現に持ち込むべく企図され、そして以後長く摸索されていく暗い思いであり、我々がこうして辿ろうとしている郁達夫の長編小説に響く通奏低音にほかならない。

彼の思いとは相違して、時間の負債を問い返す郁達夫の試みはおおむね

失敗作か未完である。しかし、一人の作家の全体的な文学的軌跡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る時、この二つの相反する方向に引き裂かれながら、それを二つながらに手放すことを肯じなかった郁達夫の誠実さをこそ、文学者の手柄というべきであろう。

我个人认为，这是平井的论文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他以历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郁达夫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为线索，对其精神世界潜在的一面追根求源，终于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就是说，郁达夫的创作，实际上有着两个方向的发展趋势。就在「迟桂花」这种表现“时间的净化感”的创作获得成功的同时，另一方面表现“时间的负感”的尝试却失败了。虽然是失败，但当我们考察一个作家的全部的文学创作的轨迹时，应该说，正是郁达夫这种一面被向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撕裂着，一面却又不肯轻易放弃的诚实，才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功绩之所在。

在最后一部分，平井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分析了他认为是在同一主题的延长线上的另两部作品：「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

自棄のはての惨死という形でしか自己の軟弱な人生を完結できなかった鄭秀岳にしても、また、誘惑されつつある当の相手（董婉珍）を逆に“育成”できると自分に言いきかせてつじつまをあわせることでしか人生を選びとりえなかった錢時英にしても、郁達夫がここで描写した人物の行動から浮かびあがってくるのは、たしかに、人間が人間と生き死にする社会において、ある人はこのようにしてしか現実とわたりあ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だという無残な事実を、しかしその事実がもっとも露わに否定さるべき革命の時代を舞台に、小説の正面から取り上げて描くという網渡りにも似た如き方法である。

それは、革命の暗部を照らすとか、あるいはまた、革命に能動的にかかわりえない存在を弁護するとかという野心とはおよそ無縁であった。

つきつめていけば、それは、文学者としていったんは時代の先端を走ったもの、革命の同伴者たらんとしたものが、志ちがえて後退し、“時間の負債”との格闘の中で自省し、もはや再び昔日の位置に立ちえないかも知れぬ事を自覚しながら、それでも文学を手放そうとはしなかった時にはじめて可能となった、敗残者あるいは落伍者への視線ではなかったかと思う。

「春風沈酔の夜」「ささやかな供えもの」などに見られる社会的弱者へ

の視点は、郁達夫には作家的出発以来のものとしてあったし、それは当時とていやしくも文学者の名に値する者としての共通の視点であった。

しかし、そうした、いわば先験的に文学的意味を背負った者としての弱者とは無縁の存在、革命のただ中であつての人生の敗残者（それは時代の主流からすれば時として敵対者ですらありえる）をあえて取り上げて描いたことに、郁達夫が文学者として抱えていた問題のぎりぎりの徹底化を見ると同時に、『蜃楼』途絶後も倦むことはなかった彼の作家の摸索の様相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

無垢のベル・エポックから後退せざるをえなかった郁達夫が、宿命的な方法で懐疑のうちに自己の再生を図ろうとした時、同時にみえてきたものが、無数の鄭秀岳や銭時英の姿であつただろう。矮小な存在にすぎない人間が時代の大波の前にいかに翻弄されるのか、それを達夫は時代の寵児から後退してきたおのれの姿を顧みながら、革命という至上の課題にぶつけて描くことで、とりあえず答えをだしたかったのもかも知れない。

最後につけ加えるとすれば、郁達夫のたどりついたこの方法は、たしかに政治的に否定すべきではあつても文学的には否定しえない存在を告知することには成功している。しかし、結果として表現された作品を見るとき、彼のこの精一杯の努力は、方法的骨格（意図）ばかりを露わにした肌理の粗い性急な物語性を免れてはおらず、むしろ我々に、冗々と続く彼の初期の中篇（「茫茫夜」）、鬱屈した意気込みだけを武器として成立させた初期の短篇（「沈淪」）を懐かしく思わせる。

对于郁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平井做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郁达夫作为文学者曾经走在时代最前列，虽曾一度后退，却在和“时间的负债”的格斗中自省。他也意识到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位置，却始终不放弃文学。表现的是投向失败者或落伍者的视线。他通过描写革命高潮中人生的失败者，一方面是郁作为文学家所抱的想将问题彻底化的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即使在『蜃楼』半途而废后，仍不知疲倦的摸索的姿势。

不得不从天真时代后退的郁达夫，一面用宿命的方法在怀疑中寻求再生，同时看到的是无数的郑秀岳、钱时英。虽然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被时代的大潮所颠翻，由此可以看出郁达夫由时代的宠儿开始后退的身影。同时，也可能是

他在与描写革命这一最高主题相撞时，不管怎样想要交出答卷的一种尝试。

如果最后要加什么话的话，那就是郁达夫所尝试的方法，确实成功的宣告了一种从政治上应该否定，而从文学上无法否定的存在。虽然阅读他作为这种尝试的结果的作品时，可以看出他这种拼命的努力，因为主观意图太明显而使故事性难免粗糙，但却让我们无法不怀想起他的初期中篇「茫茫夜」和初期的短篇「沈淪」。

在这里，我们不妨通过与平井这篇论文的比较，将整个日本郁达夫研究的历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最早的竹内好，以“苦闷的诗人”为核心，分析了郁达夫的诗人气质和他的苦闷的时代性。认为他通过固守自己的人生之路而从苦闷中走出；

五十年代的阿部幸夫，认为「出奔」与他其他的作品，实际上一脉相承，没有太大发展和进步；

伊藤虎丸主要通过对一部「沈淪」的考察，分析他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方法的问题。对其他作品，特别是后期作品，基本上没有触及；

七十年代的加藤诚，重点考察了郁的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却也没有从这些作品中得出独自の结论。

平井博站在八十年代，对前人的研究有所推动和发展。他既吸收了日本的前辈研究者如伊藤虎丸等人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也借鉴了中国研究者如董易等人的最新研究论文的观点，对郁达夫的创作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得出了自己的崭新的结论。

他不仅特别注意了以前的人们没有注意的一些中、长篇作品，还从中看出郁达夫在革命与文学、“时间的净化感”和“时间的负债感”的矛盾搏斗中，不放弃文学的一种顽强的努力。他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比阿部幸夫、加藤诚等有发展，同时对竹内好、伊藤虎丸等未及注意的部分，给以了充分的注意，从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领域看，填补了一些空白。所以，可以说平井的研究，是继伊藤虎丸之后的又一突破与发展。

2, 伊藤虎丸的「補説」

前面曾提到，作为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共同研究的重要成果，八十年代，『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10月）一书出

版。伊藤虎丸不仅为此书写了前言（本节“一”的2“中国像の再構築”中的主要依据）、代序，而且在自己的论文「郁達夫と大正文学」（即他最初两篇郁达夫研究论文的合并）之后，增加了一节：「補説—残された課題」。在「補説」中，他对自己三十年前的研究做了回顾，并站在八十年代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对当初的观点、方法等进行了反省和再认识。

在「補説」中，伊藤虎丸先对自己的研究起点做了简要回顾。（见第二节的二—1）并认为时至今日，至少应该对三十年来日本民主主义的历史，根据自己从中学到的经验，做一个总结。

当初由“竹内鲁迅”所触发的郁达夫（实际上是对日本现代文学的）批判，是我最初的研究的内在主题。这里有个前提，即鲁迅从日本文学未受实质性影响，而同样是留日学生的文学运动，十年后的创造社却受到日本文学的强烈影响，这是当时的“常识”。关于1927年以后的情况，最初的问题是为什么鲁迅前进而郁达夫掉队了；后来转移到同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鲁迅和郭沫若有什么不同的方面去了。三十年来这一问题意识的转移，与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和对中国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特别是从文革后期开始明确）的不满连接在一起的。（我）开始意识到，解放后中国文学的主流不是对鲁迅，而是对郭沫若、成仿吾代表的创造社的继承。那么，竹内好批判的“近代主义”，就并不只是日本文学，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果真如此的话，对三十年代郁达夫的苦恼和“掉队”的意义，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至少，不能象当初考虑“为什么鲁迅前进而郁达夫落后了”那样，来考虑“为什么郭沫若前进而郁达夫落后了”的问题了。自己以前认为创造社是“近代主义”，而把鲁迅置于与此相对立的位置的看法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当然，把鲁迅和郭沫若们当做“革命派”，而把郁达夫等当做“中间派”或“非革命派”的观点，如上所述，从把“思想”当做“方法”的问题来考虑时起，我就不认为那是有效的。这里，如我的旧稿那样，仅仅批评郁达夫的“自我”中的前近代性是不够的。对同是创造社的，比方说为了区别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文学中自我状态的不同，就需要别的新的观点和方法。

广而言之，对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进行重新认识时，可能得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解放后写的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持以鲁迅的方向为主流，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学，发展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阶级的大众的文学这样一种认识模式，对作家们，也是以政治的思想的标准，大致分为革命派、中间派和反革命派。本书中所收的我的郁达夫论，也是在肯定这种模式的大前提下，在这种框架中写出来的。我并不认为这种认识模式（唯物史观或进步史观）在今日已

毫无意义。但考虑到今后的世界，正如对从前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模式是否依然有效进行质疑一样，在今日的日本、中国（更广泛的到亚洲）的思想状况中，为了再一次使“思想”（以及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具有力量，即使是要坚持进步史观或唯物史观，更深一步能对“人”的问题做出深刻解释的“思想”，也已经是十分必要的了。

由此出发，我自己认为，在我最初的工作即“鲁迅与郁达夫”，及其后的“鲁迅与郭沫若”的课题之前，“郁达夫与郭沫若”这样一个主题的研究是很必要的。如果我只能以鲁迅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话，鲁迅比郭沫若对郁达夫更有好感。说郁没有“创造脸”，并不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如果我们更多从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也许能得到什么线索。

对三十年代的郁达夫进行认识也同样如此。他在那个时期“掉队”，后退到旧文人的世界，这是事实。在本稿中，我认为这与他“近代自我”的性格有关——到此为止，我不认为有修正的必要。但现在再由此向前一步——即对他的“掉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认识，我感到很有必要。这其中也有从三十年来的沉痛教训中我所学到的、对我自己对“思想”理解的浅薄的反省。

前面我曾说过，战后是相信“思想的力量”的时代。那时我们对“思想”是怎样理解的？那就是直截了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思想”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的思想，威伯的思想等等。不承认思想是个人精神的产物，或者说在“统一团结”的名义下不允许如此。借竹内好的话来说，是不明白“拥有思想”和“被思想所占有”的区别。结果个人思想的“发展”，只能是由一种思想（比方说唯心论）向另一种思想（比方说唯物论）的转移。在此背后，还有思想（或世界观）是历史社会的产物（所以在一切阶级社会中，所有的思想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这种“历史主义”的强烈影响。个人的思想，不管其“主观”上如何考虑，在同是历史社会的产物（“存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客观”上都难免相似，只能由阶级性、时代性等分成几类（如贴上“进步”“保守”之类的标签）。思想的发展，简单的说，就是和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如克服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方向前进等。就是说，在我这里，个人主义（近代）和社会主义（现代）是对立、分裂的。

当然，从那时起，对这种排斥个人自立的集团主义，从心情的或精神的构造上看，不过是战争中国家主义的变形这一点也时有反省。另外，竹内好对于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由尼采式的唯心论、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提出

了这是从个人思想的整体中只“抽出”一些既成思想的做法的批判。我大约也受到他的这一影响，在考虑郁达夫的“思想”时，没有简单的只衡量他的“思想”与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但尽管如此，我的郁达夫论，也还是以郁达夫是未能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脱离了革命文学战线的“颓废和感伤的作家”这样一种认识为前提，并探究其原因的（当时“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风潮，是我的研究的潜在主题）。

我认为他掉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近代自我”中，残留着浓厚的文人的优越感，即封建的感性的自我意识。这些，在他对西方近代的接受和他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一跟前面一样，到此为止都不错，现在也这么认为。这一点，比方说和鲁迅的作为意志的“精神”对西方近代的理解做比较时，包括郭沫若等的创造社全体的文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共通的。但是，用这个观点和方法，却无法解释三十年代郭沫若等的“前进”和郁达夫的“掉队”。想要做出正确解释，必须根据我从那以后三十年的经验，通过对“思想”的理解方法的反省，得出新的观点和方法。

而且，对自己的“反省”，同时也有对“战后民主主义”运动失败原因的我自己的反省。三十年代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郭沫若等的“创造社式”的革命文学方法，和我对他们的“思想”状态的考虑相重合。这样，即使同是创造社成员，将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分开来考虑，郁达夫“掉队”这一事实，在当时的文学状况中，看看郁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主张，或者认识其中意义的必要性就产生了。这一点，和鲁迅对“创造社式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或许有什么共同之处。

换句话说，作为对现在日本及中国（也就是亚洲）的思想状况相对应的研究课题，我感到对我的旧稿中所论述的郁达夫的“近代自我”，作为西洋近代文学受容史，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所占的位置，有必要用今天的视点重新认识，并重新考虑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虽然在旧稿结尾处，我从“文学的自律”的角度对此有所触及。——同时，在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历史中的“政治与文学”的构造中，作为文学及文学者的努力的一种类型，对于我从郁达夫身上找出的、我所称之为“文人传统”东西，再加上一些仔细的分析，也是从当今的意义上我再度考虑的事。

就是说，我在旧稿中，通过对当时我自己的自我批判，批判性的提出的郁达夫的“思想=方法”，如果现在能重新认为其具有肯定性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不借用所有既成的“普遍的”道德、理论、思想之类外在价值的权威，只是以无权无名的一介平凡文人自己的、赤裸裸的感性的自我为依据，和中国社会整个黑暗势力相对抗。确实，这种文学的方法（同时也是认识社会的方法），不可能对中国社

会现实的构造有彻底的认识，同时必然导致他的作家生命的挫折。其理由，因为他通过与超越的对决，无法形成自己内在的新的普遍价值，而且他的自我，也仅止于是带着封建残余的感性的自我。但同时，他作为一个文人认识世界的“眼”，一直到最后也不肯委于比方马克思主义之类“有权威”的思想或世界观而具有诚实的意义。——这一点，我在旧稿中从“文学的自律”的角度，为他呼请文学史上的正确“位置”。那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文艺讲话”之后，与其说是获得了科学的认识社会的方法，更多的情况下仅止于从毛泽东思想中借取“方法”（与其说是拥有思想不如说是被思想占有），而朝着放弃文学自律方法的方向滑去。现在，对郁达夫的自我表现（和对日本的私小说不能简单断言是“放弃社会性”，同时也是社会批判的一种方法的问题一样），难道不是很有必要重新将其消极面和积极面做一比较，从而进行再认识吗？

以上，基本上就是伊藤虎丸「補說」的全部内容。

伊藤虎丸的郁达夫论，完成于六十年代前半。正如前面所说（在后面的代表者专论中也将说），他的郁达夫论，以其理论上的严谨和探究问题的深刻，可以说反映了日本郁达夫研究的最高水准。而八十年代的这一「補說」，则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他那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以往的研究工作的反思和再认识。

总的看起来，伊藤虎丸在「補說」中，对自己三十年前的工作，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了一番重新认识。其中有几点比较关键：

首先，对当初的研究起点，他直接道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竹内好“问题提起”的影响，即对“思想”的重视。这一点，在今日看来，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问题是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认识，而应该将对“思想”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其次，以前的郁达夫论，对他1927年以后的“掉队”，主要从作家的“思想=方法”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郁达夫的“近代自我”，对接受西洋现代文学时的影响，以及封建文人“优越感”的残余等。这些也都没有错。但从今天的理解方法去看，他的“掉队”，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而并非仅是消极的）。对这方面，过去认识不足，现在应给以新的认识和评价。

伊藤虎丸的这一「補說」，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的工作做了回顾和反省，客观的指出哪些地方需要再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由此表现出的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从现在的角度看问题，对已经发觉的不足或缺陷，坦率的指出，承认，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对历史，也不采取虚无主义、全面否认的做法，有一

说一，有二说二。当修正的修正，当坚持的（在他认为如此的地方）也绝不轻易放弃、否定（如大的方面，对竹内好学说的态度）。和有的中国学者曾经表现出的对历史上的失误，或者讳莫如深，拒不承认；或者矫枉过正，全盘否定的态度比起来，伊藤虎丸的做法，显然更为科学、严谨一些。

作为以前的郁达夫论的一个补充，伊藤虎丸在「補説」里并没有提出什么完整的新论点。但他在历史反省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的问题方向。这种方向性的认识，也许对他自己、也对整个日本的郁达夫研究，都具有寻求、开拓新的发展目标的积极性意义。

3. 高橋みつる

进入九十年代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中，选择郁达夫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名古屋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大学院博士课程修了）的高橋みつる，就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分别是「郁達夫における作家と教師—その職業意識をめぐって—」（『名古屋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第5輯1992年6月）、「郁達夫と人力車夫」（『名古屋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第10輯1997年12月）等。

这里，让我们选择一篇文章，来做个代表性的认识：

「郁達夫における作家と教師—その職業意識をめぐって—」

一般来说，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者，主要都是从文学的方面对郁达夫进行论述。而高橋在这篇论文里，却从另一个角度——郁达夫的职业观——切入，展开了她的分析和论述。

在论文的开始部分，高橋先引用了郁达夫对于作家和教师两个工作的看法，郁的结论是，这两个职业性质不同，作家=“自由”“情感”，教师=“束缚”“理智”，二者无法同时并行。接着，她又引用了鲁迅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初步比较的结论是，两人的认识几乎完全一致。但进一步分析，又有些微妙的不同。

虽然两人同样为两个职业无法双全而伤脑筋，但作为个人应该选择的道路，鲁迅首先考虑的，是对教师和作家两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还是对每一方面出一半力。如果可能，不管对哪一方的工作都竭尽全力去做。而郁达夫则从开始，就不是要在二者之中选择的问题；从鲁迅的考虑中，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教书，都能让人感到他所背负的使命感，和无论做什么都能对中国有所贡献的确信。郁达夫却是很明显的站在作家的立场，而非中立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

接着，她从两人的不同中，转向去集中分析能反映郁达夫思考方式的部分。

比方说，郁达夫认为作家创作的“自由”，和教师工作的被“束缚”，这种价值观后就体现出他的个人气质。

作家＝「自由」、教師＝「束縛」と感じることに、すでに郁達夫の本質的志向が如実に現れていると言えよう。そして、この二つの言葉「自由」と「束縛」の持つ語感から推量して、彼がいずれに価値を置き、意義を見出しているかも、自ずと明らかであろう。

那么，郁达夫对教师职业感到的不自由、被束缚，主要缘于何处？除了开始引用的郁的「著書と教書」一书外，高桥还引用了郁「芜城日记」中对教师一职所发的牢骚。然后说：

教師であるがために生じる束縛感も、郁達夫は強く感じていたらしい。それは、「礼儀」・「習慣」・「尊厳」という言葉に象徴されるような、教師に求められる職業倫理への抵抗感であり反発であった。

并且，高桥又引用了郁的小说「秋柳」中主人公于质夫“学生嫖得，先生嫖不得？”的质问，说明郁达夫对于教师伦理感的反抗。并分析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社会对教师的要求也特别苛严。

この頃は、原因や経過は一樣ではないが、全国的にこのような学校紛争が多発していたらしい。郁達夫の場合も、この安慶法政専門学校だけではなく、後に文科教授として勤めた武昌師範大学でも、学校経営をめぐる教員間の派閥紛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いるし、さらに安徽省立大学でも、当局の圧力にあって辞職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すべてに、教師の倫理観との直接の因果関係を求めることは妥当ではないとしても、このような厳しい職場環境が、教師に一層の警戒心と自制心を強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からう。

就是说，所谓“教师的伦理观”，不仅和郁达夫的个人气质不相合，而且也体现为当时比较普遍的对教师的压力。接着，高桥又举了1926年底，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在广州，和创造社几个主要成员（当然包括郁达夫）一起在珠江上“游河”的例子，来说明“革命の根拠地においてもなお、人を教え導く立場にあるがために周囲を気にかけ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郁達夫らの心理的負担が推察されよう。”

そもそも、この「自由」と「束縛」の問題、つまり、道徳的束縛からの解放は、郁達夫が生涯追求してやまなかった重要な課題の一つであった。どのような形であれ、道徳的見地から個人の自由を阻害されることに対して、彼は過敏とも言える程激しい抵抗を示した。道徳をふりかざして攻撃してくる論敵に対しては、彼は、しばしば容赦ない反撃を加えている。また、たとえば、彼の思想や文学に少なからぬ影響を与えた人物の一人に、フランスの思想家、ジャン・ジャック・ルソーがいるが、彼は、ルソー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啓蒙的文章のなかで、その既成社会に対する反抗精神や自由と平等の主張を、熱い共感と称賛の気持を込めて紹介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郁達夫は、「自由」をこよなく愛し渴望した作家であった。そうした彼の生き方を考えれば、教師という職業が、いかにその信条と齟齬をきたすものであったかが改めて理解できよう。

除此之外，高桥还列举了当时一是上课要教师自己印讲义，二是常常欠薪不发的两个情况，说明当教师的不利。

最后，高桥的结论是，根据郁达夫的自我认识，教师职业和他的资质、志向都不合，不过是非常辛苦、只能赖以谋生的一种手段。至少，他由当教师而得以免除失业之窘，换句话说，以“自由”为代价换来的一定的社会地位、名誉等，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喜悦。从他对作家的偏向来解释，在写作的同时染手于教师工作，好象就不太干净了。这有可能是出于一种作家的自负和矜持，但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否定性的教师观背后，流露着他对于教师这种拘束颇多之职业的生理上的强烈厌恶感。

以上就是高桥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看，此论文的涵量不算大，甚至也谈不上深刻。但它却自有其特色。从论证方法上看，论者先将郁达夫的有关看法和鲁迅的做了一个比较（将郁与鲁做比较的办法，在日本学者那里常被使用），从比较中找出相同之处与差异。然后，对这“差异”，寻找出郁达夫主观性格上和当时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因素。高桥不是主要从文学方面，而是从作家的“职业观”上，来探寻其浪漫主义因素，也可算是独辟蹊径。

高桥另外还有几篇文章，也都是郁达夫研究方面的。她以一个女性的细心，特别注意到一些为以前的人们所忽视、而对理解郁达夫不无意义的问题和方面，并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进行了细致、绵密的分析。这里，限于篇幅，只好略去不

论。

除了高桥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年轻研究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对郁达夫的关注。比方说在1995年8月出版的『太田進先生退休記念中国文学論集』一书中，有一篇作者为野村鮎子的文章：「郁達夫と長嫂陳碧岑—贈答詩と書簡を中心に」。作者对前人很少注意过的这一方面的事实、材料，做了整理，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也略去不论了。

三、小结

这一时期的郁达夫研究，总的来说，已经不再如前一时期那样，有那么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从每一个具体成果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

1、历史的反思

中国方面，这一时期的郁达夫研究，和以前相比，得以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对过去的评价重新认识。评价、认识的标准，由简单的革命功利主义，渐渐回归到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性，因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陈旧局面。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相对的具有较大独立性，不像中国那样为政治所左右。但实际上，日本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的表现。比方说五十年代初期前后，由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景仰和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反省所造成的一时性的“中国热”，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虽然它同时也带来“一边倒”倾向；其后，在两国关系近于“断绝”的情况下，重新冷静的审视中国发生的一切，并做出自己的思考，成为客观形势对研究者们提出的一种要求。伊藤虎丸的研究，就表现出他在那一时代，在研究方法上，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性。进入本时期以后，中国方面的“反思”，当然对日本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所以，在这一时期，站在新的历史发展点上对以往的工作进行反省、再认识，不仅有可能也有必要。这一点，除了伊藤虎丸在其「補説」中说得非常明确之外，其他一些文章，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有所表现。

2、理论深化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到此为止，已经走过几十年历史。前人对郁达夫，已经

论了又论，说了很多很多。在这种前提下，研究理论的发展，是不是还有可能？还有没有继续深化的潜力？对此，平井博以他的工作，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

所谓理论的深化，就是不满足于前人的结论，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新的探索，得出新结论。比方说，对人们说过很多的关于「沈淪」的反封建意义，以及「沈淪」所表现的郁达夫的“爱国心”“民族爱”等，平井博先提出怀疑，然后做出自己的分析，由此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结论。特别是他根据自己的怀疑，深入到郁达夫的「艺术和国家」一文中，对他的艺术观、国家观的探讨，就是很有见树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他对郁的最终小说「出奔」的意义理解，也比五十年代阿部幸夫的结论深化了不少。平井博以自己的工作证明了，研究是无止境的。只要一个研究者敢于怀疑、敢于探索，他就一定会有收获。（这个问题，在最后的第五章中还将集中论述，这里就不再多议了）

3. 研究的多样化

和以前的研究多集中于郁达夫的小说、他的人生及文学道路不太一样，这一时期，研究的范围相对广泛一些，内容也比较的多样化。特别是对以前往往为人们所疏忽的地方，一些青年研究者给以了一定的注意。比方说前面提到的高桥、野村的工作等，就是如此。从论题上看，理论性、综合性、全面论述的题目在减少，具体的、实际性的题目有所增加。从一方面说，也许正如丸山昇指出的“底盘下沉”一样，原来实力雄厚的理论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变弱；同时，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年轻的一代，正带着自己的特色，活跃在当今的理论舞台上。当他们逐渐成为日本郁达夫研究的“主役”时，局面又会有新的改变？

以上，就是对整个几十年来，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一个纵向考察。下面，将转向对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位研究者的集中论述。